

炎黄春秋

第 **11** 期
2012年

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李锐：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

策动朱德政变的匿名信案

联共（布）党史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目 录

亲历记

- 1 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李传俊
- 13 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晏乐斌
- 21 策动朱德政变的匿名信案 杨宪澄

一家言

- 22 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 董郁玉

求实篇

- 26 毛泽东怎样指挥三反运动 崔敏
- 34 从内部讲话看大跃进时期的高层情绪 陈徒手
- 40 饶漱石与“饶、潘、扬反革命案” 景玉川

品书斋

- 44 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李锐
- 48 时代问题判断有误就会危害全局 何方

春秋笔

- 50 中国的“东方红”现象 王西麟
- 53 从反右运动看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 沙尚之

往事录

- 57 江青夜闯西花厅 武建华
- 63 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 智效民
- 70 批注毛泽东著作引发的血案 阎纲

争鸣录

- 74 也谈“义和团的真面目” 侯宜杰

怀人篇

- 79 父亲扬帆的晚年岁月 小朝

海外事

- 84 联共(布)党史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马龙闪

编读窗

- 93 “六教授座谈会”与“章罗同盟”拾遗 阎秉华
- 94 陈修良的几件往事 黄铭

顾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实	王俊义	冯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方	吴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云
展江	徐小岩	秦晖	袁鹰	袁伟时
高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韩钢	董健	曾彦修	鲁諝
雷颐	魏久明			

社委会 杜导正(主任) 吴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晨 徐庆全 胡竟成 张晓鸥

社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思
副社长 杨继绳 李晨
社长助理 胡竟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编辑 吴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黄钟
执行主编 洪振快

总经理 李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竟成
发行部 孔屏(主任)
办公室 王海印(主任)

理事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琼
秘书长 吴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 李传俊

口述人：李传俊，1942年8月生，曾任北京军区部队机要参谋，1966年8月~1972年12月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

口述时间：2004年7月30日

提问者：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王广宇、阎长贵

调入中央文革办公室

李宇锋(简称：李)：您是什么时候调入中央文革办公室的？

李传俊(简称：俊)：我是天津人，长在北京，1962年2月入党，大学文化程度。1966年8月我在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任机要参谋，总政通过北京军区调我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改为办事组)工作。那时，军委三大总部和军事院校搞运动，所以总政只能从野战部队调干部充实到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工作。从全军各部队调来的有宋伟、田会贞、高长山、张根成等，包括记者站记者在內有一百多人，都是资格比较老的营团职干部，他们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我是最年轻的。不久，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又调来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王道明、廖初江等。

最初，我搞文件收发，干了8个多月。1967年4、5月，王道明调任中央文革办事机构总支书记，他就把我调到中央文革办公室下属的电话联络组负责电话记录和领导交办事情。电话组分市内、市外两个小组，都是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重要的写成《要事汇报》打印分发给中央常委、中央文革成员。1968年3月办事组出事，王道明等隔离后又调我到办事组值班室工作，还当了办事组党支部书记。

李：您在电话组的时候，都接到过什么内容的电话？



李传俊，1966年12月摄于甘家口(钓鱼台)

俊：反映什么问题的都有啊。比如来自大专院校的，清华大学除蒯大富，还有潘剑虹(她自称“潘总理”)，北航的韩爱晶，地质的王大宾，北师大的谭厚兰等，都是造反派头头打电话反映情况，主要反映的就是派性斗争。

另外，我还接到内部电话。比如，一天晚上接到总政主任萧华的夫人王新兰的电话。她说：“你们管管吧，报告一下江青同志吧，红卫兵把萧华给抓走了！把我们的电话线给掐断了，你们过问一下吧！”还有老师们的家里打来电话，红卫兵要冲老师的住宅，要求保护或反映情况的。

还有就是武斗的事。比方说广西柳州出现爆炸事件，请中央文革赶快支援，我们赶紧写记录报送，中央文革批示让杨成武去处理。

王广宇(简称：王)：一般市内电话、外地长途电话主要是造反派的头头，应接不暇。

李：电话对社会公开吗？

俊：有一部市内电话是公开的。当时有三部机子：一部红的，一部黑的，一部保密机。

电话最多的还是黑机子，也就是造反组织负责人来的电话，一会儿一个，都是当时比较大的单位。最忙的时候连续不断，昼夜不停。还有长途电话也是不停的。

李：接电话有什么规矩吗？

俊：规矩就是做记录，有记录本，重要的就要详细记录。比如萧华夫人的电话，什么红卫兵冲击老帅住宅，这就算是重要的事了，还有各地武斗求救，都是大事啊！写完电话记录以后，送给中央文革成员，让他们来处理。

李：这些规矩是谁定的？

俊：各组都有组长，市内电话组长是宋伟，你认为这个重要，就让他看一下，决定报不报。因为电话太多，后来我们就自己做主了。中央文革办事组出事后，好多人被抓起来，上面派李讷当组长。李讷说过，有重要的一定要先送给江青。这是她给定的规矩，而且要求保密、封存，谁也不要说，只能跟她说。

李：她说的重要电话指什么？

俊：大部分都是主席的私事，比如说“主席的儿子”认亲来了，在中南海西门等着呢，接见不接见？好几起这事呢！对这类事我们只能记录，再密封起来，让李讷看。

阎长贵(简称：阎)：我也处理过这样的信件，报告江青，她说哪来这么多“野种”啊？

李：接电话的一共有几个人？

俊：长途电话组有田会贞、高长山、陈军明，市内有宋伟，后来是我和姜才熙，还有济南军区的一个干部，叫什么记不清了，也是四五个人。

开始虽然工作很忙，但是伙食非常好。王道明来了搞革命化，写大字报，倡导夜餐费由五角钱(国家补贴的)降到三角钱。大家在“大字报”上都签了字。

工作人员纷纷出事

李：文革，特别是初期的一大特点就是乱，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据我所知，作为运动的大本营，中央文革也不例外，工作人员纷纷出事。

俊：他们几个人(指阎长贵、王广宇、矫玉山等——整理者注)出事了，当时我蒙在鼓里。抓王道明的时候我在场，起因与“傅崇碧武装冲击钓鱼台”有关，那个场面我也亲历了。

那是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急急忙忙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十六楼找鲁迅手稿，当时钓鱼台东门警卫电话请示陈伯

达的秘书王保春同意，傅崇碧带着他的秘书进了十六楼。傅崇碧进来后，直接往会议室走，气冲冲地说：“我是卫戍区司令员，这是我管辖的地盘，谁敢拦我！”他是很不满意的。这个时候，杨成武(当时是代总参谋长)也来到了十六楼。他们刚一到，江青就过来了(江青住在钓鱼台十一楼)，她声音特别大：“谁让你们进来的？还发脾气！你们有什么资格冲击中央文革！”这是我亲耳听见的，这时她已经在会议室了。江青冲杨成武吵了起来，我在值班室听到声音特别大，江青还拍了桌子。接着，江青就通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等陆续来到了十六楼会议室，江青大声指责他们俩非法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连忙解释说是总理交给的任务，找鲁迅手稿，而且强调他是奉命到中央文革保密室取鲁迅手稿的。江青马上反驳：“胡说！我们中央文革不可能有鲁迅手稿，谁指使你们来的？”这个时候江青就胡说了，指着傅崇碧说，“你的秘书还要拿手枪把子打我！”——我在现场，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个秘书很紧张，我看见他直流虚汗，有点虚脱。后来我才知道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保密室(保密室工作人员卜训荣，海军航空兵部的干部，他说鲁迅手稿后来是在保密室找出来的)。

事后时间不长，大概是1968年3月24日，中央就在大会堂召开团以上驻京干部大会，毛主席和林彪也出席了，当场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宣布杨、余、傅反党，对他们隔离审查，而且宣布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之后，王道明、周占凯、张根成等陆续被拘留了。

李：王道明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拘留的？

俊：记得是3月24日以后的两三天晚上七点多，江青和总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在十六楼会议室开会。中央警卫局二处的警卫人员叫王道明、周占凯进会议室，随后就把他俩人的领章和帽徽撕下来了……因为我在值班室紧挨着，听到声音特别大，江青训斥王道明：“你胆够大的！你竟敢接受戚本禹的旨意迫害许广平？是什么目的？”原来王道明、周占凯曾经受戚本禹指派看望许广平，告诉她：“你要注意，你要跟郑公盾划清界线，郑公盾是特务，你不要跟潘梓年、郑公盾有联系，他们都是特务！”许广平很

吃惊,加上因找不到鲁迅手稿着急、生气,心脏病发作就去世了。江青问王道明有没有受戚本禹指使到许广平家去过?王道明说有。江青发了很大的脾气:“带走!”然后警卫二处的警卫车就把他俩人带走了。

被抓之前,王道明看到戚本禹、阎长贵、矫玉山等出事,已经吃不好睡不好了,整天心神不定,唉声叹气,话也不多。因为办事组工作人员中他最小

(1944年出生的),戚本禹给他起名叫“王小兵”,是沈阳军区标兵连指导员,当年讲“拼刺刀的辩证法”,在各大报纸发表文章,很有名气。那一段,王道明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人们都说王小兵你不能这样啊,你是总支书记。他说:“唉!什么总支书记呀!”因为好几个人陆续被抓,他预感到事情不好了。文革结束后,我见过周占凯,他是济南军区空军干部,他不谈此事,他说不谈国事,他爱人也嘱咐,以后再也不干这事了。听他说王道明受很大刺激得了精神病,出狱后回鞍山他父母家了。

李:鲁迅手稿到底是怎么回事?

俊:把王道明、周占凯带走以后,紧接着把保密室卜训荣叫去了,江青训斥卜训荣:“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告诉我们?这么大的事瞒着!”卜训荣说他不知道那几个箱子里有什么东西。确实他不一定知道,因为鲁迅手稿在保密室铁柜子上边的几个箱子里,是戚本禹带着韩树信(韩树信是中央文革调查组的,调查组撤消以后叫他办了一段《要事汇报》)从文化部取来放到保密室的。江青狠狠批卜训荣一顿,吓得他直哆嗦,我们也在场也很害怕。因为和我们一同工作的王道明、矫玉山、张根成等都被拘留了。

后来我还目睹了批斗他们的场面。1968年6月在记者站(全总干校,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整理者注)批斗王道明、王广宇、周占凯、矫玉山等,是李讷组织搞的,我跟着她去了。李讷指挥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一百多人批斗他们,一片“打倒王关戚!打倒王关戚黑爪牙!”哎呀!她一看,说不行,不保险,怕出事(就是怕打死人),她



1967年5月1日中央领导人参加中山公园游园会受阻到故宫警卫连连部休息时照的,其中从左至右为阎长贵(江青秘书)、王宇清(毛泽东警卫员)、许春华(江青护士)、张素兰(江青服务员)、王保春(陈伯达秘书)、吴旭君(毛泽东护士长)、叶群、江青、林彪、李志绥(毛泽东保健医生)、徐业夫(毛泽东秘书)、孙占龙(江青警卫员)。

建议把他们送秦城监狱。

王:我是从监狱里拉回来被斗的。有人说是记者站老干部写信反映情况。要不然确实会被打死的,非打死不可,打得够呛!

俊:李讷当时说这儿不保险,回来得跟妈妈(江青)说。后来我知道,江青同意后都送往秦城监狱了。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工作人员被关押、受审查的多极了!随便举一个例子:2002年2月我母亲住在301医院肾内科病房,恰巧她跟徐学增住在一个大房间,都是重病号。徐学增原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负责人,南京军区老干部,当时已昏迷,我问他儿子,他说爸爸原是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就是这段历史把我爸爸身体给糟践了。清醒的时候,我就问徐学增,我说我那会儿在中央文革办事组,他点点头,他说他那一段关起来受罪了……

我觉得矫玉山几个人被抓走跟看江青上世纪30年代的照片有关系。1967年7、8月的一天,香港画报社寄给中央文革一包画报,矫玉山几个人打开一看,都是江青30年代当明星时候的照片,有穿旗袍的,还有跟唐纳的照片、画报,我到现场时已是尾声了。他们意识到这是“防扩散材料”,又包上了。其实这事不说也就过去了,可是矫玉山向戚本禹报告了,戚本禹说你们还是向姚文元报告吧(他是回避这件事)。报告姚文元后,他说:你们把来龙去脉写一下,怎么回事,当时有谁看了,你们都写上。矫玉山写完之后,姚文元就把报告送给江青了。矫玉山后来被抓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

阎:矫玉山跟戚本禹一起抓的,是1968年1

月12日。

俊:是的。

当时谁得罪了江青都没有好下场。举个例子,你就知道江青当年的权势有多大。1967年8月的一天晚上,王道明让我跟他去北航找韩爱晶,让韩爱晶把一份资料整理完整一点,这样才好上报领导。什么资料我不知道。王道明骑摩托车带着我去的北航,回来的时候都凌晨一两点了,途经海淀双榆树被当地的人给拦住了,有很多人,还要打我们。王道明少年气盛:我们是中央文革的,你们敢拦?我有证件!当时我们有个新华社记者证。回到钓鱼台,王道明就报告给戚本禹,戚本禹又报告了江青。江青火儿了:这还得了!中央文革的人在外头受人拦阻,找傅崇碧!傅崇碧出动了卫戍部队,把这些人带走了。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她的厉害——连宋庆龄看电影也受到她的限制。有一天,宋庆龄办公室秘书来电话,我接的,说首长想看一些电影。宋庆龄秘书还列了一个电影名字的单子。我们把电话记录给江青,江青不让她看那么多,说给几部就行了。

李:宋庆龄看电影还得报给江青批呀?

俊:当时调电影片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都要经过江青的同意。后来我看单子上大部分都被删了,也就剩下五六部吧。

李:江青对您发过脾气吗?

俊:没有,因为我在她面前没办错什么事。

李:江青批评人就看办错事不办错事?

俊:不,不是。她批评人主要看她心情。她不高兴的时候见谁都尅。她疑神疑鬼,经常发脾气。有一次我特别害怕,我去给谁送材料,走得很快,回头时没注意,把江青撞着了。哎呀,我当时吓坏了,她倒没说什么,护士小周(周淑英)马上扶了她。那一次真是挺侥幸的。

李:江青指示过你做什么事吗?

俊:不是直接指示的,大都是间接的。像到北京建工学院见“八一八”造反派头头,是江青指示戚本禹去,戚本禹叫王道明跟他去,王道明没去,他又叫我去。当时建工学院特别活跃,我记得当时的学生领袖叫朱之慧,是建工学院“八一八”的负责人,特别善辩。她坚决反对刘少奇,后来号召一大批人在中南海西门绝食静坐,坚决要

求刘少奇检查、交代。

郑仲兵(简称:郑):保刘、反刘最厉害的都是建工学院,第一次喊“刘少奇万岁”,也是建工学院。

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绝食,当时江青跟我说叫戚本禹去处理这事,不要叫他们绝食了,叫他们回去,有什么意见可以反映。建工学院绝食的学生就在中南海西门北边那儿,躺着,大概有30人左右。我跟戚本禹说了,我不知道戚本禹去没去。第二还是第三天,江青问我建工学院的人走没走,我说他们还没走。江青说戚本禹怎么还没去做工作哪!告诉我:“你跟戚本禹说,他要不去我就去了!”我忘记戚本禹怎么去做工作了。

中央文革的作用

李:现在人们有一种印象,就是文革中那些所谓“群众运动”,走上街头,批这个斗那个,是在中央文革的指示、唆使或暗示下,形成的群众场面。您觉得在这方面中央文革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俊:整个过程是支持吧。比如说当时晚上我们经常开着车到街上看大字报去,西单商场那块最多,那场面是很“壮观”的,各种大字报都有。当时高校比较活跃,我们就摘抄清华怎么说,北大怎么说,哪个学校怎么说,回来我们就写简报报上去(后来听说主席也去看过)。反正给人一种感觉是支持的,支持学生贴大字报,支持打倒刘少奇。中央文革一直支持学生运动,直到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才说:“是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那是个分水岭啊!当时,我觉得是利用学生,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要不怎么发动起来啊?还是利用学生的激情、无知或者幼稚吧!当时中央文革经常接见学生五大领袖:清华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地质的王大宾、北师大的谭厚兰及中学的李冬民等。

李:他们接见通常您都在场吗?

俊:有时候在场。那会儿中央领导经常接见学生和学生代表,参加群众大会什么的,像接见广西代表、辽宁两派代表,总理也参加,都是做工作,说不要搞派性,要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等

等。给我感觉中央文革一直是利用学生和广大群众,达到他们的目的,当时好多老干部被打倒都是学生先造舆论,学生造舆论也都是中央文革想这么做的事情,利用了他们。

李:中央文革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办的是老人家的事情。比如中央文革打倒刘少奇,那是他老人家要打倒的呀!他们只不过是个执行机构。

俊:对,是执行机构。老人家利用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利用了学生,就这么个利用关系。

李:您感觉这种利用有多少是所谓政治斗争(或者权力斗争),有多少是出于所谓“革命理想”,比如我打倒他不是只为打倒他,而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要反修防修呀?

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想把刘少奇打倒,按照法律程序绝对是不合法的,也不合党的组织原则。当时学生无法无天,给刘少奇罗织好多罪名。中南海中办的工作人员斗刘少奇斗得很凶。

李:您在现场吗?

俊:我去过一次,当时场面非常大。我看到大标语、大字报非常多。批斗他的都是中办工作人员中的造反派。

阎:那时候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斗刘少奇主要是戚本禹支持的那一派。1966年底或1967年初,我还搞过一期简报,题目是:《中南海动起来了》,就是指中南海贴刘少奇的大字报。

俊:是啊,实际上主席的意思还是想把刘少奇搬倒。

王: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亲自跟刘少奇说,谁要打倒你呀,我才不打倒你哪!——当时咱们俩(指和阎长贵——整理者注)不都在场听见的嘛。后来,实际情况证明并不是这样。

李:以您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的经历,您能说说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俊:哎呀,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讲不清!我觉得《历史决议》写得还可以:领导人错误发动,是一场内乱。他们之间都相互利用。举个例子,你说林彪,为什么林彪的位子那么高,第二把手?因为文革需要军队支持嘛!林彪主持军委工作,

在军队里的威信很高。我那会儿在部队里,一说林副主席,不得了!部队传达文件都说林总的指示,他发布命令绝对能一呼百应的。主席看到了这些,必须得利用林彪,发动文革需要军队支持。江青、康生、陈伯达也是被利用的。陈伯达是一个典型,他缺乏行政工作能力,就是能写点文章(主席说“我给你那么多官你都丢了”)。这批人当然按照主席的意图来搞了,实际上主席不便说的事、不便办的事由他们去说、去做。江青也是这样,主席给她写信:要她“像杨子荣那样深入虎穴,大胆谨慎,要有勇有谋”。让江青出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比组长还组长,几乎都听她的,她一手遮天。至于文化大革命说什么反修防修,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统统不过是招牌。毛主席是看到了干部脱离群众,看到了官僚主义等等,而在今天这仍然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没有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想法:要监督,谁来监督啊,不仅要党内监督,还得要党外监督,关键在于政治民主。

李:其实毛泽东看到了这个问题,想解决?

俊:想解决,没找到途径,而且挺悲哀的,一辈子想解决这些问题,也没解决。关键是政治体制问题,需要改革,一改革就涉及权力问题,涉及最大的利益问题,这就要命了!

阎:你刚才说毛主席给江青写信,要“深入虎穴”等等,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从来还没看到过。

俊:我是亲眼看到的。我可以保证中央档案馆能查到,因为主席的批件都有塑料包着的。这个,我的感觉好像是1968年的事。那意思是批评她不太谨慎,有时候说话办事不严谨,得改一下这毛病,才能把事办好,所以“你要像杨子荣那样深入虎穴,大胆谨慎,要有勇有谋!”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若干情况

李:您工作过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个很奇特的机构,几乎所有的成员先后都被打倒。其中有些人文革后得到平反,比如陶铸、王任重。而另一些人,无论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后打倒的,至今还是所谓“反面人物”,比如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因此对他们的描述往往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 1967 年 12 月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工作人员

流于空泛和政治化,其中还有一些丑化,这对他们也是不公正的。希望您从近距离观察的角度,谈谈对他们的看法。比如康生,你跟康生有过接触吗?

俊:有过接触,但不多。他平时跟办事组工作人员话不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挺清高,对底下人挺漠视,根本不在意。我们对他也不害怕,因为他和别人不怎么接触,不像江青,还没来,就震唬住了,服务员也很紧张,哪怕万一房间里有个苍蝇、蚊子,那都不得了。

有一次康生通过戚本禹给我们安排了一项任务。就是中办机要局受到一些单位造反派的冲击,挤得水泄不通。戚本禹让矫玉山和我去做工作,叫他们不要冲。我们去了也拦不住啊!造反派把矫玉山白汗衫上洒了好多墨水,矫玉山在那儿嚷嚷半天,他嚷完我接着嚷,也不行。后来,戚本禹告诉我们这是康老让去的,康老指示:谁也不能冲机要单位!机要局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让外边的人冲(那些所谓“外边的人”,都是中央下属的机要部门的)。我们出来的时候灰溜溜的,因为人家不欢迎你干预这事。对这件事我们写了个简要汇报送给康生的秘书黄宗汉,也就无下文了。几年前,黄宗汉病逝了……

阎:他死了可惜啊,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了解很多情况。

俊:对,他经历全过程。文革前康生组织写《九评》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文革后,到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政治经济学教授。

阎:康生去世后,黄宗汉当上了副军级的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俊:康生去世后他的几个秘书都安排相当好,黄宗汉到军委办公厅当副主任,李鑫当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齐景和到中央组织部是正厅级干

部。后来,我到黄宗汉家去过一趟,我说你的安排真不错!他说康生临终跟汪东兴说的,有遗嘱:一定安排好。

康生连他的服务员都安排得不错,钓鱼台服务员杨德田一直在八楼照顾康生夫妇,康生散步走到哪儿,他把躺椅搬到哪儿,后来康生把杨的老婆、孩子全给搞到北京来了,安排了工作,安排了房子。

阎:文革后我到黄宗汉家去,见他厅里挂着好几个条幅,都是高级干部和名人赞扬黄宗汉的。我问他这件事,他说,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组织大权、宣传大权都归康生了,因为康生有病,所以许多文件是他起草的,然后康生签上字,就生效了,有些人得到了解放或安排了工作,所以很感谢他。

李鑫当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来生病去世了。现在写的抓“四人帮”,没提到李鑫,据汪东兴说第一个向华国锋建议把“四人帮”隔离审查的是李鑫。前两年,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写的抓“四人帮”文章,谈到李鑫的建议,在一个刊物发表的时候给删掉了,他专门去问过:“为什么删掉?”刊物回答说是上边的意见。

郑:一朝天子一朝臣,比如现在中央对康生是完全否定的,那么他的秘书李鑫就是坏人了,就是这么一种逻辑。对黄宗汉我非常奇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到各处做报告,说康生在粉碎“四人帮”当中的作用,说康生临死之前指出江青有问题,等等。

王:当然,康生这个人确实不好。就拿赵永夫事件说吧,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的司令员,在一次大会上抓赵永夫,我在场。总理找了几个老帅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逮捕赵永夫的事情。是王力起草的文件,我去京西宾馆亲自交给总理

的,总理当时就签收——因为是绝密文件嘛!在会上就要抓赵永夫,康生在会就审问赵永夫,问他三几年在华北参加过什么?当场就说他是特务、汉奸,就给戴上了帽子,在会场就铐上带走了。

阎:我见过中央文革的成员接见内蒙古的人。康生当着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处书记王逸伦的面就说:我看你面相就像个特务!

《王力反思录》还说过康生的好话,说他保护文物什么的。听广宇说,康生对砸孔庙不满意。

王:是,康生说孔庙不能砸。那天有人报告,北师大谭厚兰带人去砸孔庙,正好他在值班室,为这事甚至拍了桌子,态度很坚决。

好像有这么一条罪状,说康生大量地侵吞国家重要文物,而且罪行很大。

阎:康生的秘书黄宗汉说:康生临终前,我们曾问他,你要不要留给子女几件文物?他说不要,一律交公。康生给子女分文物没听说,也没听说康生的子女拿走了他什么文物。

俊:后来,我从曾在康生办公室做生活管理员的杨德田那儿也听说,康生临终时嘱咐他将所有文物一律交公,不留给子女。此事是由杨德田具体承办的。

康生住的八楼,我去过好多次。他喜欢古董,他的房间里古董特别多,特别是文房四宝、字画特别多,有挂着的,另外有几个大盆插着一轴一轴的。陈伯达的房间古董也特多,有裱过的字画,有文房四宝。

康生经常看电影,就在他的楼底下大厅,同工作人员一块看。

李:听说江青跟康生关系不错?

俊:康生给我的印象是他跟江青的个人关系不错,江青看电影经常有他陪着,他再困再累也陪着江青。有时候康生陪着陪着就睡着了,江青说别打扰他,睡觉是最幸福的。等电影完了,康生还在那儿睡呢。平时江青打电话叫他干什么他都来,有时候她跟张春桥、康生单独商量些问题。康生有个特点,开会穿拖鞋。不过比较起来,他好像请假比较多,后来康生的身体就不行了,请假也就更多了。给我一种感觉,康生基本听江青的。江青对康生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她跟陈伯达常发脾气,对康生从没发过脾气,对张春

桥、姚文元也没发过。好像给我们的感觉是:尊重康生,依靠康生(江青称呼他“康老”),而张、姚是她的得力助手。

王:你对张春桥、姚文元怎么看?

俊:他们什么事都特别谨慎,不轻易表态。姚文元这个人有时神神道道的,记得有一次他从楼上突然下来到我们房间转一圈,走了,也不知道干什么。一会儿又来了,他坐这儿,我在对面,他口述让我记录:“当前大批判的方向……”他嘴里念叨着,我就记录,念叨完了我记录完了,就交给他的秘书,时间不长清样印出来了,他稍加修改就是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社论。

李:社论都口述啊?

俊:字不多,也就两三千字。

王:他写完社论都要送给主席看吗?

俊:他是特别谨慎的,而且摸不出什么规律来,很少轻易表态,大的社论说要送主席审阅的。

李:姚文元平时跟你话多吗?

俊:话不多。张春桥话多一点,他有时候还下来到我这儿看一看,问问情况,张春桥好像城府很深,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觉得张春桥的知识面宽,能力也比较强,写过九大政治报告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写东西有个特点,正好和姚文元相反,他胸有成竹,写的草稿干干净净的,几乎都不改什么,姚文元写得很快,但是很乱,涂改很多。张春桥写东西的时候,有时打开录音机,听听音乐,他在房间踱来踱去,酝酿文章,听完音乐再写。夜里有时候写到两三点钟。

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个规矩,我觉得这点还挺好,晚上送夜宵不要女服务员而让男服务员或警卫员送,不让女同志上楼,在这点上确实很注意的。我接触他们没有乱七八糟的事,两性关系的事一点都没有。张春桥爱人文静在上海,姚文元爱人金英也在上海,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把家属带来,后来都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了,张春桥也没让文静过来。姚文元的爱人后来才给调过来。他们都是很不顾家的主儿!

张春桥跟工作人员相处比较平易近人,他从上海来,几次都是江青秘书打电话让我去机场接他,江青秘书杨银禄跟我说必须得说“代表江青”去接他,还有王良恩代表中央办公厅去接。

李:张春桥从上海到北京一般你们两个人同



李传俊(右一),1969年8月摄于中央文革办事组办公地点(钓鱼台十六楼)

时去接?

俊:同时去接。到机场以后张春桥下了飞机,握握手,车都准备好了。到那儿我给他敬个礼,说:“春桥同志你好!我代表江青同志来接你。”王良恩也给他敬礼。接了以后,当时也没有开道车,坐“大红旗”,我在前面,他跟我聊天,聊聊北京怎么样啊,社会发展情况。很自然,他没什么架子。

李:你一般都跟他说点什么呢?

俊:我不主动跟他说话,他问我就说。他问:你们现在工作忙不忙啊,累不累啊?因为他也没带秘书,所以他早晨起来在钓鱼台散步,有时我陪着他,他就跟我聊天,他说你要忙就不一定陪我了……

王:张春桥确实比较平易近人,在他手下工作和在江青手下工作不一样。姚文元那人就平时话语不多。

俊:姚文元学英语很刻苦,从广播事业局借来录音磁带听发音,晚上自学,后来杂志他都能看了,挺聪明的。他这人的脑子专走一根筋,感情不太丰富,不像张春桥。张春桥你要到他办公室去,还有点笑容。比如有时我去跟他说杨银禄又来电话了,江青请你看电影。他就说,哎呀!你看我手头上的事还没完呢,半截思路打断了……我说要不就告诉杨银禄不去了?我刚要

出门口,他说:“算了吧,我还是去吧,让司机备车!”

许世友来北京要求见张春桥,因为当时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我们就把这个记录送给张春桥看,张春桥跟我们说“不见,就告诉他没时间”。

李:许世友见张春桥,要通过中央文革办事组?

俊:当时张春桥还没有专门的秘书,他的秘书何秀文在上海,十大以后他在北京稳定了,才又给他安排了专职秘书。

李:在以往的传说中,总是说许世友不买张春桥的账,总给张春桥难堪,根本不理他!现在照您一说,事情是反着的:许世友要见张春桥,张春桥不见他!

俊:因为当时张春桥地位高啊,是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才是军区司令员。我记得许世友秘书两次电话说要求见,我亲自跟张春桥本人说的,张春桥说不见!

李:那您怎么回话,也跟许世友秘书说张春桥不见?

俊:说“没时间”就完了。

李:跟张春桥共事,您还记得还有点儿什么事吗?

俊:后来,他看我们清理文革小组的资料里有30年代的作品,有从韦君宜和杨述家抄的画册,他说你给我拿来看看。里面有关美学方面的,有人体美、裸体的摄影等等。他说,看完我会主动退给你的。果然,几天后就退给了我。

李:张春桥和姚文元平时看什么书啊?

俊:姚文元的书,连线装本都有,因为姚文元让我们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去买过好多书,一大摞。

李:都是抄家来的?

俊:对,但都作价了。那当然优惠了,大概一本也就一两毛钱吧,买了一摞。他看书特别快,线装本老书没多会儿就翻完了。他文学方面还是不错的。张春桥也爱看书,但张春桥很文雅,经常听听音乐。大部分都是施特劳斯的,他在房间地毯上漫步,哼着小调。

我记得有这么件事:1967年2月所谓“二月逆流”,老同志大闹怀仁堂嘛,三老四帅对中央文

革不满嘛，拍桌子了。当时叶剑英写一首词：“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这是忧国忧民，对文革不满，但套用的词牌是什么，出处在什么地方，当时谁都不回答，问郭老（郭沫若）也没音信。当时张春桥就说这不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嘛：“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是他对现实社会不满！这个出处就找到了。还有《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给张春桥写信，她说她现在很苦闷，她想再写《青春之歌》第二部，请求张春桥给一点指示。像这些文人，他都有交往，而且他这方面的修养不错。

李：他那房间里的书主要有什么呢？

俊：历史的比较多，文学的，哲学的。

李：有马列的书吗？

俊：当然有了，这是每个房间必备的。他读的比较，古书看的也多。特别姚文元古书特别多，一有时间就看书，博览群书，绝不浪费什么时间。不愿意看电影，两人都不愿意陪江青看电影，但是也都没办法，也都跟着去。

李：他们有点生活情趣方面的享受、爱好没有？

俊：像姚文元基本看不出来，就喜欢看书，有点苦行僧的劲头。张春桥就是有时候自己吟诗，在房间里踱步，听听音乐，朗诵诗，有时在钓鱼台的湖边散步时哼两句。大部分是吟诗，背诵名人的，我觉得他挺有情趣。有时候跟孩子通电话，还有点父爱的亲情。书画也有，但没看见他自己写和画的。

他们吃饭也很简单，三菜一汤，当然做得比较细了，肉丝切的比头发丝粗点吧，就这么简单。包括碰头会，吃的也是家常菜。

李：他们在生活上比较好侍候吧？

俊：比较好侍候，没这么多事。衣服有钓鱼台的洗衣房，饮食有专门厨师，出行有专车。那时他们生活还是比较朴素的。

李：有人写文章说，张春桥是“摇羽毛扇的”，形容他有点阴险，您在日常相处当中有这种感觉吗？

俊：因为他们之间商量事的时候，我接触不了，张春桥的个人私事更无法知道，我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接触不到本质问题。

李：王、关、戚您都接触过？

俊：王、关、戚就接触多了，因为王力、戚本禹在我们楼上，关锋在十五楼。王力这个人很和气，我给他送文件很和蔼，从来也没有发过什么脾气。相反，戚本禹倒稍微牛点，年轻气盛，他是中央文革成员当中最小的，比姚文元还小一岁，一九三一年生，当时才三十五岁。他写那个《忠王不忠》评李秀成的文章，总理都夸他是青年历史学家嘛！他原来在中办秘书局信访处工作，有时候爱发脾气，我看跟他的秘书程里嘉瞪过眼，有时候对底下的人不是太客气。给人的感觉好像有点傲气，个子高高的，也有点派头，人称“戚大帅”。

郑：关锋呢？

俊：关锋在十五楼，接触最多的是他的秘书瞿怀明，关锋也挺和蔼的。

李：其他的小组成员您还有没有深刻印象的？

俊：穆欣比较早就离开了钓鱼台。王任重、刘志坚是副组长，他们时间也比较短，当时他们的老婆、孩子都住在钓鱼台二楼，各带两个秘书。1967年1月，王任重、刘志坚都被打倒了。刘志坚对底下的人比较苛刻，刘志坚刚一倒，他本来腿不好，警卫员小黄还踢了他一脚。

李：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间，您还观察到哪些外人不了解的现象？

俊：我看出来江青跟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整理者注）有矛盾。九届二中全会后，在一次批陈整风的华北工作会议上，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总理，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江青说陈伯达是你们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然后提到了关于河北磁县武斗是陈伯达搞的，挺厉害的。她说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也可以挖碉堡，也可以设铁丝网，文攻武卫嘛！没什么了不起的！江青说的是对付武斗升级的问题，吴法宪在旁边说：“江青同志你还懂军事啊？”江青大发雷霆，拍桌子说：“我跟随毛主席三十多年，怎么不懂军事啊！”把吴法宪给顶回去了，吴法宪挺尴尬的。这是华北工作会议上的一个小插曲。

李：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怎么样？

俊：当时我看出江青跟总理有矛盾。当然，我看到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原来参加会议的

时候总理都带着秘书周家鼎或钱家栋,他们都是大秘书,后来还有赵茂峰、孙岳,这四人都带过。有一次周家鼎、赵茂峰在办公室跟我聊天,聊得还挺热乎,江青进来了,她挺生气的,那意思好像我们背后议论什么事,实际上我们就随便聊聊。不知江青跟总理说了一句什么,后来总理再也不带秘书到十六楼来了。只带警卫小高(高振普)、护士和医生张佐良或卞志强,他们这几个人轮流来。

1968年7月27日,就是中央派驻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那天晚上,工宣队、军宣队已准备就绪,等待命令。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问题,碰头会商量好了,总理说请示主席去。总理就让秘书打电话问:“主席休息没有?”说可以来。总理就提着皮包要到主席那儿汇报。此时,江青匆匆出来了,连忙说她去。总理就说你去吧。总理在会议室等了有两个多小时,江青才回来,说主席同意马上派。这命令一下,当天晚上工宣队、军宣队就进驻清华、北大了。

平时我看见一散会都是江青第一个乘车,总理礼让,当时对江青这样做我们挺看不惯的!总觉得江青对总理尊重不够。

中央文革办事组退出历史舞台

李:关于中央文革“散摊儿”的事,我想听您认真地说一下。文革这场暴风雨过后,文革办事机构最后负责打扫残局的就您一个人?

俊:背景是这样的。九大之前是真忙,好像有点代替中央办公厅工作了。按照毛主席的说法中央文革代替中央书记处,那文革办事组当时就相当于办公厅。办事组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通知开会、组织活动、会议记录,跟随领导到大会堂接见人,等等,确实是挺忙活的。记者站也是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基本是代替一部分新华社工作,办信组代替中办信访局,每天有几大麻袋群众来信。九大以后工作就逐渐少了,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还在十六楼开,也由办事组通知,我记得一直到1970年,有一年多的过渡吧。

李:这个期间,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日常活动都做什么事情啊?

俊:九大开了以后,产生新的政治局了,会议刚开始还在钓鱼台十六楼开,但不叫文革碰头会了,叫政治局会议。

李:办事的还是办事组这些人?

俊:还是那些人。但工作陆续由中央办公厅接管了,像文件类的印发由办公厅秘书局来管,会议由秘书局会务处来通知,钓鱼台的管理人员负责会议室的清理。开会时接电话也不少,都是内部电话,比如说总理找谢富治,我们也得给他找,总理说请李雪峰(时任河北省委书记)来,由我们打电话去请。会议的服务工作像汪东兴说夜宵吃什么,通过我告诉服务人员,就这些事务性工作。

李:会议用的材料打印不在这儿?

俊:不在这儿。

李:那会议形成的纪要整理也不在这儿?

俊:不在这儿,我们谁也不参加会议做记录。汪东兴是政治局委员又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有事就找王良恩去办,王良恩是办公厅副主任。一切具体事情都由办公厅做了。

李:什么时候就进入了收尾工作了?

俊:1970年就开始收尾了,是汪东兴秘书高成堂通知说:“你们清理所有的文件,登记造册。”清理文件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因为文件太多了,到1972年春节后才完的。

王:戚本禹、王力、关锋的文件是不是也都要清理?

俊:对,所有的东西嘛,他们的房间始终都是关着的。我们清理的时候包括抄家的东西,都给清了。

李:当时有多少人负责清理?

俊:有五六个人吧,我负责。有二十三军一个叫赵明学的,中办信访局的魏登甲,中办机要局的郭亨乾,北京卫戍区的姜才熙。姜才熙后来也倒霉了,只因当时江青规定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不准出去,姜才熙老婆生孩子不能回去,他十分不满说不讲人性,“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结果有人写信报告了,王良恩报告了汪东兴和江青,让他立刻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并给他写一个鉴定说“在工作期间由于对自己要求不严,讲了不应该讲的话”。姜才熙回卫戍区部队后不敢用他,第一批就转业到武汉了。

李：您的任务就是把中央文革小组所有的文件、资料、物品都登记上，还有其他活动吗？

俊：“九一三”事件出来以后，中办还通知我参加大会堂三楼小会议室军以上干部会议，听林彪事件的报告。这段时间让我们揭发、批判的事也不少。我们原来是揭发批判陈伯达，后来又揭发批判林彪。

李：除此之外大概两年时间都是在清理文件？

俊：对。

李：当时清理文件有哪些要求？

俊：一是分类。就是把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央文革的文件，包括文革《快报》《简报》，所有的文件都分类登记，按等级。另一类是所有的传阅件，也登记。这里还有主席亲自批的原件，《要事汇报》大都是主席亲自批的，我记得有山西陈永贵请示汇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还有“七二七”进驻清华、北大的主席批示，我们就分类登记。

当时有规定：凡是主席的批件一定要用一个塑料套套上，便于档案馆保存。所有领导人都用铅笔写东西，铅笔才能留得住，保留时间最长的就是铅笔，比钢笔要长。

王：有烧的和毁的吗？

俊：不让，一片纸都不要落下，都要原封登记。包括矫玉山抽屉里工作人员交的党费，有一千多块钱哪，一分一分地点，注上“工作人员的党费”，还有矫玉山的笔记本。

王：我那个办公桌和卷柜里东西很多，毁没毁？

俊：毁是没毁，我们都登记上了，都交给中办了，而且中办来人一一核对，当时中办挺严格的。

李：除了您说的大量文件、《快报》《简报》、传阅件等等，还有什么？

俊：还有电话记录和会议通知，各种抄家的物品。书比较多，还有画。古董好像就是印章、文房四宝这类的，我记得有油画，韦君宜的，当时挺有名的。这都是艺术珍品啊！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画报，展示东方的、非洲的、西方女性美的裸体照片、人物画。还有古书，都黄了，都是抄家来的东西。

李：登记的时候还登记是从谁家抄的吗？

俊：只要有来路的都登记上，不知道的就没

办法了。比如画是韦君宜的，写着韦君宜的名字呢，韦君宜本人画的。还有杨述，他俩是两口子，这肯定是抄他家抄来的呗，好像是老王拿过来的。

还有大量送给中央文革的礼品，毛主席像章多得很。还有送给毛主席的茶叶，当时就打电话问这茶叶怎么办？回答说就放你们那儿吧。给毛主席送的东西挺多的，茶叶呀，各地的特产什么的，各地制作的工艺品，整整一大屋子毛主席像章，还有其他好多礼品。

李：这些东西都能登记上来路吗？

俊：咱们只能登记毛主席像章来自什么地方，有的写着呢，有的还附上一封信，信都打开过，送的礼品没什么保密的。

李：当时给毛主席送的礼也就这些？

俊：对，没有别的。

李：通过文革小组送上去的，就是纪念性或政治性比较强的？

俊：对。来了以后我们就请示，回答说就放在你们这儿吧！

郑：那些茶叶搁久了也不行啊？

俊：搁久就搁久了，那怎么办啊？那也不能动啊！谁也不敢动，谁也不会偷着分了喝了。连周恩来十六楼喝茶还记账，一角钱呢！很廉洁啊，这是真事！让卫士高振普记账。

李：这么一大堆礼物，除了送给毛主席的，送给江青、陈伯达的有吗？

俊：送给中央文革的比较多，是写着“中央文革收”，我们收下。送给个人的我们就给他们的秘书打电话，一般就回答说“放你们这儿吧”。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都有，我们就放这儿。

李：他们本人知道不知道有人给送礼物啊？

俊：我估计大部分都不知道，因为到秘书那儿就打住了，太多了，这都是小事。

李：下边的“革命群众”捧着一副热心肠，到那儿连“中央首长”本人都不知道啊！

王：刚开始还有人给中央文革捐款呢。刚才你说矫玉山办公桌里存的钱，那里面是群众的捐款。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表示支持文革，给寄钱，都不多，几十块钱。所以你刚才说矫玉山抽屉里的钱应该不是党费，咱们党费都在原单位交。就是捐的，咱们不是没财务嘛，也没开支，所以收入

都放在矫玉山的抽屉里。

俊：后来矫玉山还问我他的东西动了没有，我说没动，你的茶叶盒还在呢，一个一个、一件一件都登记上交啦！

王：我的抽屉和卷柜里有几部分东西比较重要，一个是陈伯达、康生接见时的记录，接见的这些人都是比较重要的干部，比如康生接见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还有监察部的人，都是用纸记的。再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的记录，我参加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做记录，我把主席的讲话记录都整理起来了，就是经我手办的事我都没丢，全都在那儿呢！

俊：你放心，丢不了，都给登记上了。

王：还有一个重要材料就是张根成和周占凯收下的成立革委会和接见各地红卫兵的录音。

俊：录音还有，录音带都是大盘的。反正我们当时都登记上了，作为一类吧。

王：这个事赖不掉的。会上江青、陈伯达怎么讲，都录了，还有速记录，中央办公厅有个速记员，专门速记，我们拿来，没“翻译”过来。这都很重要，对研究文化大革命、写文化大革命史是有用的。

还有一本咱们中央文革办事组搞的刘少奇的材料，合订本将近寸厚，这是咱们自己出的。

俊：有，一大厚本！

王：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重要的，当时没时间看那些东西。

阎：审判的时候拿出录音让陈伯达听，让江青听，可能就是从那儿来的。

李：录音这是一部分。还有没有其他照片之类的？

俊：照片就很少了，有那么几盒是毛主席、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联合接待站工作人员，那照片是1967年12月照的。

李：在清理文件中您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吗？

俊：比较深刻就是涉及总理那件事，这也是算大事。大概是1970年7、8月清理文件的时候，发现一张旧报纸报道关于“伍豪事件”那个事，因为这算是大事啊，我们把它密封着移交中央办公厅。不久王良恩把我叫到中南海，到一个挺深的院子里的办公室，他很严肃地说他“受汪东兴同

志委托跟你谈一件事”。就是关于总理那件事，让我至死不要说，绝密！“这是给你的一条纪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说，这件事主席早已知道”。我说：明白，我按您的指示去做。谈完，他让我走了。对这次谈话我感到很紧张！

王：中央文革办事组何时结束工作的？

俊：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逐渐减少，大量工作由中央办公厅取代了。不久，汪东兴批示中央文革办事组清理文件，大约两年时间完成的。1972年4月文件清理完毕，全部移交中央办公厅并办理了正式手续，中央文革办事组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责任编辑 黄钟）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
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
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 晏乐斌

一、广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1981年4月至6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下面记述的是我们调查了解的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部分问题。

死死捂住广西“文革”的盖子

广西在“文革”中是全国的重灾区,死人很多。可是“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执行,生产上不去,经济滞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全国倒数第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这里当做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农业生产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在思想战线上,两个“凡是”之外,广西还多一个“凡是”一直在坚持,即“凡是韦国清同志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决照办”。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西出现一股奇谈怪论,说“广西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贯彻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说“全国其他地方执行林彪、‘四人帮’路线,广西没有”,等等。广西的造反派控制着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的大权,并自成体系,向中央封锁消息,捂住盖子。谁要是触犯了他们,揭露了广西问题,轻则受到打击报复,撤职调离,重则受到镇压,判刑投入监狱劳改队,甚至处死。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慢慢察觉和发现了广西的一些问题。

中央第一次派调查组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了20多人的调查组,赴广西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和“文化大

革命”中的问题。我们一行在广西工作了两个多月,听取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汇报,调阅了部分档案材料,分别到南宁、武鸣、桂林、临桂、马山、凤山等地、市、县和几个监狱、劳改场所,还召开了一些座谈会,收到人民来信3000余件,接待群众来访700多人次,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干部、群众。

可是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两个多月里,工作组每到一处都受到区党委派来的人的严密监视,为我们设置重重障碍。我们是6月23日结束工作离开南宁,6月25日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钟绍僮等5人控告我们调查组的材料,就已送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后来韦国清同志看了(我们调查组的报告),也(向中央)写了很长的控告、反驳(我们调查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1984年1月14日下午在听取广西区党委汇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时的讲话)

中央第二次派工作组

1983年3月,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赴广西工作组”名义,派出一个40人的工作组,赴广西协助解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

1981年的调查组只是调查了解情况,无任何权力,而这个工作组中央给了一些实权,如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参加广西区党委常务会议,工作组成员根据需要,有时列席常委会议,有一定的决策权力。当时我负责掌握了解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以及自治区公、检、法、司法、安全(正在筹建中)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进度、问题、领导班子建设、班子成员人选和清理“三种人”的问题,随时向工作组组长提出报告与建议。

198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

工作组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宋任穷、习仲勋的直接领导和过问。工作组领导成员有李锐、周一峰等人。工作组于1983年4月初至1984年1月下旬,广泛接触了广西各方面的人士,并直接派人参加一些自治区党政机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和考察领导班子情况,就重大事件、重大问题派出工作人员配合区党委,进行重点调查了解。自治区党委、政府为了处理解决好“文革”遗留问题,组织了相应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100多人,分赴全区12个地市和一些大型厂矿企业单位、大专院校。各地市又都派有工作组到各县市,全面地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我们工作组在南宁期间,接待群众来访达8000多人次,收到群众来信2万余件。全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一开展,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与加强,广西问题的眉目逐渐清楚起来。

二、死人问题

“文革”期间的死人问题,是广西的特殊问题,是我们调查组、工作组到广西后广泛接触到的一个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爆炸性、危险性的问题。

广西“文革”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

1979年1月,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称:1967年、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1981年调查组到广西时,据自治区处理“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区党委书记赵茂勋主管,公检法三长参加,简称“三人办”)汇报,1967、1968年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2.7万多人,干部、群众1.7万多人(不包括自杀数)。

当时全区12个地市,我们调查组仅据南宁、桂林、玉林、钦州4个地区和南宁、桂林二市党委的汇报,“非正常死亡”就有4.7万人,如果加上其余6个地市和区直机关以及柳州铁路局单位,死亡不少于10万人。1981年6月30日,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向中纪委汇报时说:“文革10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有的干部、群众反映死了20万人,也有的说死了50万人。当年韦国清同志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楷私下谈话时,说广西“文革”中死了15万人。众说不一,各执一词,究竟死



文革宣传画

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

1984年1月,我们赴广西工作组行将结束、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入扫尾阶段时,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根据全区各地(市)、县、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统计表明,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

死的是一些什么人,怎么死的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广西“文革”中死人,一是武斗打死的;二是刮“十二级台风”,贫下中农处决了一批四类分子,这是多数;三是造反派乱抓乱杀保守派的一些人,保守派翻过来后也乱抓乱杀了一些造反派。1981年的调查组和1983年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是:

一是乱打乱杀的多,武斗死的少。桂林市

和桂林地区是武斗比较激烈的地方,但在1967、1968年两年死亡的11027人中,也只有458人死于武斗,占4.1%。南宁地区的武鸣县死亡的2197人中,武斗打死的仅3人。还有许多县、市根本没有发生武斗,也死了很多人。

二是干部、群众死的多。南宁地区14个县、市(不含自治区、地直属单位),死亡16494人,其中干部、工人、社员死9739人,占57%,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6755人,占41%。桂林地区“文革”中死亡的11612人中,干部、群众死亡7461人,占64.2%,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亡4151人,占35.8%。临桂县死亡1865人,干部、群众死亡1406人,占74.8%,四类分子死亡458人,占25.2%。

三是对立派“4·22”死的多,掌权派“联指”死的少。如,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中,“联指”成员仅4人,绝大部分是对立派“4·22”成员,四类分子死414人。凤山县城厢公社死亡的285人中,持“联指”观点的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临桂县死亡的1865人中,“联指”成员只有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其余1862人是被有组织有领导地杀死的。武鸣县葛阳大队杀死73人,一个“联指”成员也没有。

1981年自治区“三人办”向中央调查组汇报说,死人主要发生于从湖南、广东刮来的“十二级台风”,由“贫下中农处死了一些人;革委会刚成立,因为没有权威,群众乱杀了一些”。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1981年我们调查组和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自治区各级“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上报的结果,杀人是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多数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进行的。

大批死人的历史背景

广西“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分成明显的两派。1967年3月,广西军区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要求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领导广西“文化大革命”。当时有的群众组织提出要韦检查后再定,而区直机关群众组织“公安兵团”、“红色监察”、“造反兵团”等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4月29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发表声明,支持前者,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搞“三结合”。于是,围绕着“支韦”还是

“反韦”问题,形成了两派,前者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者称“4·22”。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广西军区开始是支持“联指”的。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当时在全广西,除桂林市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

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压“4·22”。这是当时的基本形势和情况。但是,死人最多集中在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个高潮。

第一阶段,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在农村全自治区刮起了一股“红色风暴”,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起来造反,要杀干部群众,说“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于是在农村中成立起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4·22”观点的人。其中靠近湖南零陵地区的桂林地区各县,尤为严重,有的四类分子之家被全家杀绝。“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开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中纪委、组织部等六部委《关于广西落实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附件之一,1981年7月15日)。1968年3月,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在县四级干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敌人专政,要经过公安、法院,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实行群众专政,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群众不同意”。全县于同年的三、四月间乱杀了一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和被认为是坏人的人。临桂县1967、1968年两年打死的1865人中,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459人。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全县共杀死2900多人。他们用“种花生”指枪决,“种芋头”指石头打死,“种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语统计杀人数字。当时被杀害的贫下中农、干部、群众,在1983年全区处理



广西文革武斗中被俘人员

“文革”遗留问题时，他们的遗属与子女还可以去找政府、党委落实政策，要求给予一定的抚恤与生活补助，要求追查凶手，可是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他们去找谁，向谁去申冤啊！

第二阶段，是各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其名义之一是保卫红色政权，二是抓“反共救国团”。广西各县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间成立革委会，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且多数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杀的。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和四类分子被杀，其中，被杀的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社员632人，四类分子761人；老游击队员48人，共产党员97人，共青团员13人。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由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县武装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原副县长崔振铎、原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策划下，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群众称之为“杀人部”，向阶级敌人专政。从此开始，该县共死亡14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几十人，县革委会成立前乱打乱杀死亡300多人，革委会成立后，由季德春等人策划、煽动，有组织有领导地杀害了900多人。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间，在县革委会

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组织、指挥下，以“保卫红色政权”、“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等名义，致使该县乱打乱杀，逼死了3890余人，是南宁地区死人最多的县之一。

广西军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出于政治目的，于1968年6月17日，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已被破获结案、审判处理过的玉林县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第十大队”为主体，和浦北县六万山区的“罗平党”案等，拼凑成1968年4月“破获”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集团

案件”，向自治区各地、县、市张榜公布案情，号召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同时还把这个“反团”案与“4·22”群众组织挂钩，混为一谈，联系起来“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剿灭反共救国团匪徒”的活动，在广西全区城乡普遍开展，把参加“4·22”组织或倾向“4·22”组织的干部、群众，加上“反共救国团”罪名，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杀了一大批。融安县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上访团对我们工作组来信反映：“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会成立到9月底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全县杀了三千多人。其中县革委会机关所在的长安镇，杀了八百余人。大将公社小圩镇龙妙街杀死45人，成了寡妇街，至今每逢过年过节到处是悲惨的哭泣声。有些老人讲：当年日本强盗侵占长安镇，进行屠杀时一天最多杀了17人，而1968年8月21日，一天就杀了100多人。他们愤慨地讲：这帮杀人强盗，真比日本鬼子还凶残狠毒。”

在老革命根据地凤山县，“文革”开始后，以老红军营长廖熙英为首，以革命老人、老游击队员为骨干，成立“革老派”，副县长覃家修也支持“革老派”观点。广西两派形成后，“革老派”支持“4·22”。当时同意“革老派”观点的群众、干部占全县人口的95%。由于“革老派”力量雄厚，1968年2月占领了县城，“联指”逃去东兰县。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公布“反团”案案情之后，凤山“联指”派组织乘机于7月7日发出关于围歼“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凤山分团覃、廖匪帮”的总反击令，

又调去了11个县的武装民兵,配合6911部队围剿“革老派”,名曰“剿匪”,实为协助逃跑在外的“联指”打回凤山,“革老派”被打死打伤20人,抓走16人(其中13人被杀),“联指”夺回了县城,“革老派”全部逃往农村。县革委会成立后,上面派去了9个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军队进驻凤山,“革老派”的大小头目大部分被杀,一部分被抓。全县被抓6000多人,批斗了5000多人,杀死了3000多人。有的全家被杀光,很多军烈家属全家也被杀光,许多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被杀,全县地下党被打成“叛徒集团”。可是1981年5月凤山县委向我们调查组汇报说:1968年6月至10月死了1197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显然没有说实话。玉林地区1968年在围剿“反共救国团”运动中进行的大屠杀,是时任玉林军分区政委甘照寰拍板,参谋长达志、地区造反派头头王×镇主持召开各县革委会、武装部负责人会议布置的,共逼死、打死几千人,其中,陆川县杀害1200多人,容县逼死、打死1392人。原凌云县委书记赵××是被三个人拉出去杀的,当时赵见到县武装部长说:“你要救我呀!”可是这个武装部长不理睬,就这样把赵拉出去杀了。

第三阶段,是发布《七·三布告》以后。这个时期,农村“4·22”的大小头头和骨干大体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消灭得差不多了,掌权者和扶持的“联指”造反派于是挥戈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

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阶段的调查证实,《七·三布告》是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1968年7月3日批准发布的,在这之前的1968年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根据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内定“4·22”是反动组织,将对立的两派设立据点,策划组织武斗,打死干部群众,杀人放火,抢掠越物资、武器,抢部队武器弹药,阻断铁路交通等罪名,都加在“4·22”一派的头上。就在这时候人民解放军驻广西某部打下“U-2”美国间谍飞机,林彪要接见有功人员,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红光带队赴京,事先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亲自授意整理了“4·22”的材料,报给林彪,《七·三布告》就是这样产生的。

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造反

派有了《七·三布告》这柄尚方宝剑,他们控制的报纸、电台,大造舆论,把“4·22”组织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当成敌人,在南宁、柳州、桂林三市,在军队、武装民兵和“联指”武装人员三面包围之下,被彻底打垮,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又被大批屠杀。

南宁市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仕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人,于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南宁市百货大楼、区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轮船对立派据点。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斗人员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指挥,与造反派一起,向解放路、新华街、展览馆、邕江上的轮船等处,发起猛烈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月8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仅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有人看见,解放路打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三天的尸体,有的拉到市郊煤矿的坑道里,有的抛到邕江。为掩人耳目,抬尸体的‘4·22’成员也被‘联指’打死,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漂去的尸体堵住了。”“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条街巷被炮击中焚烧成了一片废墟。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这一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8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6千万元以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广西“4·22”全部覆灭。三个据点攻下后,有的投降,都被“联指”成员杀害,有很多人钻了防空洞,钻防空洞的人,绝大部分被一场无名的大水夺去了生命(系“联指”造反派往防空洞里灌水所致),有的被各县民兵押回在途中杀死。“据不完全统计,

仅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区、市看守所等10多个单位。关押在区看守所的265人,区交通学校711人,南宁幼师441人;有的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共救国团’等罪名的‘要犯’、‘首犯’处理。被‘俘虏’人员交各县民兵拉回去处理共7012人,其中在拉回途中打死和拉回后打死的有2324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46人。”(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三、桂林“八二〇事件”

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联指”造反派在解决南宁问题,围剿、拔除“4·22”据点之后,又着手解决桂林问题,策划、制造了桂林“八二〇事件”,一万余名群众被无辜杀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事件发生前桂林的“文革”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桂林和广西其他地区一样,群众组织因支持韦国清和反对韦国清分裂成两派,前者为“联指”,占少数,后者为“革命造反大军”(简称“老多”,即“4·22”)占绝大多数。

1967年下半年开始,两派多次抢枪武斗。“4·22”三次抢了各种枪支3000余支、加农炮8门。“联指”四次抢了各种枪支7000余支,机关枪10挺。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内两派发生武斗17次。6月下旬,“联指”在桂林军分区的支持下,以“保卫革命委员会”名义,从全地区12个县调集数千名武装民兵进城,形成对“4·22”的包围,导致大规模的武斗。两派在湘桂铁路两侧设立据点,不断冲突,迫使铁路中断。

《七·三布告》公布后,周恩来于7月25日在京再次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提出立即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动员进城民兵回乡。同时,由驻桂林的6955部队派出人员,进驻两派武斗据点,实行武装隔离。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驻军支左小组,又一次发出通令,要求两派必须在8月12日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桂林军分区政委陈秉德也于1968年8月10日向“4·22”表态:“只要‘4·

22’交枪,保证不抓人,‘联指’也交枪。”

经过上述工作,两派于8月12日停火,当晚铁路通车。“4·22”于8月13、14日向公检法军管会交出3000余支枪,拆除了工事,恢复了市内交通,部分人员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宫,等待办学习班。与此相反,“联指”只交了30余支枪,工事未拆,据点未撤,调集来进城参与武斗的武装民兵未回乡,且将武斗人员以市革委名义,改编为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配发了一部分“4·22”上交的武器。

“八二〇事件”是如何策划、发动的

“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斗据点”。(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据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市革委会政法部长、后5048部队副政委朱兆富同志反映:1968年8月初,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在北京向参加部队学习班的广西军区的同志讲:广西问题怎么解决,请示了黄永胜,黄让广西自己拿出办法。经军区研究,先在融安县下手,动用军队,对400余名“4·22”成员,用武力解决。事后,向黄永胜汇报时,黄表扬干得好。这样就摸了中央的底,拟定了用武力解决桂林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由南宁调到桂林,将正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成叫回,共同指挥了这一行动。原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后离休居住桂林的老红军姜茂生同志反映,“八二〇事件”之前,黄永胜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进行研究,是林彪叫开的,吴华等来桂林指挥的。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104部队处长王汝保同志反映:“八二〇事件”行动时,部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由吴华、景伯成、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三人组成。

据这些当事人的反映,“八二〇事件”是在北京预谋,经黄永胜批准,由部队参与,依靠“联指”,调动武装民兵,对“4·22”、干部、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的。

事件经过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公告,以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为名,号召“向一小撮阶级敌人

发动更加猛烈地进攻”。当日凌晨5时,支左部队和上万名武装民兵、“工人纠察队”、“联指”成员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事先划分的地区,手持名单,挨家挨户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仅有二千多师生员工的广西师范学院,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区所属12个县,在同一天行动,全地区抓了一万多人。“八二〇事件”和事件之后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枪杀、打死、逼死干部、群众一万多人。在“八二〇事件”后的一个月,桂林市仅机关、工厂内部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机关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杀害了。临桂县打死848人,仅县直驻桂林单位抓去318人,放了25人,其余293人全被杀害,其中发现一份111人的被杀害人员名单,名单里有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法院院长刘锡臣、副检察长龙炎运、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李景发、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振廷等领导干部,他们被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由县委宣传部干事、“联指”造反派头头胥明德以贯彻“七·三布告”的名义,于8月20日、31日、9月18日夜晚,用汽车拉到漓江边,除一人乘天黑混乱中逃跑外,其余110人全部杀害。仅有41名职工的县医院,杀死了16人。其中,县法院院长刘锡臣是“八二〇事件”时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斗时被活活打死,其妻是县医院的医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体枪杀。就连跑回河北献县老家躲避灾难的17岁的儿子刘振刚,也被抓回打死,说“铲草不除根,以后是祸害”。刘锡臣夫妻和儿子被害后,遗留下一个15岁的女儿刘婵荣和两个幼子,生活无着,逼得15岁的女儿带着两个弟弟到处要饭。1981年5月,我们调查组到桂林调查时,她来找了我们,一边哭泣,泣不成声,一边控诉当时的暴行,在场的调查组的同志听了她的哭诉,禁不住凄然泪下。只有100余人的地区土产公司,杀害7人,该公司8月31日开批斗会,活活打死3人,让“4·22”成员谢定军、金声二人挖坑掩埋,坑挖好后,谢、金二人也被打死,一齐埋掉。9月13日上午,该公司接到上面不准再杀人的通知,下午又杀9人,其中,“4·22”成员吴若君因怀孕临产幸免,孩子生下后,起名叫“保驾臣”。当时“联指”杀人到了疯狂的程度。有一个从湖南到桂林搞副业的社员被盘问

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打围的”,被当成打“韦”(国清)的,当场打死。

无所不用其极

抓起来的人没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联指”以桂林市革委会名义,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搞了一个“‘4·22’反革命罪行展览”,第四展览室是“活人展览”,将抓起来的“4·22”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里,任凭参观者打骂凌辱。

“八二〇事件”后,在桂林拥有10万群众的“4·22”组织,成了历史罪人,受到残酷镇压。无数被无辜杀害的干部、群众,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他们的家属也被当做“反属”或“被杀家属”,有些家住城镇的,被强行迁往农村。特别是那些父母双双被杀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儿,生活极其悲惨。直到1974年才对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19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于×年×月×日去世”的结论。

四、杀人手段骇人听闻

凶残狠毒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刮、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

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的严重事件。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如1968年10月初,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议,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30多个骨干开会。会上黄天辉说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他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采取坑杀的办法,强迫受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云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妻子,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才被依法逮捕,于1985年1月被处决。

人性丧尽

梧州地区公安处一科副科长毛明日,“文革”中被诬陷,两次被逮捕关押,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文革”中被杀,其大弟毛明昭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拉去枪杀时,他抱住一位军代表的腿,要求救他,那位军代表不理睬,还踢了他一脚,结果拉去枪杀了,还将他的头割下,挂在富川县城示众。1983年毛明日同志到南宁找到我们工作组哭诉,是我接待的他。

(上接21页)直到后来我与丛鹭丹先后被解除审查,见面会心一笑,卸下一个沉重包袱。

此文倘能得到有关人士的补充或纠正,我将

1968年柳州市在贯彻《七·三布告》时,中共柳州市委大院抓获35名干部、群众,然后将他们一个一个装入麻袋里,从市委后院推入柳江淹死。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区文史馆副馆长、民族史学家刘介,他四岁的小孙子玩耍时不慎将邻居蔡振华家的一条小狗从楼上掉下,“联指”小头目蔡振华以“打狗欺主”之名,伙同另一名“联指”成员申松华,将刘介一家祖孙三代四口全部杀死,同时还杀死了一名为此讲过几句公道话的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民涵分场的邓斯环,是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的侄子,解放后邓文兴等被政府镇压,“文革”中邓斯环参加了“联指”,乘机进行报复,以“反共救国团”罪名,抓了支部书记邓思凤等26人,其中活活打死、剖腹、割死的有7人。事后邓斯环对人说:“游击队能杀人,我们就不能吗?”

崇左县锰矿党支部书记苏士林等3人来信反映:“1968年8月,‘联指’在全县进行大屠杀,一个晚上,太平镇就杀了24人。被杀者从家里捉起来,蒙上双眼,推上汽车,拉到县城外的半边山,一个一个用刀子捅死。哀号声、挣扎声、哭叫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吓得附近村庄,家家关门闭户,生怕大祸降临,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还不如”。

上思县革委会成立后,1968年9月1日县“三代会”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大会,十多名参加“4·22”组织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以后,县革委会委员黎郝,将打死的十几名死者尸体,全部剖腹,将心肝挖出来,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熟后给“三代会”代表下酒。南宁市徐振武的群众来信反映:“‘文革’期间,武宣、上思、灵山等县发生过吃人肉、吃人肝事件。武鸣县吃了29个人,副县长覃炳刚同志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因人太瘦,周身无肉,又被拖出去丢在野外,遇救幸免”。上思县受害者家属来信反映:“《上思晚报》‘联指’头头黄元清等4人,将参加‘4·22’的女青年杨振明、刘吉芬抓起来,多次轮奸后杀害。■

(作者为公安部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黄钟)

十分感激。因为历史不能被弯曲和掩盖。■

(作者为原浙江省公安厅侦察干部)

(责任编辑 黄钟)

策动朱德政变的匿名信案

○ 杨宪澄

1966年8月,文革正在拉开序幕,在林彪“政变经”发表三个月后,紧接着就发生有人从杭州发信,策动朱德老师起来发动政变的匿名信案件。具体案件情况如下。

据当时公安部一局派专人来浙江省公安厅介绍称:8月中旬,朱德乘专列从北京到兰州刘澜涛处,刚下车就收到从杭州寄发请刘澜涛转交朱德老师的匿名信,信中要朱德以他的威望把毛主席搞掉。朱德接信后立即调转专列赶回北京将信呈交给毛主席。公安部谢富治部长定为第一大案,因为是杭州发信,邮戳日期为8月8日,所以立即派专人带来信封与部分信笺的影印件(当时没有复印机)来浙江公安厅督办。

浙江省公安厅由副厅长丛鹭丹负责,抽调刘德芳、谢士栩和我一共六七人成立专案组着手侦破。此案因发信邮戳为8月8日故称为“八八大案”。

此信书写笔迹没有伪装,判断为作案者大胆妄为:语词流畅,有颜体功底,字体端正,每字小核桃般大(1956年毛主席在杭州,厅领导要我将海外重要情报照上述要求抄报毛主席),判断为首长秘书;全信没有一个简体字,判断作案者年龄为40岁以上。作案者信件从杭州投寄到达兰州与朱德同时到达时间十分接近,对朱德行踪如此了解,恰恰留下破绽。

在此期间我们对湖滨投邮点的大华饭店(内部高级宾馆)、民航班机、车站、饭店展开调查,毫无结果。为此我们曾建议应该从北京中央警卫局内排查,从中突破。并准备派人去公安部详细汇报。当公安部得知我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浙江查浙江的线索,北京的线索由上级安排……此后公安部不再了解过问我们工作情况,对这么一起大案从此偃旗息鼓实属反常。

同年12月,我在丛鹭丹办公室谈起对此案的看法(我与丛关系较好,1957年反右时他私下要我多听少讲,当时算是保护部分骨干的措

施)。我大胆地提出怀疑作案的动机,认为它不像是反革命案件,因为警卫工作内部干部挑选严格,纪律森严,电话一律用保密机,首长不直呼姓名而用代号,专列调度也是十分严格保密的。从作案者如此了解朱德与刘澜涛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列的出发和信件到达兰州的时间看,连中央警卫局一般成员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警卫核心机密。会不会是一支体温表?丛听懂我的话,立刻沉着脸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在我这里说算了,千万别在外面乱说。”僵持几秒钟后他关上门,轻轻地对我说:“我也有想法,回去什么也别提……”我点头说:“我懂。”

1967年2月传出所谓“贺龙兵变”之类传闻,张张扬扬一阵后又偃旗息鼓,无非配合林彪的“政变经”的正确预见性。不久,戚本禹提出“打倒黑司令朱德”口号的大字报,北京红卫兵举城响应,毛主席出面阻止说:“这样提不妥,朱毛朱毛,国民党的时代他们要杀朱拔毛,他是司令,我是政委,他成黑司令,我算什么?朱德是红司令。”一时间所有攻击朱德的大字报销声匿迹。这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亲自出面保护一位领导层干部的讲话。事后从传闻中知道毛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认为朱德的发言是“隔靴搔痒”而表示不满。文革开始时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林彪在毛主席的授意下,借批判彭罗陆杨的同时批判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与会的纷纷跟从批判朱德老师,甚至有的说“毛主席说你是党内中常委中的定时炸弹”。然而不到一年,毛主席来个大转变,亲自表态:“朱德是红司令!”应该说那支测量朱德忠诚的体温表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老师能躲过一场灾难。

不久砸烂公检法中,王芳、吕剑光、丛鹭丹三位厅领导被押往北京审查,我则在机关被隔离审查,我一直为自己讲过“此案是一支体温表”而忐忑不安,按照当时的《公安六条》是属于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大罪,是决死无疑的。(下转20页)

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

○ 董郁玉

共和之实

中国人不知道“共和”一词的人不多。从1949年以后,对每个大陆中国人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在1949年以后出生的大陆中国人来说,镶嵌在国名中的“共和”一词,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时常要出现的最重要词汇之一。

中国人知道“共和”一词含义的人也同样不多。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即使是对那些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共和”一词,虽是他们在念读国名的全称时经常会触碰到的词汇,但却是他们可能从未细究、也从未明了的词汇。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用“共和”来修饰自己的国名,为什么要以“共和国”的名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当然是因为“共和”在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上所具有的无人能拗的正当性;当然是因为早在60多年前,“共和”其实就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违的历史潮流。用“共和”来修饰国名的举措说明,不论具有多么强大控制力的政党,不论具有多么强大统摄能力的统治者,都不愿意以与“共和”相对立的“独裁”来概括自己的国体和政体。

自从“共和”这个词汇诞生以后,除了以“帝国”自称的国家外,古今中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以“独裁”来自称或修饰自己的国名。“共和”,作为政治概念、政治制度、政治理想和政治思想,在人类政治的演进中不断获得和加强着自身的正当性。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共和制的历史并不长。从古代共和制国家的昙花一现,到近代意义共和制国家的建立及其在数量上的扩张,以“共和”为框架的政治理想和国家政治制度,随着商品贸易和信息传播在地域上的扩展,几乎可以在国情各异的世界任何国家寻找到载体,并生长出愿意为之落地生根而

行动的力量。

毫无疑问,在政治制度方面,“共和”所代表的制度,在所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排序中高高在上。这种正当性所具有的超越价值,是人类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中最具生命力的价值。这种超越价值的生命力就表现在:不论在任何地域和任何时间,只要“共和”的理想为人们所知,那么,“共和”的价值,就会成为大众判别社会革命和政治变革是否具有进步意义的不易更变的恒久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讲,至迟约一个世纪前,“共和”的历史大势就已然在世界确立。这个历史事实,实则让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说”成了历史的“马后炮”。

保守的共和,自由的共和

“共和”是英文“Republic”一词的翻译词汇,其对应的中文词“共和”,一般认为取词于《史记·周本纪》中的周厉王出奔,“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当然,既是翻译词汇,其所代表的概念及其所指,都根自于原文。

英文“Republic(共和)”一词,源自拉丁文“respublica”,其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共和”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从公元前500多年建立的罗马共和国,演进到近代世界中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个共和国英国,发展至“第三波”民主过后,其当下所指就是由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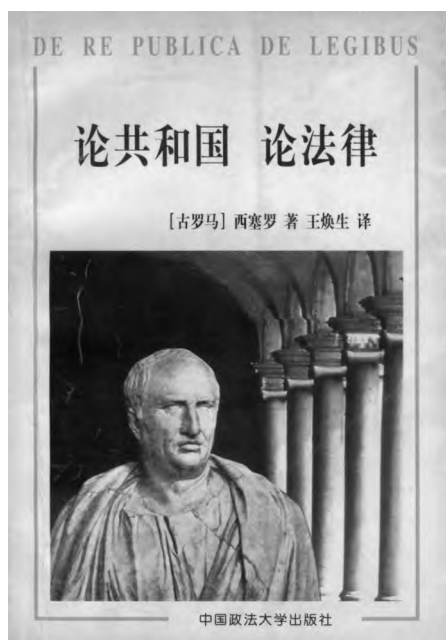
当然,这里所谓“民主制度”,是广义的民主,是容纳、包含和整合了共和制度的民主制度。历史地看,无论在思想源流上还是在制度源流上,共和与民主存在着共同点,但区别也是明显的。民主的原则,就是多数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共和的原则,就是公平的原则,即所有公民都有在公共事务上的平等权利。显然,在共和原则与民主原则之间存在着冲突:由共和原则,无论多

数还是少数,其权利是平等的,如果少数服从了多数,那么,少数人的平等权利便可能不复存在;由民主原则,除了小概率的“一致同意”以外,少数服从多数是形成有关公共事务决策的“技术性的硬限制”和最低门槛,没有少数人的服从,公共决策就形成不了,公共事务就无以处理,民主就毫无意义。

因此,在当代,共和制与民主制发展合流为宪政民主制度。宪政民主制度,就是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从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安排和落实少数人的权利,从而保证少数人不因多数人的决定而丧失权利,不因多数人决定的执行而被实际剥夺权利。不仅如此,宪政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限制由多数人投票赞同而组成的政府的权力,确保个人的自由权利永远高于政府的政治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政就是“限政”——限制政府的权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人们所谓的“共和”也好,“民主”也罢,从制度的角度讲,大都是指宪政民主制度。

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看,一般而言,共和的原则趋向保守。这种保守的趋向,就是在保有个人权利至上方面的几至冥顽的不妥协,以及限制政府权力所根基的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其对应在国家制度上,就是近代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为主旨的宪法及其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在这样的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下,每个人、多数人、政府都必须按照既定的规则行事。这种制度下的规则,之所以能够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不被剥夺,就在于这种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规则并不能随意改变,并且即使改变规则的意愿发自多数人也仍是如此。

由此可见,共和所具有的保守主义倾向,“保”的是个人自由权利,“守”的是个人自由空间。而共和之所以要“保”、要“守”,也就在于多数人和政府权力对个体自由的巨大威胁,在于个体自由在多数人和政府权力面前的“易碎性”。



所以,保守主义趋向,是共和制的巨大内在力量所在,是共和制在诸多制度的竞争中成为历史潮流的关键所在,是共和制在个人权利、多数人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划界对各方具有约束力的根据所在,也是政府权力所具有的蛮力常常要不得不俯首于共和所具有的正当性的原因所在。

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共和的原则和民主的原则之间不是排斥关系,而是互补关系。说到底,宪政民主制度是安排和落实公民自由的制度,是因保护自由的原因而划定自由边界的一套程序。实际上,宪政民主制度的产生,正是基于人的

的自由本性的需要,正是基于人们落实自己自由权利的需要。因此,人的自由度的大小,人们自由权利落实程度几何,是检验宪政民主制度是否到位、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标尺。也因此,没有自由的共和是假共和,没有自由权利的民主是假民主。

共和制——有自由、“最不坏”之治

在当代,宪政民主制度几乎成为地球上所有国家公民的不二选择。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绝对。但是,除去已经实现和正在巩固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不论,只要看看那些尚没有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当政者所极力防止、阻挡、压制和消灭的本国民众对国家制度的自由选择,就可以反证所谓“不二选择”之说,一点都没有言过其实。

近代以来,在国家制度的竞争和选择上,其他制度形态渐失其势,而宪政民主制度成为“终结历史”的选择而独领风骚,这其实正是人性之胜和人性之选。没有人愿意受他人或政府的奴役和驱使,没有人喜欢无条件地让他人或政府代表和代办。习惯于奴役的“坐稳了的奴隶”,和憎恶自由的异化了的人性固然有,但是,这只是人类中极特殊的个例,这些个例并不能改变人类自由的天性。

当然,也正如人的自由本性并不能保证人的所有选择都正确无误、所有行为都产生正面效果

一样,作为保障人的自由权利的程序性规则,宪政民主制度中那些看似繁冗甚至多余的规定,只是为人的自由选择的正确性增加了可能,但并不保证这种选择的百分之百正确。

不过,选择的错误,其实也是自由的一部分,是自由的必付代价,是自由对应责任和义务的必然结果。人类自由度的扩大,正是在自由基础上不断试错和纠错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宪政民主制度正是为人们在公共政策的选择上提供了讨论、协商、妥协和交易的系列规则,从而通过落实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方式,来尽量避免错误决策的产生,把选择错误的可能性减至最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民主制度是有缺陷的“最不坏”制度,而非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当然,在这个“最不坏”的制度以外,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最不坏”方面可以和宪政民主制度比肩而立,因为十全十美的制度根本就不存在。

在宪政民主制度所能提供的自由、安全、秩序、效率等诸多价值中,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价值。同时,在这一制度之下,公民所拥有的广泛的自由,也是宪政民主制度区别于其他制度的关键所在。

宪政民主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可能会给人们提供暂时的安全,也可能会在国家强制力的高压之下形成秩序,更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效率。但是,宪政民主制度所提供的安全、秩序和效率,建基于自由之上,由此可以构造充满活力的社会。而在其他制度之下,由于价值排序的不同,自由只是在安全、秩序和效率基础上的自由。因此,宪政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度,与其他制度下的自由度相比,一个是空中之鸟,而另一个则是笼中之鸟。

保障自由,符合人性,是宪政民主制度“最不坏”的根基,是共和制、宪政民主制的自治性和正当性的根基,是人们把共和之选、宪政民主制度之选送上制度竞争和制度选择之巅的根基。

经济之争,人性之争

在现实世界中,宪政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在制度竞争和选择中的优势,除了来自其符合人性

的逻辑基础和制度设计以外,更多地来自实行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制度实践。这种制度实践的示范效应,是引发民主潮流、形成荡及世界的三个民主波次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也正是宪政民主制度在解决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问题的有效性示范,也使得宪政民主制度在庇护和扩展人类自由方面的功能,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缩略为在促进经济绩效和提升物质富裕度方面的功用。

毫无疑问,宪政民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物质富裕程度。但是,正如上述,宪政民主制度只是为人们自由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制度化的保护,规定了一套制度化的程序。至于人们选择内容的“正确”与否,选择结果的正负效应,却并非这种制度所能决定。宪政民主制度下的经济绩效和物质富裕度的提高,只是人们自由行使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结果之一,但并非是人们行使自由权利的全部结果。

不过,提高经济绩效和物质富裕度,却并非只是宪政民主制度的结果之一。实际上,从近代以来,在其他与宪政民主制度相竞争的制度形态中,有的制度形态在特定时限里,在提高经济绩效和物质富裕度方面,甚至还显现出了远非宪政民主制度可比的高效率。当然,这种高效率也从未被“浪费”,总是不失时机地被用来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低效和“注定被取代”。

然而,在人类对制度进行选择的历史过程中,制度的竞争是一个长时段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短跑”,不能靠以耗竭后代发展资源为代价的“冲刺”而取胜。因为这样毕几代人可用资源于短时间内的“冲刺”,其实不是这种制度形态的高效和优势所在,而恰恰是其不顾代际公平、竭泽而渔式发展的“癌性”痼疾。这种效率,不是自由的效率,而是专制的效率;不是创造的效率,而是贪婪的效率。

实际上,此种发展的效率,并非什么发展的奇迹。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有限历史中,这种奇迹——如果有的话,既不唯一,也不鲜见。甚至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因专制高压而形成社会有序性,而为专制所戕害的社会普遍道德水准又不足以降低攫取财富的疯狂冲动的社会里,几乎都可以实现这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所谓“高效”发

展。此种“高效”发展及其最终结果，希特勒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崛起和灭亡可谓一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崛起以及分崩离析可谓又一例。

曾几何时，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都是在短时间内的效率远高于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样板。如果把现代化作为目标，把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显现了其各自制度形态的优越性。但是，制度的竞争，毕竟不只是经济绩效和现代化指标之争，而是人类生活直接或间接所及的所有方面的竞争。因此，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失败宿命，从根本上来讲，就在于其压抑和扭曲人性的制度设计。

在压抑和扭曲人性方面，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制度设计之精巧，都超乎了普通人的想象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实行宪政民主制度国家间的竞争，其实就是自由和不断扩展自由的人性，与受压抑和扭曲、且越来越压抑扭曲人性的竞争。从人类进化的历史看，这种竞争的胜负早有定数。

制度之选，还是模式之选

把制度的功用简化为发展经济，又把某段经济发展的冲刺路径命名为“模式”，进而以一个时间段内的“短跑”成绩，来类比较长时间段内进行的制度竞争的“长跑”成绩，这就是把制度之选替换成模式之选的“路径”。

就在20多年前，“苏联模式”还曾是实现现代化的一条可选路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直至在其轰然崩溃之前，都是可以与世界头号国家——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美国并肩而立的超级大国。不过，如果用中国的一句话来形容“苏联模式”，那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于是，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诸多加盟共和国，大都四散独立，回到了共和制的起点，开始了其宪政民主制度的实践。

苏联的历史昭示人们，专制的高压的确能产生高于宪政民主制度的效率，的确能在某个路段

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冲刺速度。但是，这种速度之所以不能长久，并且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反而会拖累社会进步的总体进程，就是因为这种速度的产生，是以专制制度下方才可能有的不计（资源）代价、压制无数社会成员的其他方面的愿望为基础的。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制制度下的政府的豪言和计划，其实是对专制制度缺乏自信和长久预期的体现。而在宪政民主制度下，人们对制度的信心，体现在其对制度的稳定预期上。由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一整套规则限制，以消耗后代人的资源、“超额”损毁后代人还将“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为代价，以求在短时间内高速冲刺的“短跑”方案，几无被通过的可能。

专制的高速和“高效”，较少产生社会进步的长期效应。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举凡人们现在生活当中已经须臾不可或缺的科技产品，如个人电脑、手机、小型电子产品、数码相机和摄像机、车载导航设备……都是冷战时期的军工科技向民用科技转移的成果，都是冷战结束的“红利”之一部分。但是，这些产品中，有哪一个是与美国军事工业难分伯仲的苏联军事工业贡献给消费者的呢？

因此，在此意义上，模式之选，永远取代不了制度之选；制度产生的长久效益，并非把模式产生的短期效益相加可得；再有效益的模式，也遮盖不了制度选择的根本问题。

在中国，从上世纪初清王朝派五大臣考察日、欧、美等国的政治制度始，制度的选择在朝野政治势力中，已然存有对共和制的制度认同。但是，由于清廷对制度建设的拖宕与延误，致使清廷对制度建设的创立进程丧失了操控权。而这完全是因为清廷在制度选择上畏首畏尾、犹豫踟蹰的政治结果。当冥顽不灵的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等不及了的枪杆子时，他们“钦定”的制度选择也只能“靠边站”。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选择问题是迟早都要解决的问题。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告诉人们，制度选择的问题不解决，一个国家无论在什么模式下、走得有多远，最终都不得不到“共和制”的起点，重新出发。■

（责任编辑 黄 钟）

毛泽东怎样指挥三反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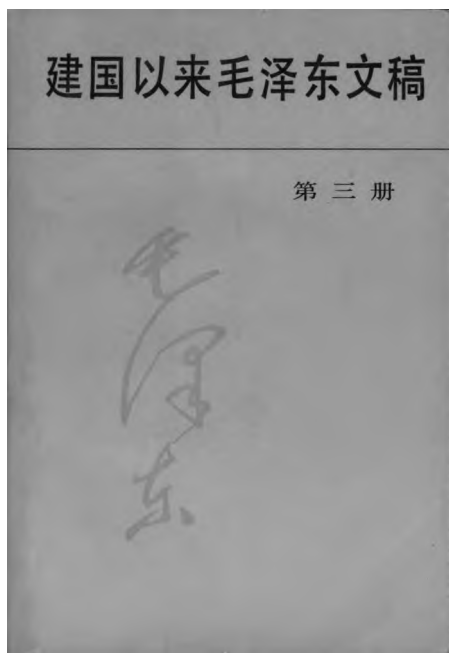
○ 崔 敏

从1951年11月下旬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1952年1月进入高潮，经过短促突击和猛烈斗争，至同年8月结束。这场运动自始至终都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每一步怎么进行，某一地区、某一单位必须打出多少只“老虎”（三反运动中，把贪污犯称为“老虎”。贪污一千万元以上一亿元以下的为“小老虎”，贪污一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当时通行的是旧币，从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都由毛泽东亲自下达指标，随时跟踪进行督战，完不成任务则要严厉批评并给予处分，由此开创了用指标衡量政绩的先例，为其后的各项政治运动树立了榜样。后来在“大跃进”中“放卫星”就是沿用了这种做法。

下面，将三反运动的来龙去脉和毛泽东的各项指示做一番梳理，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怎样指挥进行三反运动的，或许可以从中受到某种启迪。

一、三反运动的发端

1951年11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一份《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列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其中提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元人民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高岗的报告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封面

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这一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和各级党政军机关。他在批语中说：

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随后，各中央局陆续送来发现大贪污犯的报告。毛泽东在看了这些报告后，愈来愈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他决心通过“三反”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

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指出：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这一指示的文字不多，但已对三反运动的性质、任务、办法大致做了规定，并提出“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

三天后，毛泽东于12月11日转发华北军区

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这一指示,强调要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斗争,一切指战员均须参加。

二、毛泽东亲自担任三反运动的一线总指挥

1951年12月3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发布了一道命令,即《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指示要求:

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省市一级共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例如党的宣传部、组织部,政府的财政部(厅或局),公安部(厅或局),军区的司令部、后勤部,再加各民众团体,除每一民众团体只要总报告不要各部门的报告以外,所有一切工作部门,均应分别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政府中凡与党外人士在领导工作上合作的部门,用党组名义作报告。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这些报告各级党委应负督促之责。

这一命令具有非凡的意义,这就把对三反运动的领导权统一集中于中央主席之手,由毛泽东直接充任了三反运动的一线总指挥。当时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省、直辖市一级,三级党政军机关共有部、委、厅、局数千个,都要直接向中央主席作报告,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毛泽东在同一个时间段要亲自审阅这么多报告,其工作的繁巨绝对超过当年秦始皇的日理“石量书”(每天报送的竹简超过一百斤),以至“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但与毛泽东同时

审阅数千份报告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一来,对三反运动的领导便实现了最高度的集权,运动中每一进展,事无巨细都要向中央主席报告,重大决策和各项政策的制定全部集权于一人,这就实现了高度统一的“一元化”。由于各部门向中央主席呈送报告的抬头,一般都使用“主席、中央”的称谓,此后把主席放在中央之上便成为惯例。

三、在毛泽东严厉督促下,三反运动迅猛展开

在1951年12月31日下午,中央直属总党委召开党、政、军、团、群五个方面部长至处长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和安子文宣布中央决定,限期1月1日至1月10日,各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同时宣布军委技术部长×××、中央交通部办公厅主任×××、重工业部局长××撤职查办。这样一来,全场震惊。

1952年元旦下午,毛泽东邀请十几位民主人士和党内几位负责人在颐年堂开新年团拜会。毛在祝词中说:

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团拜会后,原本安排有一场晚会。许多部长早已坐立不安,没有心思欣赏精彩节目了。团拜一结束,纷纷离场赶回机关,连夜部署本系统的“三反”斗争。

时至1月中旬,毛泽东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遂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督促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1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向全党发布了一个指示:

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

此时,毛泽东处在思想高度集中、心情异常激愤的精神状态中。不论是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还是他写的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立即照办。他要求各大军区都要发“三反”斗争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这些要求都过高、过急,有许多并不适当,很容易造成偏差。

四、高压下的“打虎”指标节节攀升

三反运动初起,毛泽东对敌情的估计极其严重,对运动的部署十分急迫,要求每个单位,都要有“群众斗争的猛烈爆发”,以高压态势打开局面。

1952年1月6日,毛泽东在薄一波代中央起草的一份对华东局请示的复电中,加写了一句话:

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

1月14日,毛泽东在对集宁军分区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又说:

像一个军分区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望各地严格注意。

同一天,毛泽东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中,又说:

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

1月15日,毛泽东在转发贵州军区三反运动简报的批语中,又说:

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一切不痛不痒的报告,千万不要相信。

从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关注各地区、各部门的打虎计划上,他逐一比较各地报送的打虎计划,对数字高的予以鼓励并要求不断追加;对数字少的则严厉批评,要求向先进者看齐。如此不断催促,使各地报送的打虎数字迅速攀升,有的在第二天就成倍追加或者在几天内翻几番。

1月22日,在一份发给全军的电报中,毛泽东提出:

有许多单位劲头不足,空话太多,不能令人满意,请你们给以批评,严令他们限期检讨,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各大军区和你们清出的老虎都太少。像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军区系统估计至少有大老虎二百个以上,华东中南可能更多,千万不要让他们溜走了。望各大军区提出一个大老虎的估计数字告我为盼。

1月23日,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指令,要求在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引向搜寻大老虎。电报指出:

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

1月24日,在对西南军区三反运动第五周简报的批语中,又说:

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会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

1月30日,在对华北局关于山西省打虎数目的指示的批语中说:

华北局提出像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一千个至一千三百个,其中应有大老虎一百个至一百三十个以上。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请各省市区委根据自己的情况都作出一个打虎预算,报告中央局和中央。

2月2日,毛泽东看到陆军第十军报送的一份打虎报告,认为很好,遂转发全军要求各军都向十军看齐。他在转发十军打虎经验的批语中指出:

十军这个经验很好。原以为没有多少搞头的,回炉再炼,就清出了大批老虎,管理排长,指

导员,股长等人许多都是贪污犯。望各军都向十军看齐。

十军截至二月二日止已捉一千万元以上老虎五十九只,预计还可捉三十只至四十只。十军“无生产无大建筑,过去被认为比较规矩”,尚且查出这多老虎,那些有生产有大建筑,或过去不大守规矩的部队和机关,老虎当然要更多。(仅仅过了一周,也就是在2月9日,毛就在另一批示中指出:“第十军的几个师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又过了三天,毛在2月11日《关于六十六军打虎经验的批语》中又说:“十军因发生逼供信错误已不是模范了。”)

2月4日,毛泽东在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的电报中,通报了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的打虎计划,指出:

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一百零六只,小老虎三百五十七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这是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请中南军区督促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迅速订出自己的打虎计划,报告中央。

在同一个电报中,还通报了东北、华北和中央一级的打虎计划。毛在电报中说:

接高岗同志一月二十六日的报告,全东北计划捉大老虎五百只,昨日(二月三日)据报,已增加至二千只。军委直属系统早几天承认捉大老虎一百只,昨天追加了一百五十只,共计二百五十只。连同中央一级其他系统的三百只,共计五百五十只。此外尚有已经通报你们的华北的经验。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根据华北局的计算,其中应有大老虎百分之十以上。

2月5日,毛泽东在对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批语中说:

像山东这样的大省,有党、政、军、民、学五个方面,有十几个大中城市,有很多分区和县城,一千万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

对军事学院两份三反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

刘、朱、周、林、聂、罗荣桓、肖华^{〔1〕}及军委各部门。请肖华同志以电话告刘伯承^{〔2〕}同志:

(一)二月三日二月四日两个报告^{〔3〕}看到了,很好。
(二)军事学院包括各附属单位在内,可能有大老虎几十只至百余只,中小老虎几百只,请他注意搜捕。(三)像朱由芹^{〔4〕}一类的人要严惩。

毛 泽 东

二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林,指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罗荣桓,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2〕刘伯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3〕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党委一九五二年二月三日报送军委主席、副主席、总政治部的三反情况简报第三号,和刘伯承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关于朱由芹贪污腐化及对其处理意见的请

170

1952年2月8日,毛泽东对军事学院三反报告的批语,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无论何方面,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严重者撤销职务。

同一天,毛泽东在对浙江省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说:

你们说,浙江全省可能有一千万以上的大小老虎一千只以上,这个数目作为初步认识是好的,以后应逐步增加。像浙江这样的省包括省、地、县、区、乡五级,党、政、军、民、学五面,可能有大中小老虎二千只至三千只,或者还要多,这还没有包括社会工商界在内。

2月7日,毛泽东在对中南军区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说:

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即不是一百零七只而是五百多只。中小虎不是一千一百多只,而是五千多只。

2月8日,毛泽东在对军事学院三反报告的批语中说:

军事学院包括各附属单位在内,可能有大老虎几十只至百余只,中小老虎几百只,请注意搜捕。

2月9日,毛泽东在对高岗关于东北打虎计



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现场

划报告的复电中说：

东北计划打大虎四千只，中小虎二万五千只，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

2月10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捉虎报告的批语中，又说：

华东军区二月七日报告，该军区计划捉大虎一千只，小虎三千只，并定五天一小关，十天一大关，要各部交帐，督促甚严。该军区二月五日小关收帐，计捉到大虎一百零八只，小虎六百四十九只，挤出中小贪污分子九万七千多人。望各军区向华东军区学习，严格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2月10日，毛泽东在对华北军区后勤部捉虎报告的批语中又说：

单是华北军区后勤部所属人员中就能捉到二百只或者还要多的大老虎，八百只以上的中小老虎，这对于那些对大贪污犯存在的情况估计不足因而对打虎预算定得很低的方面或部门，特别是有些军区的方面或部门，是一个大的教训。务请同志们以这类实例教育所属干部，增加打虎勇气。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2月11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中，又说：

华东局二月八日给所属党委的指示，规定华东全区须打大虎五千只，中小虎二万只，这是全国各大行政区打虎预算的最高数字。……华东

这一计划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党委及军区党委一个榜样，必须克服干部中对大贪污犯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按照自己的情况提高打虎预算。华东军区打一千只大老虎的计划，也是全国各军区中预算最高的。

2月11日，毛泽东向中南局负责人发电报，要求中南打虎应向华东看齐，电报中说：

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华东局八日电告，不包括区乡、军队和工商界，单是县以上党政群及财政企业打大虎五千，中小虎二万。另外华东军区打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由此看来，你们最近规定打大虎三千，中小虎二万，还是低了。军队方面，必须和华东军区看齐，打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以上，并迅速分配下去。地方应增多多少，请考虑再告。刚才接到华南军区二月九日电，规定打大老虎四十，中小虎八百多，这个数目少了十倍，像华南军区系统有这样多的大小单位，至少应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2月13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关于增加打虎预算的报告的批语中又说：

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一倍，由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增为大虎二千余、中小虎六千余。请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东军区人数和经费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

2月17日，毛泽东在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中，又说：

中南局二月十三日打虎新计划收到。这个大虎八千小虎四万二千余的新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比过去所设想的计划接近于实际。请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

西南区主要负责人邓小平、贺龙2月13日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西南区打虎战果及第二步打虎追加计划的报告》，其中说：截至二月十一日，西南区地方和军队系统已捕捉老虎一万零二十八只，第二步计划打虎必成数为一万七千只，期

成数为两万只,内大老虎至少占十分之一。

2月17日,毛泽东在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中说:

二月十三日电收到,同意你们的新计划。待过一时期再行酌量增加。

2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南军区应增预算给谭政等的电报中又说:

你们军区打虎预算据中南局最近电告增至打大虎八百,这比你们过去的数字是增大了,但和华东军区的一千六百相比,仅及其一半。实际上华东军区大虎将来可能打至二千五百至三千。你们基本上应与他们看齐,但可稍迟一会再增加,并须启发下面同志自动增加,始不觉得太勉强。特别是华南军区系统可能打大虎一千以上,中小虎万数,而他们定得很低,勇气不旺。最近看了四十八军打虎渐多,应即以之教育全军。

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许多批示可以看出,各地打虎的数字几乎是逐日攀升,恰似“芝麻开花节节高”。例如,东北地区1月26日计划捉大老虎五百只,2月3日即追加至二千只,猛增四倍。2月9日又增至四千只,再翻一番,不到半个月就增加了八倍,跃升为全国六大区的首位;但随后不久就被华东区超过。华东局2月8日规定全区须打大虎五千只,成为全国各大行政区打虎预算的最高数字;与之相比,毛泽东对中南军区党委打虎报告甚为不满,在2月7日对其提出严厉批评,说:“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即不是一百零七只而是五百多只。中小虎不是一千一百多只,而是五千多只。”2月11日又专门给中南局负责人发电报要求他们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中南区自然不敢怠慢,2月13日就上报了要打大虎八千小虎四万二千余的新计划,比原计划提高八倍,把打虎水平提到了当时的最高度。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些指标在短期内突飞猛进是被逼出来的,反而认为他的督战见了成效。他看到各大区在打虎指标上你追我赶,认为形势大好,感到极为满意,夸奖新计划“比过去所设想的计划接近于实际”,进而要求“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其结果便是如同后来在“大跃进”中“放卫星”一样,指标被推到超乎想象的地步。后果会是怎样,但凡头脑清醒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五、“大胆怀疑,穷追务获”

三反运动中的那些打虎指标,并无客观的依据,全是主观臆断“大胆怀疑”和“推测”出来的,并要求使用各种强逼方法,“穷追务获”。

1952年1月25日,毛泽东在转发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三反报告的批语中说:

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收集材料,试行探查,就可发现许多老虎。……领导者必须指导群众不要松劲,不要住手,而要继续攻击,穷追务获,否则就是打败仗。……在运动中,兵团、军、师、团、营各级干部必须人人向群众作反省检讨,即所谓人人下水洗澡,以及限期展开、指名坦白等项方法,你们已经懂得,这里就不多说了。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1952年2月4日,毛泽东在关于增加打虎分配数目给谭政的电报中又说:

你们一月三十一日给我的报告所述对各省任务的分配数目都太少,是不合实际的,必须指导他们逐步增加。特别是广东军区系统包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二十只,中小老虎一百八十只,这是完全不适当的。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同一天,毛泽东又在对华北区2月底以前打虎计划报告的复电中说:

东北当有大中小老虎二万只以上。华北县以上即有大中小虎一万多,如包括区乡,亦当在二万只以上。如东北所称二千是指大老虎,则比华北的一千二百只大老虎高得多。总之虎数增多,证明认识进步,信心增高,劲头增大,请各同志一起注意。

1952年2月12日,毛泽东转发关于华东直属机关打虎经验的批语中又说:

华东局的九条打虎经验极好,文字亦生动易读。……九条经验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不倒“思想老虎”,老虎是打不出和打不净的。目前全国县团以上干部大多数尚未完全从思想上解

决打虎问题,请各同志严重注意这一点。

1952年2月21日,毛泽东又在关于华南分局打虎部署的复电中说:

打虎有进展,甚慰。你们的部署是对的。但你们一般成绩尚不算大,尤其财委和军区太小,须加强压力,研究战术。

由此可见,前面引述的那些一天数变、成倍增加的打虎指标,都是在一再“加强压力”下,靠不断“反右倾”逼出来的。毛泽东肯定“不打倒‘思想老虎’,老虎是打不出和打不净的。”而“虎数增多,证明认识进步,信心增高,劲头增大”。这些说法,与后来在“大跃进”中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如出一辙。

毛在1952年1月14日对遵义军分区综合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提出“穷追贪污,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照此看来,“穷追猛打”实际上成为打老虎的基本方法,说白了就是“逼供信”。

有趣的是:毛泽东又在几处批示中,提出要禁止逼供信。例如,他批评陆军第十军“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并说“十军因发生逼供信错误已不是模范了”。他在1952年2月17日转发西北区打虎新预算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提得很好,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2月22日又在转发华东军区党委报告的批语中强调:“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帐,算细帐,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2月26日在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再次强调“严禁逼供信的方法”。

从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的大量批示、指示来看,他对待逼供信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再三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必须对下属“加强压力”,不断地“反右倾”,甚至亲自将许多地区的打虎指标提升几倍,强令必须完成。例如,2月5日对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批语:要求山东应打虎三四千只,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严重者撤消职务;2月7日对中南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直接提出打虎计划要增加五倍;2月11日又批评华南军区规定打虎数目少了十倍,说像华南军区至少应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如

此这般不断追加打虎数字,逼使中南局制定出打大虎八千小虎四万二千余的新计划,他才认为“比过去所设想的计划接近于实际”。但仍不满足,2月18日仍批评华南军区打虎数“定得很低,勇气不旺。”事实上,不断增高的打虎指标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而全是由领袖一人恣空想象一再施加压力,硬是给挤压出来的。这正是发生“逼供信”的源头。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批评有些地方搞逼供信,提出“严禁逼供信”。其实,逼供信正是由于上面不断施加压力压出来的。毛亲自施加压力,但又要下面“严禁逼供信”,这实在是舍本而求末,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这也正是历次政治运动中逼供信日益猖獗的原因之一。

六、三反运动引发种种问题

在三反运动中,由于对敌情的估计过于严重,某些判断并不符合实际。强压的打虎指标越来越离谱,导致草木皆兵,人人自危,许多地方出现了惊恐不安的情绪,正常的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以致许多事情没有人干了。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一些同志开始向中央如实反映运动中出现的某些严重问题。当时身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于1952年2月22日向中央报告: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工商业表现出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大大缩小,税收大幅度下降,许多私营工厂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使大量城市贫民生活受到影响,他们对三反五反已开始表示不满。特务亦借此兴风作浪。从内部来说,一些财经机构垮了。这些问题如不设法解决,国家财经机关很难应付局面。

3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发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加写了一句话:

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

同一天,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的电报中又提出:某些陷于停顿的经济活动,应大力注意恢复。

3月15日,邓小平又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来报告,其中提到“根据前一段三反运动中的缺点,应坚决纠正逼供和肉刑”,并说:“经济机关老

虎最多,干部最缺。会议拟定了一些解决办法。”

毛泽东于3月20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示:

(一)中央同意邓小平同志三月十五日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将这个报告发给中央局和分局参酌办理,并可在党刊上登载。

七、三反运动收场

由于各地区、各部门普遍发现打出了不少假老虎,于是对前一段打出的老虎着手进行甄别。但甄别工作中遇到不少阻力,有些干部怕弄出岔子、怕负责任、怕前功尽弃,等等。鉴此,3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三十八军党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甄别工作值得全党全军注意。……望指导所属认真切实地做好甄别工作。

从1952年3月起,三反运动进入定案处理阶段,又提出“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均为旧币)。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45页)

上述对贪污犯判处死刑的数字,与毛泽东原说“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的估计相差甚远。另一事例是,毛泽东在1952年2月8日批示:“像朱由芹一类的人要严惩。”朱由芹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在三反运动中受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降级处分。时过28年后,军事学院党委于1980年2月对朱案进行复查,认为他在分管机关生产的工作中有一定的错误,但原处分的主要事实依据有很大出入。经总政治部批准,1980年4月撤销了对朱由芹的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降级处分,恢复准军级待遇。(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页注)这是由毛泽东亲自批示“要严惩”造成的冤案,致使当事人蒙冤28年。三反运动中类似的冤案所在多有,相当普遍。

八、如何汲取经验教训

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迄今为止,按照“正统”的说法,对三反运动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次运动很有必要,意义重大”。虽然也承认在“打虎”阶段发生过一些偏差,但总的说来是“教育了广大干部,清除了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近年来,鉴于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反腐倡廉”收效甚微,许多人甚至希望再来一次类似“三反”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然而,从以上引述毛泽东对三反运动的许多批示、指示来看,这种运动式的反腐,弊端甚多。由于一开始就夸大了敌情,采取了猛烈方式开展斗争。为使运动迅速点起火来,毛泽东提出“大胆怀疑”的方针,要求各级干部“人人下水洗澡”。其后不断施加压力,一再提升打虎指标,限期完成任务,甚至提出“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这就人为地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局面,扩大了打击面,以逼供信的方法打出了许多假老虎。尽管后来又搞了复查和甄别,但它却伤害了众多无辜者的感情。肃贪反腐无疑是应该的,自有其正当性,但以运动的方式去反腐败,毫无根据地随意规定打虎指标,逼得人们胡乱招供,闹得人人自危,这种做法却是十分有害的,它破坏了国家正常秩序和道德良俗,损伤了执政党的威信,阻碍了中国进入法治时代的步伐。

时间过去了一甲子,经历过三反运动的当事人多已作古,现在的年青人都不知道那次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了。这篇材料或许会引起一些思考,但愿这样的运动不再发生。■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启 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从内部讲话看大跃进时期的高层情绪

○ 陈徒手

—

1958年大跃进运动骤然兴起,从盛到衰历经三年,最终经济后果极为惨重,国家元气大伤,人民死伤累累。翻寻当年领导人在多种场合内部讲话的记录稿,也可从中梳理出大跃进期间高层思想发展的脉络,看出其间癫狂无序、毫无理智的全国性狂热潮流的涌动。

1956年时高层对经济发展指标还是持慎重的态度,尤其是毛泽东还是犹豫再三,轻易不说大话。譬如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曾设想十五年内农业增速百分之三百,工业总产值要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的百分之六七十。毛泽东考虑后,不同意计委“提早完成工业化”的提法,认为这样提法是没有根据的,争取十五年内完成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李富春在全国第三次计划会议的总结报告中透露,有的同志提出要在报上宣传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毛主席说,现在不要这样提,靠不住的事就不要提,而可改成这样提法,“提早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恩来正是根据这个口径修改了政府工作报告。(见1956年2月7日李富春《关于全国第三次省市(自治区)计划会议的总结报告》)

但是这种冷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受1957年国内外诸多政治事件的刺激和搅动,其中反右派获得大胜、与苏共赫鲁晓夫争锋是明显的主因,1958年初高层变得异常躁动和狂热,笼罩着一种“舍我其谁”的抢出头氛围,跟着毛泽东不断升高的调子,集体发声显得极为高亢、不着边际,似乎在互相比赛谁说得更高昂、更具彻底的革命性。

最早表态的当属分管文教、农业、工业的陆定一、谭震林、薄一波,他们的内部讲话稿在党内四处扩散,藐视美英、经济赶超的气势直接影响了全党的思维定势。

上次已讲过速度的意义,要更正一个数字。上次我讲十五年赶上英国,钢的产量每年要增长36.4%,应改为38%。这个数字世界上还没有,中国最高的速度是31.5%。同志们干劲很大,这是很好的,美国有什么了不起,不赶上它才怪。我们要超过美国一定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帝国主义寸土必争。(见1958年3月19日《陆定一同志在农业中学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6亿人口的国家这样的跃进,三年内基本满足生活资料的需要,就会变成世界第一位,什么美、英、法、西德都不在话下。这种情况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常说中国人真像个魔术师长袍一甩,粮食就来了。这样也彻底粉碎了马寅初的人口论,说什么人多地少,粮食增产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到那时我们17亿亩地就可以养活89亿人口。(见1958年8月3日谭震林《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

我们小麦亩产7000斤,对苏联的科学界人士也是很惊讶的,过去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看到消息后说:“按科学来说不可能。”但我们不按科学反而可能了。我们也派人去看过,在湖北省他们带回来的麦样就有小指头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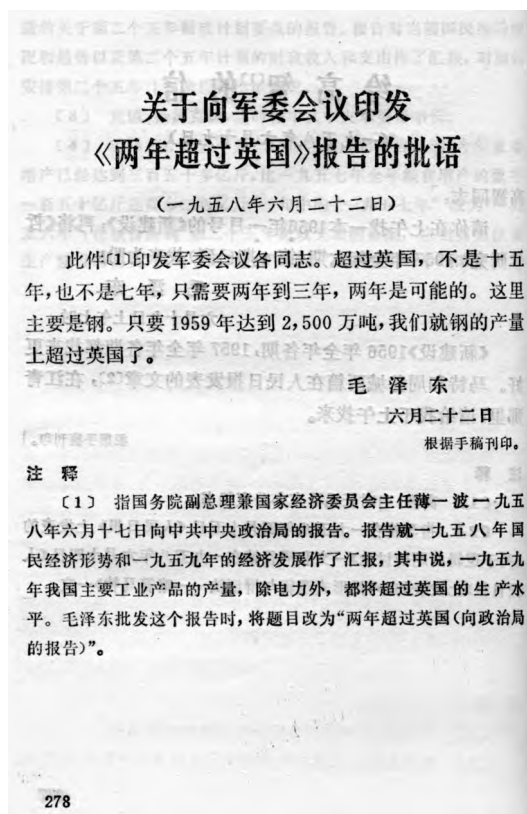
以发电能力来看,苏联现在是700万千瓦,美国是1300万千瓦,而我国1962年就可以达到4600万千瓦,等于全世界的发电量,搞那么多干什么?(见1958年8月6日薄一波《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

由于说话者的职务关系,这种卷袖子说大话的发言模式,直接给领导层及民众带来两个鲜明的冲击力,一是“什么美英国家不在话下”“不赶上才怪”;二是生产能力超强,中国能养活全球89亿人口,搞那么多发电量干什么?由此开头,整个领导阶层陷于自我膨胀、盲目亢奋的状态,国家整列经济列车霎时间不加限制地冲入可怕的快车道。

二

对于大跃进的火爆劲头,多数中央领导人都乐哈哈地承认没有思想准备,带有欣喜若狂又矜持抑制的情绪。譬如中宣部长陆定一就在北大第四届团代会表态:“现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其快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的,至少我没有想到,我落后,大家怎样?从前是每亩几十斤、一百斤,今年都是4000斤、5000斤、7000斤,我不知道怎样生产的,消息传到外国,外国人不相信。外国有很多人崇拜中国的。今年要产10000斤、20000斤。”他甚至借此机会嘲讽马寅初的人口论:“不是有个人口论吗?说,粮食没有人口增长快。这人口论对资产阶级国家差不多,资产阶级生产力发展就是慢,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妥当。这么多,到二千斤,吃不了怎么办?倒成了问题。”一方面担忧粮食多,另一方面还为钢铁多发愁:“钢铁现在是524吨,不多,不搞则已,一搞就是三百万吨,修铁路以后也就不要修了,中国只有这么大,九百万平方公里,这么多钢做什么用呢?将发生问题。”(见1958年7月陆定一《共青团北京大学第四届代表大会关于中东形势和党的教育方针报告》)

为粮食大丰收忧愁,竟成了1958年夏秋之际领导人说话的主题之一。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在8月中央经济内部会上就披露:“毛主席这时就提出了,现在大家应当开始考虑,富了怎么办?要发富的愁了。”薄一波给与会者演算了这个丰收的难题:“(主席说的)是有道理的。每人平均2000斤,用不了怎么办?我们曾经算一下,吃600斤、种子100斤、饲料200斤,加起来才900斤,算来算去也用不了2000斤,每人100斤肉,肉多了粮食吃得更少了,粮多了怎么办?”他在会上开了玩笑,要各省市党委自己想办法消化多余的粮食:“我看今后各省委要自己包干,自己生产的不准出省,而且中央还要分配指标,你还要想法用了。”(见1958年8月6日薄一波《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粮食过剩论”张扬了较长一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也让高层放松直觉般的警惕。因为直至1959年11月毛泽东还在会上迷惘地表示,不是粮食很多吗?我就不相信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没有粮食吃?(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一则批语

李先念1960年1月财贸会议精神传达报告提纲)

刘少奇此时也是一个乐观其成、轻易相信的领导人,他到处讲话,最爱说的一句就是:“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1958年7月初他到北京石景山发电厂视察,对围聚来的工人们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几十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后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了,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它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是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的干劲这么大,不记上下班,干完算数,这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他数着手指说几年几年如何,并且他又加以发挥:

“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15年我们要赶上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6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15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

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见1958年7月6日石景山发电厂党委《少奇同志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谈话》)

刘少奇能具体说到某个省份超过英国、法国,15年内超过包括苏联的整个欧洲,确实有令人新奇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还说:“报上不讲二三年赶英国,七八年赶美国,是因为帝国主义一听十五年赶英国就害怕,等我们搞起来了再讲有什么不好?他们议论说我们超不过他们,等超过去了,那时他们就更吃惊了。”其实那时报纸上发表赶美超英的言论已经非常时兴、随意,刘这么说有现场烘托气氛、机智嘲讽的效果。

三

整个大跃进期间,领导层的心态超常放松,那种历史性快感早就按捺不住,一逢内部会议张口就随便说出“巨大的成就”,有时就丧失了政治家应有的严谨界限。这些官方言论既为大跃进推波助澜,又构成运动中开放最为诡异、沉重的“奇葩”。

譬如刘少奇1958年10月初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之后,兴致颇浓地夸赞道:“看了这个展览会,这么多展品,我觉得我们要超过世界水平似乎并不难。”他说:“美国算不了什么,我们要多少,有多少,粮食现在我们敢吹一下牛,要多少有多少。”他一直推崇半工半读制度,认为粮食够吃了,全国就会多出许多劳动力,办工业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工农业就可以实行四小时工作四小时念书。(见1958年10月9日《刘少奇在参观学校内部馆时的讲话》)刘少奇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行事特点,就是由于个人早年勤工俭学的经历,多少年来格外痴迷半工半读,直到文革下台前都竭力推行。1958年浮夸成风,更让他滋生创办全民亦工亦农亦学的共产主义劳动模式:

“共产主义搞好了,做四小时五小时工作就够了。大家都来工作,什么都用机器,东西出很多,就用不了做8小时工,其他时间还读书,再看点电影,还是八小时睡觉。每个人学习,一辈子学习,那时的人什么都会,会检修,会制造,会炼钢,会开拖拉机,会养猪,什么都会。”(见1958年7

月6日石景山发电厂党委《少奇同志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谈话》)

从事科技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也有“口无遮拦”之时,有时报喜也让人心跳不已。譬如半导体主要原料锗要从煤烟中提取,工艺难度颇大,美国当时年产锗20吨,苏联年产10多吨,而中国只年产12公斤,其中2公斤还是苏联赠送的。1958年7月12日在全国半导体工作会议上,聂帅说,将宣布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估计我国今年可以生产锗200吨。转眼间就从12公斤达到200吨,是美国的10倍。北京市高校党委杨朝俶得知后,当作“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喜讯之一写进报告中,并描述会议洋溢的成功者的傲人气氛:“许多洋专家远远抛在运动后面,怀着苦闷嫉妒的心情抱怨时代列车走得太快了。”(见1958年7月15日杨朝俶致高校党委常委《关于当前科学工作、科普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汇报》)

细致梳理一些当年内部讲话稿,就会发现个别领导人的表态还是较为低调、中性,尽可能不说过激的话语。1958年8月24日,周恩来前往清华大学参观应届毕业生红专跃进展览,不断重复一句话:“看到这些成果,我是来订货的。”例如他问土木系学生房屋最低造价多少?他说:“国务院打算搞公社,搞公共食堂,搞集体宿舍,什么东西都有,你们最近的成本是多少?我来向你们订货,你们来搞一个好不好?”只是走到无线电系学生制作的电视广播两用接收机跟前时,听说右派分子孟昭英等过去多次尝试而没有成功,周恩来指着孟昭英的名字问道:“这些创造给他看了没有?他低不低头?要是服输,是个好汉,就请他写下来放在这里,那么他的名字可以改变一下。应该请他来看看。”(见1958年8月25日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清华大学毕业生红专展览会报告》)看得出来,周的态度自始至终是温和、适度的,没有带有夸张和敌意。

领导人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多是喜形于色,滔滔不绝,而总书记邓小平呈现的却是出了名的沉静。1958年10月5日参观内部展时,邓小平言语不多,只是要北京工业学院将射程四十里的海岸大炮设法改为能移动的,称赞地质学院组织小分队到各省找矿的办法很好,比关在学校好。最惊奇的是,他最好不要笼统地讲“超国际

水平”，他解释说：“在尖端科学方面，无论苏联或者英美都有保密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因此现在所谓超过他们，也可能是真的超过了，也可能还没有超过，而且认为自己已经都超过人家了，就没有奋斗目标了。”他同意北师大的办法，即指出某项研究成果，达到或超过英美哪一年文献资料的水平。（见1958年10月6日北京高校党委会办公室《参观高等学校展览会内部临时提出的意见》）这是一项公允、说理的改进建议，如能全国执行将成为遏制大跃进虚报成果、盲目自大的冷静措施。邓小平的寥寥数语，颇具见识和勇气，说出了别的领导人所不能道出的话，有意无意中捅破过度膨胀的学术泡沫。

四

从中央委员层级中，我们再找出两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加以评析。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那时多给人平实稳当、善抓大事的印象，但到了大跃进时期也说话不尽稳妥。1958年他到江西等地转了一圈，回来后发言就热情过头。

他多次向人表述：“我亲眼见到一个西瓜有一百几十斤重，一支烟叶有十四尺高。”江西安国县委高调宣布来年高产一万斤，后年就要休耕一年。胡耀邦对此表示：“休耕后大家都要去搞工业，搞学习，这样很好。人家只有礼拜天，我们搞了个礼拜年。”他由此引申道：“全国稻子的最高产量是十三万斤，一个人一年种一亩地，就可吃一辈子。明年生产两千亿斤粮食，以全世界人口计算，每人吃六百斤，那我们的粮食就够全世界吃一年。”“我们种一年田，就可把他们包下来，别的国家就可不要种田啦。”（见1958年10月25日高校党委会办公室《胡耀邦在参观学校内部馆时的讲话》）

胡耀邦曾经构建这样一个想象性的场景，反复在大小场合描绘过：“1949年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至今有9年没有在天安门讲话了，明年得讲它一番，要在天安门宣布，‘我们已经超过英国了。’”也说过类似“1959年除汽车、石油外将超过英国”、“1969年超过苏联”、“我们搞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快”之类的话。大跃进运动“妖魔般”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像胡耀邦这样的领导人都会被裹挟其间，言行变得

如此异样。

再一个样本是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大跃进火热时，《人民日报》原计划发行一百五六十万份，但受纸张生产的限制，只能维持在一百二十万份。但是毛泽东嫌发行量过低，不足以影响全国。于是，从周扬、薄一波的讲话中屡屡听到毛泽东的抱怨：中国如此之大，《人民日报》可否发行到二千万份？纸张生产不到位，二千万份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周扬只是生生地造势，简单无奈地呼应几句。1958年6月毛泽东受周扬等人的鼓动，看中民歌的赞颂作用，当即做了指示：“每个乡出一本民歌，有很多不朽的作品，可传子孙后代。”周扬紧接着加以理论上的阐述：“群众的生产力、精神都解放了，然后在文学艺术上表现出来。”最高领袖愿意夸大行事，不顾现实的可能性，像报纸印行二千万份、每个乡出一本民歌集等，都是头脑发热的莽撞之事，周扬执行起来当然困苦万分，只能借大跃进后期的疲软应付了事。

但是大跃进运动中，领导层滋长的那种待人对事的刻薄和嘲讽，尤其是对待知识分子方面，周扬运用得最为顺手。陆定一那个阶段爱发这样一句感慨：“文化多了要亡国。”还附带一句名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降了三级，不值钱了。”周扬据此引申发挥：“这句话有道理。六朝的好些皇帝很重视文艺，自己就是文学家艺术家，可能很快就亡国了，当然他们亡国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基础没有搞好，就搞上层建筑，结果是头重脚轻。”（见1959年1月30日《周扬在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6月初，周扬应邀到北京艺术院校学生大会上做总路线的报告，谈及有些学生天才对劳动人民没有感情，他表示：“你对人民没有感情，不相信、不喜欢人民，人民为什么要喜欢你？劳动人民就找不出像你这样的天才，我不相信，即使找不出来，我们也宁可牺牲，你唱的、画的好，我们牺牲眼福、耳福，不听不看。”（见1958年6月11日《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问题》）周扬通篇都带有强烈的批判意味，说起来十分尽兴达意。大跃进期间高层官员多半都是以这种口吻做报告，模仿领袖的思路，抒发胜利者豪迈无敌的情怀。

五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经济建设方面出现的大跃进。1958年“土法炼钢”的成败最招世人的关注,苏联在京的专家顾问对此多持不相信的态度,惟有一位叫巴拉金的顾问无条件认同。

薄一波在经委内部会议上几次具体谈到这位独特的巴拉金,以他的故事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通过实践来认识”中国的大跃进运动:

我们经济建设委员会有个苏联专家顾问,叫巴拉金,不大相信,我们带他去看了土法炼钢以后,他回来和北京的一些苏联专家共同研究,他向大家报告时得出一条结论是大中小结合,这小型土法实在了不得。别人不相信,他亲自讲了他所看到的平谷土法炼钢的情况,他讲中国有12000个小高炉,生产能力可达2000万吨(鞍钢现在是300万吨最高400万吨)。别人不相信,问他用土法从设计到施工到建成要多久,他说20分钟,别人说别开玩笑,他说土法就是20多分钟,快了也许还用不上了。别人还是不相信。(见1958年8月6日薄一波《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

整个经委苏联专家组只有巴拉金一人“相信”土法炼钢,巴拉金到现场观看后居然也认为20分钟快速法可行。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件诡异的事情,巴拉金为何会和集体盲从的中国官员一起“失聪”呢?国家经委领导层当时是严肃嘲讽苏联专家组的“无眼失珠”,而对巴拉金另眼看待。一桩国际性意义的“炼钢法”仅获一位苏联专家的赞同,无疑对号称“炼钢总指挥部”的国家经委来说是十分难得的。

到了1958年深秋,党内有人认为“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薄一波对此颇为恼火,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大加驳斥:“炼钢又炼人,炼钢又炼了思想,使全国人民都得到了锻炼……打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点,是否也可以创造出中国式的炼钢法来,对世界炼钢术加以补充。农民也可以搞,全国有近六千万人新参加到钢铁战线上,受到方方面面的锻炼,其中有近千万人学到初步的钢铁冶炼技术,你说浪费么?试想办一个千万人的技工学校学冶炼技术,需要花多少钱?”(见1958年11

月4日薄一波《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的纪录要点》)六千万人上山炼钢的成本与一千万人学习冶炼技术的学费相抵,这样换算法确实稀奇。

薄一波在会上重申这样发展的策略:“中国是一个六亿多人口的大国,要高速地发展我国工业,使我国工业遍地开花,仅仅依靠现代化的大企业是不行的,要发动全体人民,特别要把五亿农民动员起来大搞工业。这样,就必须从小的土的着手。”

实际上到了11月中旬,薄一波已经在内部委婉承认:“我们不能认为今年钢铁生产已经太平无事了。”他又说:“钢铁的数量可以完成,但从质量上讲,计划完成得不好……这些土铁土钢当前很多还是铁难成钢、钢难成材的。”(见1958年11月14日《薄一波同志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会上讲话的纪录要点》)针对有些地方棉花只收了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危险处境,他表态,在工业和农业之间要合理安排劳动力,对劳动和休息作妥善安排,但这已难以阻止“人祸”漩涡的快速旋转。

1959年二三月间,全国经济形势危象呈现,钢铁生产日产量下滑,主要工业产品也没达到平均日产量,全国主要产品第一季度计划面临完不成的危险。参加中央会议的北京市委工业书记郑天翔传达说:中央希望只给大企业书记传达形势不好的信息,不要和群众讲,怕泄气。(见1959年3月21日《郑天翔同志传达沈阳会议精神》)更急迫的是,原定1959年4月18日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准备修改四大经济发展指标。但中央高层觉得涉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威信问题,还是不修改指标,接着干下去,要长社会主义志气,灭帝国主义威风,不能让杜勒斯哈哈大笑。

经济各部门连连告急,中央分别成立钢、煤、矿、运输指挥部,向重点企业派遣特派员督战。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大跃进的目标,他发话说,现在春暖花开了,现在压缩了两三个月了,要鼓足干劲跃进了。为此,北京市委决意赔钱也要把钢铁生产挺下去。(见1959年2月28日北京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贾庭三报告当前生产形势》)

直至1960年夏季,经济形势日显恶劣,时时有崩盘的可能,中央工业会议甚至喊出“把8月气候(暗指‘火热’)提前到5月来”的口号。过去每周有两次全国生产调度会议,危急之下,周恩

来、李富春指示现在每天碰一次头，每天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一次。

1959、1960年薄一波在经济工作会议传达最多的毛泽东语录，就是来回这么几句话：“主席讲，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天半天，一分一秒都要抓紧。”

(见1960年10月11日《薄一波同志在东北、华北工业书记会议上的总结》)但是不管怎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跃进以全面溃败而告终，祸害甚烈。■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编辑)

(责任编辑 黄 钟)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孙越生	35.00	7.00
蒋介石初上台湾岛(1949—1953)	李庆 根志优	58.00	9.00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金 雁	68.00	10.00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左凤荣等	246.00	20.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陆南泉 萧功秦	48.00	8.00
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马立诚	39.00	7.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两个“秀才”	张希贤	56.00	8.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	148.00	18.00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 诚	38.00	6.00
孤舟独树	康国雄口述 何蜀整理	38.00	7.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纪实	杨继绳	35.00	7.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29.5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主编	36.00	6.00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主编	36.00	6.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11.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张聿温	32.80	6.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19.00	12.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晏 欢 袁天鹏	28.00	7.00
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	寇廷丁 王 凡 东 平	36.00	7.00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	王 凡 东 平	3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窦应泰	48.00	8.00
走出腐败高发期	杨奎松	58.00	8.00
邓小平访美那九天	高 波	32.00	7.00
官场怪圈定律	陈天璇	46.00	8.00
黄埔恩怨	李若古	38.00	6.00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王晓华 张庆军	28.00	7.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吴 思	88.00	10.00
读史求实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杨奎松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张 鸣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六册)	金冲及	180.00	20.00
母亲杨沫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档案》栏目组编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	36.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谢 韬	49.00	8.00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黄宗良等	246.00	20.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访	38.00	7.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人	95.00	10.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直言无悔	徐 孔	29.80	7.00

代购代邮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官僚主义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就它的野蛮残忍，专横暴虐，在现实世界无所不用其极地造成的无数悲剧来说，足以使十亿神州为之痛定思痛，齐声恸哭。但是，就它的虚伪渺小，卑鄙愚蠢，在理论领域中难见天日而言，又足以使它流为千古笑柄。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东西，只能以含泪的苦笑，用认真的大不敬文笔去描述它，聊表区区对于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的无数善良人们……

全书在反思中外历史的基础上，探讨了官僚主义的起源及其发生作用的规律，有很多独到的学术见解，作者对当代中国官民关系的思考，反映了对国家民族爱之深、痛之切的赤子情怀。

《昨天的中国》：苦难的过去，理应换来宽舒的未来。引颈以望，中国宪政，其路漫漫。中国保钧“爱国”狂潮，与晚清义和团有何区别？北洋政府到底是“卖国”的还是“爱国”的？中国的宪政之路究竟葬送在谁的手里？

且看思维活跃，一直很敢说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来谈论昨天的中国。了解昨天的中国，从而更清楚中国明天将走向何方。

《蒋介石初上台湾岛(1949-1953)》：1949年12月，国民党败退大陆，偏隅台湾，此后直至蒋去世，再也没有踏上过大陆的寸土只木。对于国民党初上台湾岛这五年间的历史，大陆民众知之甚少，且多有片面和误解。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台湾，我们撷取了台湾媒体对当时事件人物报道的新闻图片，包罗了台湾民生、政治、军事的方方面面，以期这些珍贵的影像记录能更直观地反映国民党治下的真实的台湾。

《可操作的民主》：中国人要民主主要了上百年，走过了曲折道路，付出了血的代价。假如民主有一天真的来临，我们该如何拥有呢？我们该如何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我们又该如何尽到民主的义务？这个时代不可能截然地分为没有民主的黑夜和拥有民主的白昼，在夜与昼之间，如果我们不进行学习，未经培训，那么民主的曙光也许永远不会出现。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饶漱石与“饶、潘、扬反革命案”

○ 景玉川

“高、饶事件”过去已半个多世纪,随着一些档案资料的披露与当年知情者的回忆文章面世,人们逐渐对这件曾震动党内外的大案有了更清晰、具体的了解。

高岗1954年8月自杀身亡,饶漱石则因涉及“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1975年春死于狱中。本文根据有关资料谈饶漱石与“饶、潘、扬”案的几点情况。

一、杨尚昆的记述与《毛选》有关注释

《杨尚昆日记》和杨的《回忆高饶事件》(原载《党的文献》2001年第一、二期,后者作为《附录》收入《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一书)提到:如果不是“闹翻案”和涉入潘汉年和扬帆一案,饶漱石不至于被捕和开除党籍。

杨尚昆1955年3月19日日记载:

最后中央全会一致通过:

(1)(略)

(2)同意饶漱石不出席代表大会;

(3)同意不开除饶的党籍,只撤消中央委员;

……

11天后的4月1日,即全国党代表大会闭幕第二天,也就是陈毅在潘汉年找他后立即赴中南海将潘的材料转交并报告毛泽东的那一天,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

12时,罗(瑞卿)、陈(陈毅)、谭(震林)等同志来西楼汇报逮捕饶漱石的情况,并决定陈麒麟同志去参加此案的研究工作。

晚间有晚会,主席和康生等同志均出席,康生情绪甚好,向我说:他很高兴,所以来看戏了!

4月3日,潘汉年被捕,扬帆则于4月12日正式宣布逮捕。

杨尚昆4月4日日记载:

今天召开第七届五次中央全会。主席亲自

主持。议程:

(一)、(二)(均略)

(三)、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

……

今日五中全会上,空气十分紧张,大家都大吃一惊!

不要把坏人看成好人!这一教训十分重要!

也就在这一天,饶漱石被列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此案成了惊天大案。

几十年后,事实证明“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是完全搞错了”(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第309页)。

随着1982年后潘汉年、扬帆先后平反,有关怀念和赞美潘、扬的文章纷纷见诸报刊,并有了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侥幸生还的扬帆也撰文自述这场磨难。这桩大案被人称之为“共和国第一冤案”,记述此案的著作《共和国第一冤案》出版时,时任公安部长的王芳还为此书写了序言。不过,在杨尚昆的《回忆高饶事件》出来之前,一直以“饶、潘、扬反革命集团”命名的这一案件,后来却省去了饶漱石的名字,只提“潘扬冤案”。

这也就难怪《纵横》2001年第一期《我所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一文中,作者杨成武提出疑问:

……现在,潘汉年、扬帆的“内奸”一说已得到平反,而饶漱石与潘、扬错案引起的纠葛,仍未见到有什么新的说法。

事实上,在《纵横》文章出现之前,中央虽没有专门为饶漱石作出复查结论,但在198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第436条注释中作了这样的表述:

……饶漱石……上海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

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

只是,看到这条注释的人不多。虽然以注释作为一种平反的方式也曾有过,但既然这一“完全搞错了”的冤案是由法院作出判决广为公告的,如今单凭一条注释代替平反不免令人困惑。对待同一案件,饶漱石是以包庇潘、扬的罪名判刑的,结果被包庇者大张旗鼓平反,而包庇者则只是悄悄地凭注释来平反。

二、陈麒章给陈云的信

至于“饶漱石与潘、扬错案引起的纠葛”,至今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没有能述其详者,而前文引用杨尚昆 1955 年 4 月 1 日日记中提到的陈麒章先生却是这一“纠葛”的知情者之一。

陈的情况,与高岗最后一任秘书赵家梁相似:他 1953 年初为饶漱石的政治秘书,也是饶最后一任秘书。高、饶事发后,他继续留在饶身边兼顾观察饶的言行。“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出现后,他参与公安部对这一案件的侦讯,具体在饶漱石专案组。

1993 年冬,笔者在北京采访了陈麒章先生,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陈麒章参加了中纪委对潘汉年问题复查工作的全过程,并起草了有关潘汉年平反的文件。1982 年 8 月 13 日他又就饶漱石涉入潘、扬案一事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陈云同志请转中央:

在潘汉年、扬帆的问题相继澄清并分别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之后,过去认定的那个“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自然不能成立。上海解放后,饶漱石在指导该市对敌斗争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究竟能否构成饶的反革命罪,自然也成为疑问。饶漱石以前历任党内外重要职务,将来写党史时,是免不了要提及的人物。他究竟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楚,而且现在也完全有条件弄清楚。我建议中央责成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

饶漱石在 1955 年 4 月 1 日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后,从 1955 年 4 月至 1958 年由公安部门负责侦讯两年多,后来长期关押在秦城,1965 年前后

移交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1965 年 8 月 30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决书确认:“被告人饶漱石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他在上海工作期间,利用中共上海第一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务,采取两面手法不仅重用了内奸分子扬帆,把中统潜伏特务分子胡均鹤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内而且在扬帆等人大量使用特务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被揭发后,中央、华东公安部一再向他提出要彻底处理时,他仍然不予置理,使这一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达 5 年之久,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 13 条的规定,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 14 年,剥夺政治权利 10 年。随后裁定假释,移交公安部门管制、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饶漱石被重新收监,后来不知何时病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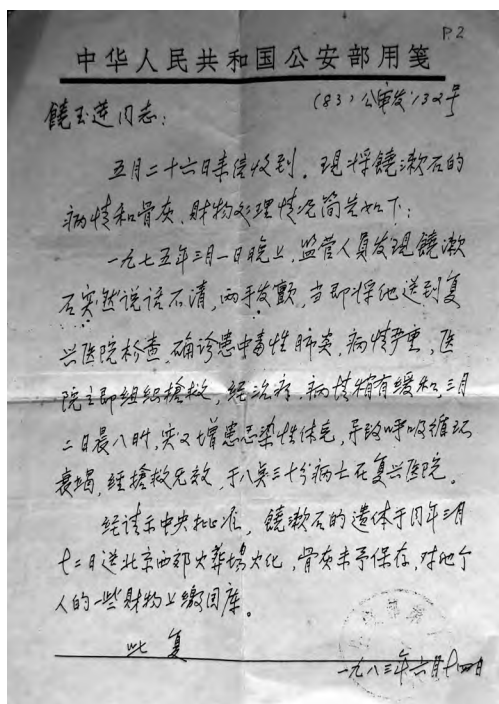
从复查潘汉年、扬帆问题所接触的材料来看,对饶漱石在上海那些问题的定性,显然有问题。判决书上认定饶漱石犯有反革命罪的理由,是很牵强的:

第一,在公安部侦讯的两年多中,对饶的重要历史关节进行过详细查证,始终查不出饶在历史上有投敌叛变和充当内奸的事实;

第二,关于使用胡均鹤的有关情况,在中纪



饶漱石 1946 年在北平军调部



1983年公安部给饶玉莲函

委关于潘汉年同志的复查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已查明这属于公安工作中的错误，不是内奸分子掩护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性质；

第三，已查明，饶漱石对于上海公安局使用胡均鹤等人过程中犯的错误的，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但是也查明：1.在1951年3月以后，由华东公安部卢伯明同志为主组成的清理小组，对上海公安局所用特务进行清理，饶漱石并未加以阻挠；2.罗瑞卿同志原决定，如上海公安局对胡均鹤处理不便，可将胡调到北京。后来市局未执行此指示，仍留胡在上海工作。据1955年潘汉年、扬帆、王征明（原市公安局政保处长）等同志被捕期间的口供及当时向卢伯明同志查询，均证明后留胡在上海的事，与饶漱石无关；3.从1952年初起，上海市公安局改由许建国同志任局长，以后卢伯明同志也调去任副局长，以后扬帆同志已不能左右全局工作。而胡均鹤在1951年华东公安部派人清理市局使用的特务之后，仍被留在市局做特情派遣工作，直到1955年他被捕时为止，为时又达3年之久。饶漱石则早已于1951年底就离开了上海和华东，他离开之后那几年使用胡均鹤等人和使用中发生的问题，怎么还能算在他账上呢？

第四，从华东局上海市委档案上查到，陈毅同志当时对“以特反特”的方针也是表示赞成的，

对使用胡均鹤的事是知道的。另据扬帆同志说：市局使用朱志远等几个特务骨干分子（是我党叛徒），刘晓同志也知道，刘并说过“像朱志远这样的人可以用”。

饶漱石已死，其妻早已改嫁，现仅有一女兰沁在新闻电影制版厂作翻译工作……兰沁向个别领导同志询问过她父亲究竟是什么问题，但并未提出复查要求。我认为，像这样的事，不论其家属有无要求，组织上都有责任作必要的澄清。

此致

敬礼！

陈麒章

1982年8月13日

这封信发出后陈云是如何处理的不得而知；《毛泽东著作选读》那条注释与此信有没有关系？也待知情者说明。

三、陈麒章的有关回忆

在对陈麒章的采访和与之长期通信中，他还告诉我一些有关此案的人与事。根据采访记录与陈给笔者的信，整理出以下三点：

1. 刘晓谈朱志远。

据刘晓说：三十年代朱志远叛变后，刘晓还留在上海。有一次刘在马路上碰见了朱志远，当时刘晓很紧张，因为他知道朱是叛徒。但朱这次放过了刘晓，并没有为难他。所以后来刘晓说：这个人没有完全背叛，还可以用。

2. 关于胡均鹤。

胡均鹤，1907年生，原中共党员，出席过党的“六大”，曾任顺直省委书记，其妻为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妹妹赵尚芸。胡1932年被捕叛变，成了大叛徒，投靠国民党，成为中统特务。日本人来了，他又投靠汪精卫、李士群特务系统。但是以后潘汉年做他的工作，与我们建立了情报关系。上海解放前夕，重操中统旧业的胡通过潘汉年与我党接上关系，到华东局驻地丹阳见到扬帆，扬报经中央社会部同意后，将胡引见给饶漱石，饶即交代扬帆将胡带去上海戴罪立功，胡均鹤等人在上海市公安局帮助我们破获了许多国民党潜伏电台和大批隐藏特务。利用胡等当时叫“以特反特”，华东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对这

个问题一直有争议。华东公安部不同意,认为这样使用国民党特务太危险,搞不好会把我们的队伍搞乱。为此争论很大,潘、扬事件出来后,有个说法,说是包庇了国民党隐蔽特务三千三,就这样把胡均鹤抓起来了。但抓起来的胡一直不承认他是潜伏特务,说自己确确实实想赎罪,过去叛党,所以现在要立功赎罪,没有干过坏事。即使判了刑,胡均鹤也一直在申诉……潘汉年、扬帆平反后,胡均鹤也被重新做结论,平反释放后按离休干部待遇,工资定为15级,一直到1993年3月病逝。

使用胡均鹤等人,陈毅、罗瑞卿都知道,也同意,饶离开上海与华东后仍继续使用,可出事后,账则全算在饶漱石头上。随之牵连了3000多曾从事公安与地下工作的同志。

3.当时“饶漱石专案组”的结案报告。

经过两年多的侦讯,“饶漱石专案组”写出了结案报告(内容大部分与给陈云信中所述大致相同)。后来公安部把饶、潘、扬三个专案组的侦讯报告合写成一个给中央的结案报告,在报告中加了一句:“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就此,陈麒章先生回忆说:

这在我们这个饶的专案组的报告中是没有的,所以至今我问心无愧:我们这个组坚持实事求是,没有瞎上纲,也不搞牵强附会,查清多少就说多少。

在公安部领导听取饶专案组汇报案情时,陈麒章根据查到的上海市委常委会议记录本,如实说明饶在会上向市委提出“以特反特”方针时,陈毅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也表示过同意。后来陈毅在另一个地方讲话时,也讲过“以特反特”问题,并没有否定这一方针……陈麒章为此当场挨了批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饶、潘、扬大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徐子荣打断他的话,说:“陈麒章同志,你怎么这样看问题呢?”言下之意是说怎么能把陈毅扯进去?

四、关于“饶漱石闹翻案”

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一文中谈到:原来所定不开除饶漱石党籍的决定,由于在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发生了意外,所以才改变了对他的处

理。这意外的变化除了扬帆案件和潘汉年的交代外,还有一条是“饶漱石闹翻案,激起了众怒”。

据杨尚昆3月16日记载:

看五年计划文件和关于高饶问题文件。

4时(下午)去看康生同志,同他谈了约2小时,他对高饶问题的报告,表示同意,他认为在政治上是严肃的,组织处理上是宽大的。惟他对饶为何企图翻案表示不解,他认为不是什么铁托问题引起的,而是饶的一套手法,很可能是知道高自杀后的手段。(《杨尚昆日记》175~176页)

在这以后的3月19日日记记载表明此时仍不开除饶的党籍(见本文第一部分),这说明“闹翻案”并没有置饶于绝地。

那么,所谓的“饶漱石闹翻案”和处理上的“发生意外”是怎么一回事呢?除杨尚昆文章中所说的外,陈麒章补充如下:

1955年3月初,饶在家听候处理。有一天,他家里的电话“红机子”响了(饶停职反省期间,他家的“红机子”未拆除),这本是中央机关39局(电话局)试打各户“红机子”,饶不知情,产生错觉,以为他的问题可能很快解决了将恢复或分配工作,因而情绪激动,向其妻和陈麒章发牢骚,说:中央还是相信他的,他没有反党,是陈毅有意挑起要报复他。饶还指责陈麒章“充当了陈毅的打手”……

陈麒章当时负有“每周写个‘饶漱石情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的任务,杨尚昆还曾当面交代陈麒章“有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到中南海,直接向我汇报”(《回忆领袖战友同志》301页)。于是陈随即将饶这一情况详细给中央报告,在当时政治气候下饶妻也写了内容相似的报告交给杨尚昆。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二人的书面汇报被作为会议资料散发给与会代表。刚听过毛泽东讲“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代表们立即把饶的“闹翻案”同“以特反特”问题联系起来,认定饶的活动已超过内部矛盾范围,属于敌我矛盾,于是对饶的处理陡然“升级”,“发生意外”了。

这就是杨文所说的“饶漱石闹翻案”和“意外”。■

(作者附记:此文写出后,曾经陈麒章先生看过。)

(作者单位为江西省九江市文联)

(责任编辑 黄 钟)

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序言

○ 李 锐

今年我已经吃96岁的饭了，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笔。前不久，李凌同志将他的书稿《“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给我，并嘱写序言。我之所以应命，是由于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师的悲惨命运，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我晚年不断呼唤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可以说，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历史变局的一个例证。

当年领导云南地下党活动的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是我在中组部工作时的同事，又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已经去世），他在云南多年，曾亲临联大指导工作，解放后就被打成“地方主义”，从一线退下，再没有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

1939年夏，我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青委书记是蒋南翔），认识了袁永熙，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省青委委员，刚从云南调到重庆南方局办的青训班学习。1941年，皖南事变后，全国白色恐怖，他奉云南省工委的批示从昆明到农村隐蔽起来，继续在个旧地区从事党的工作。随后奉南方局组织部的命令，1944年回西南联大复学，参与领导学生民主运动。他有过短暂辉煌，解放后，在团中央任学生部副部长、清华党委书记、校长助理。他的夫人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因他被打成右派而离婚，文革中自杀。

还有何功楷，也是“一二·九”运动后武汉秘密学联的成员。他的哥哥何功伟，在抗战初期被国民党杀害，延安开过追悼会，是我参加筹办的。何功楷在外交部工作，任过驻外大使。

1952年以前，我一直在报社和宣传部门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曾写过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惨案，随后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难，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书中的统计数字说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学中只有党员20多人，运动之后发展到100多人，仅西南联

大就有71人。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曾在校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3800多人，先后在校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有206人。其中“一二·一”惨案中遇难的烈士有于再、潘琐、李鲁连、张华昌（于、张不是联大的）。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有肖亮、刘国鋹（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钟泉周、钱泽球、江文焕、荣世正，还有参加云南武装斗争牺牲的烈士吴国珩、曾庆铨、陈海、陈虞陶，共13人。大多数学生解放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马识途、宋平、王汉斌、彭珮云、何东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晓等。有一位1940年在联大毕业的老教授、研究美国史的专家刘绪贻，书中没有提及。2012年5月，武汉大学为刘教授一百岁大寿开了庆祝研讨会。由于他坚决反对“用民本偷换民主”的“维稳”，以此压制改革，大家歌颂他为“百岁非毛派”，要力挺“刘绪贻精神”。我的贺辞：“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为实施宪政努力奋斗”，悬挂在大厅；还编入纪念文集《野老丹心一放翁》的首页，文集有近100人的文章，约120多万字，有很多文章是歌颂联大的民主自由，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对最后战胜国民党所作的贡献了。

西南联大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不仅是云南省工委领导了联大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一批优秀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还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领导和教授队伍，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后两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有兼职，不能来云南，校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全权主管。梅的人品与个人修养极佳，从不轻易发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陈寅恪如此评价：“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的生活也很严谨，

他将校长专用车改为公用车,自己尽量步行;每遇困难挺身而出,从不独断专行。清华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长力主学术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体制,学校有教授会、评议会和教务会议,最有发言权的是教授,被称为“教授治校”。梅视教授为大学的脊梁,1931年就职演说有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华罗庚,入学考试英语差的吴晗,数学极差的钱钟书,都是他引进的人才。在云南时,梅校长对校内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从不干涉,甚至加以保护,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行动时则予以抵制。

联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队伍。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遭国民党刺杀,引起轩然大波,激发更多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的敌对方面。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向达、吴晗还有云南大学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进程的。他们大都留过学,受西方科学、民主和宪政政治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深感不满。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国民党参议员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为了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一次重要行动。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层成员。这当然也是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坚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马克思主义。如罗隆基,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就因为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状况,鼓吹言论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资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从英国拉斯基学来的政治学,在《新月》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作了直接的批评,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理论(现在罗的这种见解已经被学术界接受了)。这些教授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极其真诚的、坚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可以说陈寅恪教授,我过去并不知道这位大学者,是上世纪80年代黎澍同我去钱钟书家拜访时,听钱谈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写信给陈,邀请他到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陈回信说:如要我当所长,这个所就不讲马克思主义,请你告毛泽东、刘少奇得到他们的同意。陈没有去台湾,一直留在广东中山大学,也没有北上。陈是史学大师,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是真正的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和父亲陈三立都支持维新变法,举办新政,遭到撤

职。他的哈佛大学同学吴宓对陈的家世也极为佩服,在《日记》中称赞他“造诣出群,非偶然也。”“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陈寅恪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曾经指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桎梏”当时指三民主义,后来指马克思主义。中央曾先后派章士钊、陈毅、周扬等人到广州劝说陈来京就职,陈一一谢绝。

这些当年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的进步青年和精神独立的教授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垒”,乃星空中璀璨夺目的群星。这种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李凌这本书的书名是《群星陨落记》,它不是要写群星,而是要写群星的陨落。1949年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根据当年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着重宣传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可说已经达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学上发生的流星雨一样,群星乱落了!这一本书就是记下了这一页历史。

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有学者统计,大小40多次),这些运动不论叫做什么名字,都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书中写到:当年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取得很大的成功,还一度化名在西南联大任教。可是到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就在山东大学校长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来被整死了。肃反运动的打击面(立案审查)是140万人,所有政治历史稍微复杂一点的都得列为肃反对象。华岗这样的大案是登了报的,其他的人就无从知道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为了要使右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毛泽东规定要有十分之一见报。这样,在当年的报纸上,就看到了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吴文藻、吴景超、向达……等等民主教授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材料。联大的学生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参加党组织领导的袁永熙。本书作者李凌,是在联大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也被划为极右了。当年在联大积极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后被整得很惨甚至整

死的,除袁永熙、陈琏外,还有李炳泉、吴显铨、尚嘉齐、范迪之、卢锡锟等,联大师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极右、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据我所知,1957年谢富治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时,他就把当年调到“边纵”工作的许多联大学生党员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义分子。陈寅恪是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的运动中,遭到批斗的,从此告别讲台,潜心著述,文革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双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我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刊《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从《毛选》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最早发表的原件中(《选集》作了大量删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银行等高等员司、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部分留学生和大学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属于前四等人的附属物(人数约一百万)。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即大部分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这些可友可敌的人有四百万。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略有变化,但没有根本变化,从1942年的整风运动及随后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我有亲身经历。(抢救运动中,延安和边区共打了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毛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阶级斗争”革命中的反动派。直到文革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连知识也被否定了:“知识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动”。

关于反右派斗争还应多说几句话。1949年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是整人的,主要整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除开打击人之外,还要批判这些人的见解,即批判所谓右派言论和右派思想。今天看来,其实当年所批判的右派思想,其中许多都是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张。批判了这些,就颠倒了是非,迟滞了中国按普世规律前进的进程,其后遗症至今还没有消除。反右派运动可以说是对中国民主群星一次大规模的摧毁。可是事情至此还没有完,比如吴晗,在反右派运动中是颇为积极

的(那时他刚入党),到文化大革命就成了祭旗的牺牲,最后他全家死得好惨。

由于知识分子喜欢提意见,喜欢多嘴多舌,执政当权之后,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异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感到同他所希望的人人都当“驯服工具”,当“螺丝钉”(学雷锋)的要求格格不入,将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当敌人看待的早年认识,终于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实践了。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1966年4月24日,毛泽东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既然是反革命,当然要对付了。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边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在注释中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认真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讲话精神。”也就是说要全国各地一直到基层党支部都要对知识分子“开刀”。(以上引语分别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页,第12册35页,第13册171页、182页。)

文化大革命中,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

西南联大即是“民主堡垒”,又是“人才摇篮”。在八年多的教学期间,教育出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生中,到1995年,共有90位学生成为科

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8位是联大人,其中只有赵九章、杨嘉墀两位是当年的教师,其余6位都是当年的学生,即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我国从2000年开始,评“最高科学技术奖”,每两年评出两人。该项奖极其严格,宁缺毋滥。到2008年,共评出12人,其中有当年联大学生4人,即黄昆、叶笃正、刘东生、吴征镒。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来自联大物理系。可是培养这些学生的老师们,如曾任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叶企孙、饶毓泰和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都下场凄惨,甚至被整死了。

李凌同志的这本书,以他的亲见亲闻亲历为主,加上搜集到的材料,记录下这一页沉重的历史。现在的中年尤其青年人,大都不了解这一页历史。中国应当走上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大家的责任,一百多年来,多少人为此奋斗、为此牺牲。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处于一种什么身份和地位,毛泽东怎样扭曲了这种地位,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能无动于衷。任何理论都不

能离开真实的历史,对历史要有忠诚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都同他们当年经过的史实分不开。本书作以耄耋高龄、孜孜矻矻来写这本书,当然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前几个月,我所在的单位老干局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党的生日寄语”活动的通知》,要求我们这些老头写一段“寄语”,“以营造庆党的生日、迎党的十八良好氛围”。我就在“通知”下面的空白处,写了这样几句话,录以结束这篇序言:“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创新;此种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党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获得的。可是执政之后,却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祸国,直到‘文革’十年呜呼哀哉。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好转,前十年随世界潮流前进,八九年之后,普世价值失效。我的忧虑在:何时宪政大开张”。■

(责任编辑 黄 钟)

(上接第49页)本虽然战败,在美国的干预下实现了民主化,但它原来的统治集团,更不用说统治阶级,却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还须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些认识和说法,也很成问题。例如没有把日本对外侵略看成是民族犯罪,而总是以所谓阶级斗争的观点,把这只归罪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特别是还一再说日本人民和我们一样,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就混淆了是非。我们怎么能把跑到中国来进行抢劫、欺压和蹂躏中国老百姓的日本兵和遭受抢劫、欺压和蹂躏的中国老百姓相提并论呢?就是没有当兵来中国而留在日本从事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也是效忠天皇、甘心在为“大东亚圣战”作奉献。真正反战的是极少数。所以应当把进行对外侵略的国家看作民族犯罪,他们全国上下都应有负罪感,决不能为支持和参加侵略战争的所谓大多数人民去开脱和辩解。

这类主观认识的失误或过时,应该修正改变的,还有不少。如上世纪60和70年代,我们自己提出了个“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伪命题,认定它是对我

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发动亡我的战争迫在眉睫,因此要加紧全民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历史已经证明,这只是虚惊一场,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还丧失了一个世界经济科技迅速发展的大好机会。这种全局估计和据此进行的工作安排,不能不对当年的国际问题研究产生影响。这也很可能在本书有的文章中留下痕迹。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虽已经过十多几十年,但并不完全过时,大多还有现实意义以至长远意义。例如,对时代的判断就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实际上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论述与判断,当然应该继续进行研究讨论。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争论问题,很多都没有解决,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无论是在写作时还是经过多年的历史检验,书中各篇文章所表述的认识和论断,错误肯定不少,欢迎各位同行和广大读者能够不吝赐教,提出批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时代问题判断有误就会危害全局

——一本国际问题讨论文集的《前言》

○ 何 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划为每位荣誉学部委员各出一本文集,我也忝列其中。虽然当年社科院在评选荣誉学部委员时给我评定的专业是国际问题和中共党史,但实际上我从1950年离开地方工作踏上外交战线后,主要和一直从事的都是国际问题研究。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只是在1999年离休后才开始,至今也不过十多年。所以,这本集子就完全限于国际问题范围。还由于我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都担负着一定的行政领导工作,很难对专门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只能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外交工作的需要,写些带有时间性的调研报告,而且大多是提供领导参考的看法和建议。为此,又不能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辩驳,从而显示出较强的论战性。这本小书也就干脆命名为《争议下的国际问题观察》。

关于本书的内容,除了一般的国际问题外,还单列了时代问题和日本问题两项。这是因为:

第一,时代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判断有误,就会为害全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我们的错误判断,无视二战后不久世界就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经济、科技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大发展;却盲目坚持我们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认定战争不但不可避免,还迫在眉睫,并据此制定国家战略和政策。这就是,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继续革命,接连发动各种运动,造成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出现三十年的倒退,耽误了世界快速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对外要打倒帝修反(所谓反,是指以印度尼赫鲁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推进世界革命,因此实行闭关锁国、全面备战。结果使我们没能利用当时特别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还造成在国际上的孤立。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情况下,我们才看到和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特征,这就

为改革开放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导致此后我国经济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出现长期的快速发展,使后三四十年和头三十年的差别判若天壤,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二,列上日本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受命当了八九年的日本研究所所长。虽不能说对日本有什么研究,但既在其位,总得尽量谋其政,了解点日本情况,写点有关日本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一批日本问题的文章。这次出版文集,即从中捡出一批充数。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出任所长期间,正值中国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同日本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在日本掀起了一阵中国热,在中国兴起了经济上学习日本的高潮,双方提出的共同口号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日本研究所成立于这种时候,不但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也受到日本官方和民间的欢迎和资助。可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和许多人对中国崛起的嫉妒和疑惧,以及双方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两国关系又开始出现逆转。这一倾向如得不到制止,任其发展下去,就不仅会损害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会严重影响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稳定与繁荣。

应当说明的是,本书收集的都是十多年以至几十年以前发表过的文章。时过境迁,都成了历史资料。之所以再次付印,正因为还多少有些史料价值。即使如此,有些时间过久的文章仍然需要解释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里只就五六十年前的三篇文章做点说明。

第一篇是1951年所写《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这是我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后(时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在张闻天大使指导下向外交部和党中央写的第一篇调研报告。当时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但已处于相持阶段。由于中国的参

战和苏联的援助,美国军队已不可能推进到鸭绿江边,而中苏朝“三驾马车”(毛泽东语)也无力把美国赶出朝鲜半岛,美朝双方和世界舆论也都希望不再打下去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张闻天看出了通过和平谈判停止战争的必要和可能,遂让我以使馆研究室名义写了这篇调研报告。送回外交部和中央后,引起极大重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曾亲自致电使馆,说今后这类报告应以电报发回,交定期的信使带会贻误时机。

第二篇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在讨论朝鲜问题未达成协议后转而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主要是越南停战问题时,由我主动(因日内瓦会议在讨论朝鲜问题后,张闻天就要我回到使馆,没让我再参加讨论印支问题的会)写的一篇调研报告,题为《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旨在说明英法(美国虽有不同意见,但当时不起决定作用)在印度支那以至远东问题上的底线是划界而治、维持现状,我方(苏、中、越)要求法国完全退出印度支那也是不现实的,而只能以英法的底线为基础实行妥协。日内瓦会议最后就印支问题达成的协议,也就是这么办的。这篇报告当时曾受到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的重视,认为对那场外交斗争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第三篇《有关当前民族独立运动的几个问题》,是我1959年写的一篇调研报告,发表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上。这篇文章虽未经张闻天看过,却和他的思想有关,也就是立足于他与毛泽东对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不同看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就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胜利后所建立的也只能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有100多个民族国家独立,走的却并不是这条道路。除了越南、朝鲜、古巴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几乎全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的民族独立国家。虽然1958年9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巴西记者的谈话中对《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一点修正,但并未涉及上述根本论断,而只是改变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对外政策——“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

其他的道路”的看法,承认亚非拉许多民族主义国家“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的事实。其实,这倒是次要的小问题。重要的根本问题则是二战后百余国家的独立,用事实否定了毛泽东上述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只能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要论断。我写民族独立运动的文章,就是想用事实反驳《新民主主义论》中这一基本观点。1956年,张闻天确曾和我谈过,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崩溃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看法不准确。但这与我三年后写的文章并无直接关系。

除这三篇文章外,本书收入的其他文章,也都是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前写成的(此后十多年来我已偏重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和著述)。而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一些评论和看法可能很快过时。所以这些文章所反映的一些观点和估计发生错误,也可以看作是难免的。同时,人的思想认识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以前认为正确的,现在看起来却可能是谬误。反过来也是一样。例如,我们过去就一直有把日本的对外侵略看成和说成是日本的民族犯罪,而总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还强调他们只是“一小撮”)和支持并追随他们的广大群众严格区分开来。这就不如欧美人看德国。欧美人认为德国法西斯的胡作非为,既是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的罪行,也是整个德国民族的犯罪。何况直接侵略、蹂躏和掠夺各国人民的正是出身于德国工农和知识分子的纳粹官兵。由于德国人自己也认识到希特勒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属于民族犯罪,因此才有近乎全民的普遍反思;才有禁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活动的法制(如规定各级教育必须讲法西斯罪行,对公开推崇和膜拜法西斯战犯及仿效纳粹聚会和礼仪等活动的人要追究刑事责任等);才有战败后东部领土被割去一大片也一直没有再提领土问题;才有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时在华沙对死难者的下跪,等等。这都和日本形成了鲜明对照。为侵略战争辩护和尽量减轻罪责、对各邻国挑起领土问题、纵容参拜战犯和侵略战争参与者的亡魂等,越来越成为日本的官方政策和舆论主流,哪里还谈得上应有的民族负罪感!德国和日本对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持不同态度,根本原因也在于,战败后的德国是反法西斯力量取代了原来的纳粹统治;而日(下转第47页)

中国的“东方红”现象

○ 王西麟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关于苏联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专论,开篇却说的是艺术和音乐:“尽管我们不认同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她的诗歌和音乐是首屈一指的。”

在苏联的20世纪30~50年代,大量的个人崇拜的文学、戏剧、诗歌、电影、交响乐、大合唱、大歌剧、芭蕾、美术、雕塑等等,其数量之大、艺术水准之高,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现象。

我现在还保存有一些作品的总谱,其中有亚历山大洛夫的合唱“斯大林颂”。1953年斯大林死时,少年的我在一个黄昏的傍晚,在室外的昏暗中,听到室内手摇留声机播放这支曲子,我曾感动落泪。1963年我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职,能借到和苏联电台内部交流的音乐录音资料,其中有苏联阿塞拜疆作曲家加芝也夫的“第二交响乐——追忆列宁”,圆号演奏的那中亚风格的旋律,铿锵有力,深刻感人。就当时来说水平很高,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我国60年来所有的同类作品,其艺术水准难望其颈背。

但是苏联解体使这些歌功颂德的作品全成了过眼烟云。而在世界音乐史中,能留下来的,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又被后人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见证”的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作品,连他在高压下创作的、获得过1949年斯大林一等奖的歌功颂德之作“森林之歌”,也被历史淘汰了!

像苏联那样,将音乐如此大规模地服务于个人崇拜,讴歌权力,在世界音乐史上,可谓是史无前例。

在欧洲,除了歌颂上帝的音乐之外,从来还没有歌颂某一个国王或皇帝个人的交响乐或音乐作品,而不论该国王或该总统多么伟大。在古希腊罗马没有过“凯撒大帝大合唱”“亚历山大大帝颂”交响乐;在英国从来没有过“维多利亚女王颂”大合唱或“丘吉尔颂”的交响乐;在法国没有



毛泽东

过“路易十三/十四/十五颂”或“戴高乐颂”大合唱;在德国也没有“威廉国王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在1917年前的俄国,也没有“彼得大帝颂”、“尼古拉沙皇颂”等大合唱;即使是纳粹德国,也没有过“希特勒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

为政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写歌曲、写交响乐、写电影、写小说进行歌颂这一个人崇拜的文化现象,乃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产物。不过,在苏联成立的初期也还没有,只是到了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要确立个人的独裁统治时才出现,并在30~50年代兴旺起来的。

奇怪的是,苏联号称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却并没有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颂”、“恩格斯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而自称是他们的继承者和学生的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却拥有不少的歌剧、交响乐和多得数不清的歌曲、合唱。不过,斯大林死后的几届苏联国家领导人,

就再也从没有过他们的颂歌了！没有“赫鲁晓夫大合唱”，没有“勃列日涅夫进行曲”，没有“戈尔巴乔夫颂”的歌曲和交响乐。

苏联这一做法又为中国所模仿。不过，中国虽然一直有大量的御用文化，但从来没有“孙中山颂”交响乐，也没有“蒋介石颂”大合唱。唯有“东方红”作为毛泽东的个人颂歌，这是对苏联的个人崇拜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模仿和政治模仿。

“东方红”的原始面貌，今天已鲜为人知。它本来是一首活泼轻快的陕北民歌小调，而且被民俗学家划入情歌范畴之内，它的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还有更早的少为人知的原生态歌词《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人，呼儿嗨，哎呀我的三哥哥。”

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新歌词，是被署名为李有源的当地农民歌手填上的新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他是人民大救星。”它被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采集发现以来，是否又被修改拔高过，我们已不得而知了。

本来在民歌中，人民自发歌唱自己感念的人物和事件，是很正常的现象。如蒙古民歌“嘎达梅林”等，就是正常的文化现象。但是“东方红”却不同，从开始它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而绝不同于任何其他普通的民歌了。它是正好适应了1942年延安整风后毛泽东要求扩大和巩固其个人地位的政治要求。

歌词和音乐的被不断加工，和不断异化是同步进行的。自1949年后，“根据地文化”即“党的文化”被确立为全国的主流文化，这首歌就被作为领袖个人的颂歌而传遍全国，并具有某种和“国歌”相同并超过“国歌”的典礼性和仪式性的庄严神圣意义，早在“文革”前，很多大会和典礼的仪式就有“唱国歌、唱东方红”这道程序，自“文革”始，这道程序就约定俗成了。

其间，一批一批的音乐家们，把这首乡村的情歌小调，拔

高和改造成伟大领袖的庄严颂歌。但是这是有极大难度的，从哪里才能找到这样的音乐技术呢？那办法也只能是向苏联学。

但是苏联和中国有极大的不同。同为个人崇拜歌功颂德的作品，无论形形色色的歌曲、合唱、交响乐，其技术水准和专业水平与苏联相比，则相差悬殊。盖因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就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文明，有了强大的俄罗斯乐派和拉赫马尼诺夫等国际大师，在如此强大的古典音乐传统基础上的音乐水准，那些“斯大林颂”、“列宁颂”的交响乐、大合唱，其艺术水准之高，是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想不到的。

而在我国，“党的文化”的正式提出和建立，是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讲话”的延安，那时的延安和根据地还只有农业文明的大秧歌，而没有工业文明的交响乐，所以中国的“党的文化”的建立，只能由农业文明的“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起步，“东方红”自不例外。起自“东方红”的我国造神之作，经过1949年建国后的全国规范化，再到1958年的“大跃进”文化和浩如烟海的歌颂毛主席、歌颂“三面红旗”的新民歌，再由“文革”文化达到顶峰，50年来的这些音乐作品，总体说都是用农业文明的简陋的技术包装的“政治文化”。

由于1949年后的中国是向苏联一边倒，音乐家们学习和掌握这些主要来自苏联的音乐技术的时间还很短，水平还很幼稚，所以要把这首简朴而轻佻的情歌小调，改造成伟大领袖的颂歌，还很困难、吃力。那一次又一次改造的技术手法，就是把这首小歌的速度放慢再放慢、时值放大再放大、力度加强再加强、声部加多再加多，用管弦乐队配器色彩和大合唱的厚度浓涂重抹，力求拔高改变其原始面貌，结果成了强行拔高改造的音乐“四不像”，完全没有“斯大林颂”那样的艺术水准。

“东方红”从情歌到颂歌的这个加工过程，就是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过程，也背离了《国际歌》的“让思想冲破牢笼”。

我在“文革”中被关押的每天早晨，听到高音喇叭播放它时，都



李有源

感到我又要挨打挨批斗了而恐惧不已。多年后偶尔听到,仍不免心惊肉跳。在苏联,正是在响彻云霄的斯大林的颂歌声中,千百万人被杀害或冤死;而在我国,也正是“东方红”的颂歌声伴随着“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武斗打砸抢……

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三中全会前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才被提出反思,人们把它的歌词“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和《国际歌》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相比,对它的个人崇拜和封建感恩的造神意义提出过质疑和批评。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的吗?”1944年收集整理并传播它的主要是诗人公木,他在“文革”后也如此反思。

但是,个人崇拜的阴魂不散,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而消失。“四人帮”刚刚被打倒的1976年,马上就有了歌颂华国锋的“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并又唱遍全国。我国此类个人崇拜的颂歌,

有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特点,即被歌颂者个人籍贯的特殊意义。由于毛的湖南籍贯,1949年后他的颂歌,就有了许多是用湖南民歌,或湖南民间音乐,或湖南花鼓音乐的风格来写作或改编或演唱。无数的此类产品中,流传最广的,是当地民歌风格的《浏阳河》。此歌还曾被明确注明为湖南民歌。又因华国锋籍贯山西,他的颂歌就是晋中民歌风格的《交城的山交城的水》。

本来,对一切民间艺术的研究,的确是艺术家们的工作,民间艺术和民间音乐也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但是在中国,却不是像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和巴托克那样,从艺术和文化的学术意义出发深入研究,获得历史的和国际的意义,并为世界所尊重。在我国,民间音乐的推广,却是因政治原因甚至因领导人的籍贯而起作用,其独立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却并不受到决定性的关注。领导人一退出权力舞台,这些民间音乐独立的艺术意义也就消失或退色。■

(作者为北京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


(责任编辑 黄 钟)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 :010-84608877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从反右运动看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

○ 沙尚之

一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被称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它是建国后七年中影响最重大的一次政治运动。尽管已经过去55年，但这场运动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留下的深重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今天，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模式中不时可见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但在不同条件下内容与名称有了变化，对于不知道历史的人来说，还常以为它们是新的，因而重温历史很有必要。

纵观我国历年政治运动，每次的口号看上去都不相同，但达到的目的和基本方法是雷同的。这类政治运动共同的规律都是自上而下，从宣传看似重要的口号发动，以维护最高权力为目的。基本方法是通过“群众运动”对政治对手罗织罪名、揭发批斗，全面推开深化，加上“路线斗争”“阶级敌人”的帽子实现“全党全民”共诛，在迫使对手认罪后，写入决议并最后修改历史。

整个过程不需要法律程序，处理结案不需要审判、不公开真相、不允许辩护、有关档案归入“机密”。有关人的史实从此从官史中抹掉，不准再提及和质疑，否则就是“翻案”罪。因此，这些政治运动总是留下大量冤假错案，可以延绵几十年。

应当看到，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并非始于1957年，它可溯源到中国皇权统治的深厚历史文化土壤。但是它又决非纯粹出自中国，其中外来基因决不可忽视。中共建党初期在相当长时间内只是苏共一个附属支部，其指导思想与运作方式，完全受苏共的操纵。早在反右运动前的三十年，在莫斯科的苏共已经产生出这政治斗争模式。斯大林主义的反托洛茨基，反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分子，清党、肃反斗争的范式“启蒙”了幼年中共，使之学会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通过残酷无情的“路

线斗争”树立领袖绝对权威。

中共执政前，长期实践并发展了这种政治斗争模式。例如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路线，延安整风，“三整”“三查”运动等。建国后又有肃反、三反五反、反高饶联盟、潘扬案件等。反右运动以后，更有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等等，无一不是这种政治斗争模式的继承、变异和进化。通过“路线斗争”、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政治对手，遂成为治党治国的主要手段，反右运动便是其中一个典型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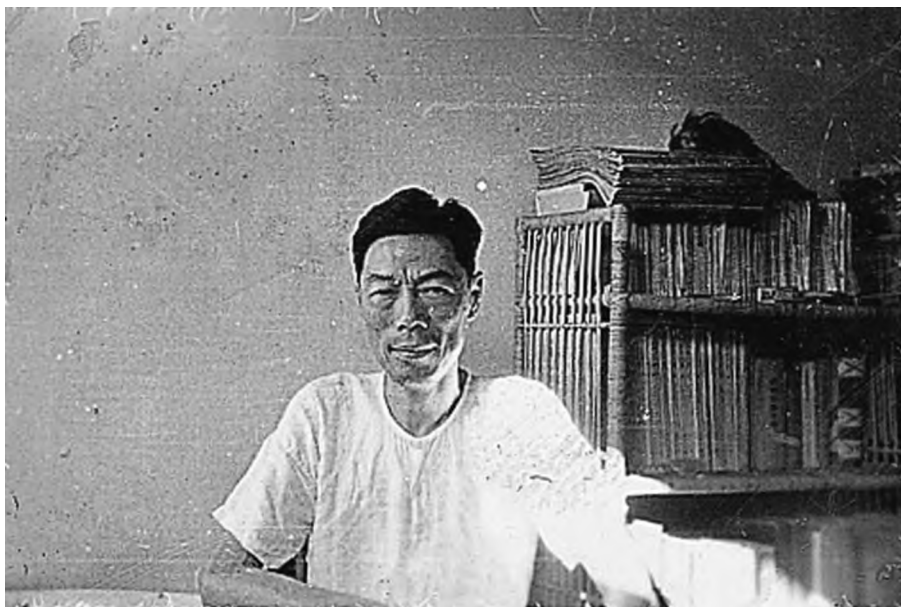
今天研究反右运动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政治斗争影响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通过对反右运动为代表的政治运动研究，有助于我们汲取教训，走出不良政治斗争误区，努力建设以宪政、法治为核心，尊重民权的现代化文明国家。

二

本文以1957年浙江省高层反右作为案例，探讨中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当时的国内与国际环境来看，反右斗争绝非偶然发生：建国以后毛泽东和中央迅速宣布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54年宪法正式确立了中共一党执政地位。通过实行对农业、手工业改造，合作化运动，取消了农民自由经营和土地所有权，1955年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通过公私合营剥夺了工商业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1956年苏共20大的召开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引发波兰、匈牙利事件，也震动了中国社会对斯大林的暴政和专政的思考。接着中共八大召开，提出主要矛盾问题，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全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民主。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1956年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活跃。但是毛泽东主席并不认同八大的一些论断，他始终认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主要矛盾，对国内出现的闹事、退社、

反个人崇拜等现象十分警觉，在1956年11月提出“第一要保护斯大林”，准备整风，思想改造。他指出“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够，还要有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怎样开展这场政治斗争？战术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诱敌办法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先大力宣传“双百方针”、开展党内整风、鼓动民主人士提意见等等。到一定火候通过发党内文件和社论，直接指挥发动全面反击战。



反右后在病中研究中国奴隶制度历史的沙文汉，1962年夏

在和平时期发动对内战争的方法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所谓“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群众运动”。敌人就是党内外一切怀抱民主、自由政治理想，敢于对专制政治和权威提出怀疑与否定的人，而这些人主要构成是知识分子。毛泽东首先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知识分子的前面冠上了“资产阶级”的定语，以确认其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反右斗争主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围进行”，“消灭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

这个运动很快从党外转向党内是必然的，中央领导人早在6月就说过“党内右派比党外更危险，不要姑息，不要轻信其检讨”。（陈修良浙江省委宣传部会议记录，1957年8月~10月）浙江省委党政班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右派案，成为全面打响全国性党内反右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957年秋冬发生的这场斗争中，浙江省撤销了包括省长（沙）、副省长（杨）、省检察长（彭）、财贸部长（孙）及省委常委、省人委委员11人职务并开除党籍；此外省部级、厅局长级党员干部被打成右派的还有：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陈修良、副部长兼文化局长黄源、工业厅副厅长张光、省高院副院长邬家箴等高级干部；省委宣传部所属新闻、出版、广

播、文化、新闻单位打出右派45名，撤销7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和50多名省人大代表的资格。在政府部门和政协任职的大批民主人士被打成右派，其中仅浙江省民盟就有27%的成员成为右派。

分析浙江省这场政治斗争，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政治运动的一般特点和过程的基本环节。如同其他重大政治运动，大体由几个主要步骤组成。

第一步有预谋和策划而非自发。

通常是按上层意图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斗争的对象，上下结合秘密进行。反右运动首选斗争对象是党内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原城市工作的地下党干部和被领导认为对自己有不满意见的干部、党员。

近年来，有关资料揭示，1949年上半年最高层内部还有一项对从事城市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处理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个秘密指示只下达到大军区司令，许多干部是不知道的。后人称之为“新十六字方针”，此方针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得到了完全体现与证实，其中反右运动就是一次重要体现。

浙江省长、省委常委沙文汉，入党三十年来长期从事上海等大城市文化、统战、策反等工作，因而与文化人、工商界人士交往密切。1955年潘汉年事件发生，尽管他与潘汉年以前并没有工作关系，却被省委书记在各种会议神秘地散布沙“有政治历史问题，需要审查”，称他为“浙江省第

二个潘汉年”。毛泽东多次到杭州，省委书记每次亲自接驾并严防省长与毛见面，对于沙文汉，最高领导早已心存芥蒂视作异类。

杨思一是浙东根据地的老资格领导人，解放初期因为工作关系与南下领导人意见不合发生过冲突，以及为当地干部不公待遇提出意见，从此不断受到历史审查和“地方主义”批评。沙、杨又都是浙江人，在省委一直被外来干部排斥和孤立。当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中央摸透最高领导急欲否定“八大”政治报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代之以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为主要矛盾的意图时，看准这个机会，适时推出沙、杨这两个准备已久的党内阶级斗争对象，完成了选择政治斗争对象这一步。毛泽东主席后来称赞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在南宁会议上他再次表扬上海的柯庆施，并称：上海对内部矛盾的讲法，有所发展，他们搞了两个月；浙江对此也有创造。

第二步是进行舆论准备，扫清外围，寻找突破。

1957年夏季，浙江省委多次传达最高领导关于反右意图的讲话。例如：主席说了“一篇文章就可以划右派”，主席说了“要抓大鲨鱼，对右派一看二帮不适用”，“这次整风在党内就是清党，但对下面不说”，“这次所有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尤其是某些老干部是过不去的”，他提示：（浙江）有人对民主人士宋云彬等“温情主义，这就是右倾……”。特别提出整风中要揭发资格老、职位高的人“不管头发有多白，资格有多老，都要揭发”。通过这些讲话引导党内向斗争目标集中。

按照战争习惯思维，为取得胜利，在战术上需先扫清外围然后中心突破。经过策划，浙江省党内反右运动的外围突破首选省文化部门。柯庆施8月从上海调来陈冰担任省委宣传部长领导这场斗争。原来的代理部长陈修良尚未受批前已被夺权，证明她早被内定为目标。除了她本人原因外，也由于她还是沙文汉的夫人。另一个突破口是省工业厅副厅长张光。因为他与杨思一是浙东同乡、老同事，又敢于多次向中央写信批评省委对杨思一的不公。陈和张被称为“反党急先锋”，是沙、杨的“哼哈二将”。

陈修良的主要罪名是：“反党”，这是因为1956年她在党代会上指名批评省委书记和新一届省委候选人作风粗暴；“否定阶级斗争”，是

因为她按照“八大”政治报告关于主要矛盾论述，修改了一篇称目前形势阶级斗争依然尖锐说法的文章；“反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她提出无产阶级不应一党专政，要有群众和多党监督；“反苏”，是因为她对斯大林肃反错杀有意见，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包庇资产阶级”，是因为她称知识分子有气节“士可杀，不可辱”等等。为了使火引到主要对象身上，“知情者”不惜造谣。沙文汉前秘书称陈修良1956年党代大会发言是沙文汉看过后支持的（实际上当时沙文汉在北京并不知情），这样陈是受到沙的指使，共同反党证据就成立了。扫除外围后，立即直捣中心目标。

第三步是抛材料，群众揭发，罗织罪名，形成决议。

通过自上而下群众揭发、大字报、大批判围攻政治斗争对象，这是中国政治斗争又一个特色。这种揭发先由几个忠实积极分子出面，抛出上面事先整理准备好的材料，提供不知情的群众作大批判的“弹药”，同时对运动揭发方向定下调子。沙文汉的罪名之一是包庇右派宋云彬。最早由全国人大代表（书记处书记的夫人）抛出材料，揭发一届四次全国人代会期间，作为省人大代表团团长的沙文汉对宋云彬、李士豪等民主人士右派，拒不执行省委多次电话要在北京会议中就地批斗的指示，甚至还对他们安慰“要沉住气”；此外，更有一些“知情人”揭发沙文汉的“资产阶级政权观点”，以主张“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来否定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沙文汉经常提倡团结知识分子，尊重民主人士，还曾明确要求党员应服从非党厅局长的领导；他还支持文化局演出昆剧“十五贯”等等，都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

杨思一的主要罪名是所谓“地方主义”，因为他长期在本地工作，解放以后一直包庇地方干部和民主人士李士豪，积极支持沙文汉资产阶级政权观点。除沙、杨外，“群众”还揭发了省委常委、检察长彭瑞林，他在一年前的党代会上批评过省委书记并与他发生公开争论，彭还同情沙、杨。孙章录是省委委员、省财贸部长，由于曾在大会上支持杨思一和彭瑞林，提名彭瑞林可以当省委书记。这就成为他在搞“非组织活动”的证明，两人因而都被打成右派，形成所谓“沙、杨、彭、孙”

反党右派案。省高院副院长邬家箴,因提出审判独立及对被告应先做无罪推定的意见,被批为“为反革命推脱罪责”,而打成右派,开除出党。很明显,反右运动就是要与此针锋相对:先定罪,而且不需独立审判!

表面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本质是为实现上层政治意图的“运动群众”,真正的指挥在幕后。从1957年8月到12月,浙江省连续召开党、政、人大、政协一系列会议,并且印发有几百份文件的“批判材料”,都是根据上面对被批斗对象的定调,人人进行表态与站队。

通过对各条战线大批右派的揭批,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作组织处理和打倒。

在这些密集的会议中,多数群众是演员,高层是编剧和导演。大幕拉开前夜,幕后主角之一的柯庆施先派人到浙江担任省委宣传部长,领导运动。11月柯再到杭州参加省委反右整风大会,他通过作关于阶级斗争、主要矛盾及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报告,指导浙江反右;同月,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和组织部长同到北京请示对沙、杨的组织处理问题,中央领导认为“沙、杨的性质最坏,还不如民主人士”,指示沙、杨、彭、孙都要划右派并要见报。

毛泽东12月8日从北京到杭州,到1958年1月停留了近一个月,而这正是浙江省二届二次党代会期间,并非巧合。12月13日省委正式通过沙、杨、彭、孙和黄源开除党籍处分的决议。毛要求华东其他省委书记也同到杭州开会,并指示17~18日两天学习、讨论省委的工作报告。他指出浙江问题带有全国性意义,要胡乔木修改报告后发表在《人民日报》并出了“社论”,通过浙江反右案证明毛泽东关于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论点正确,推翻“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并号令全国的反右运动从党外转向党内。

第四步是推广典型,全面铺开,重修历史,阻延平反。

在浙江省委反右案的示范下,全省各地、市、县以下干部党员,有类似沙文汉批评“以党代政”,缺乏“党内民主”观点者大批受到揭发打击。一些以前曾接受过沙文汉帮助、甚至因被他证明过历史没有问题的人也都受到牵连。浙江

更出现了对沙姓的“敏感反应”,许多沙姓亲戚同乡受牵连。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是书法家沙孟海所题,而他是沙文汉长兄,为避免联想和回忆,当局竟命令将落款铲除,留下一块空白多年,足见这个运动的株连之荒谬程度。

在浙江案例的示范与推动下,1958年全国许多省市相继发生党内清洗运动,例如省一级的就有安徽、山东、河南、云南、青海、甘肃、广东、辽宁、广西、新疆等,大批省级干部被整肃或划为右派,省级以下就更多了。

改写历史是中国政治斗争另一特色,一切都要围绕权力转,历史事实也不能幸免。从此,被打倒的人不能出现在正面历史中,有关历史叙事都要重新修订,被打倒对象的名字和事迹一律予以删除,这可使人们很快忘记过去,以至于三十多年后沙文汉的墓需要从杭州迁到宁波家乡时,浙江省委老干部局的干部在执行时竟不知道沙文汉是谁。

残酷的政治斗争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要纠正却是十分困难。浙江党内反右总共不过4个多月时间,但是“改正”要四分之一世纪(尚未包括平反和还原真相)。

仅举沙文汉案的改正为例。“四人帮”倒台后为防止翻案,当局在1977年9月9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永远指引浙江人民胜利前进》,它证实了20年前浙江的反右运动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省委的工作报告是在柯庆施帮助下写成的。1979年全国右派改正结束后,又折腾了三年,拖到1982年11月正式“改正”,1983年正式撤销1957年二届二次党代会决议,已经过26年。可知这种政治斗争是:戴帽打击,迅雷不及掩耳,平反纠错,百年不晚。

三

“政治思想社会主义大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回头看后果与影响深远。

首先是清除了大批党内外异见者,实现了思想与言论的垄断。这些人主要为知识分子和所谓“地方主义”分子。知识分子成为革命对象,噤若寒蝉。在党内,通过反右达到了清党、肃反目的。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到“反右就是肃反”。这次毛泽东特别提出“地方主义者实际就是右派,

江青夜闯西花厅

○ 武健华

江青擅自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等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议事”，她诬指护士赵柳恩要毒害她，命人摘掉她的领章、帽徽。周恩来板起面孔，面对江青说“你怎么能这样”

1972年3月5日晚7时许，江青擅自要秘书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汪东兴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到钓鱼台17楼“议事”，说出了大事情。

待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到达时，江青正在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面前大发雷霆，指责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毒害她。她要纪登奎找护士赵柳恩谈话，要赵柳恩坦白交代“后台”。

周总理刚进门就劝说：“江青同志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要激动。我们都来了，有事能讲清楚。”

江青专横地对周总理说：“不是我说，而是要

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反右运动第二个效果是，高度强化了政治极权和领袖独裁。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就是要党政不分。他说权力“只能集中到党委，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还编了一个口诀，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稍后的成都会议，讲到个人崇拜问题时他又称，“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这些讲话表明运动旨在维护领袖独裁。

反右运动第三个直接后果是，摧毁所有法律体系，以人治代替法治。对被指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罪的右派分子，无需法律依据与事实核实，以群众性围攻、批判对思想定罪，以

审判罪犯！我已经要纪登奎找赵柳恩交代罪行，交代同伙，还有她的‘后台’。”

从会议室里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哭泣声。

周总理对大家说：“先把情况搞清楚，我看先由汪东兴主任去找小赵谈谈，要她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

叶帅说：“我看也是，先由汪主任找小赵谈谈，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再‘审’也不迟。”

汪东兴表示：现在纪登奎正和小赵谈着，还是看他谈的结果如何？需要时我再去谈。

一会儿，纪登奎回到会议室，他对大家说：“小赵边哭边说，都是按常规准备的安眠药，没有犯什么罪。”

江青听后大叫起来：“这个小东西想要赖，要她坦白交代。”

周总理说：“还是由汪主任去谈好一些，要小赵冷静下来，认真地谈清事实。”

赵柳恩见到汪东兴，她满脸泪痕，伤心地说，

个人意志定罪。中央正式公布划右派的标准是在1957年10月15日。反右运动是先扣帽斗争，再套“标准”，所谓的罪名，执行起来可以有很大的随意性，充分反映了以政治运动定罪的非合法性和国家远离现代政治文明的程度。

反右运动后果远不止这些，仅以上后果在接着发生的大跃进、大饥荒、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得到淋漓尽致发挥来看，它向人们揭示的历史规律是：非良性的政治斗争造成的后果，决不会只限于政治本身，若不能制止，它就会给全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带来全面深重的灾难。中国的政治一定要从权力政治走向法治政治，从君权政治走上民权政治，离开这个基本方向是决计行不通的，以史为鉴的重要意义亦在于此。■

（作者单位为上海轻工业研究所）

（责任编辑 黄 钟）



1965年6月作者(后排右一)随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

汪主任,你还要我谈什么呀?刚才我已经向纪登奎同志都谈过了。

汪东兴劝小赵不要哭了,冷静下来,把这次用安眠药的经过,详细说说。

赵柳恩抽噎地对汪东兴说,江青同志用的安眠药是按医生的嘱咐准备的。每天睡觉前安眠药分三次服用:晚饭时服一次,临睡前服一次,万一睡不着再服备用药一次。昨晚她没有睡好,把备用药服了。她起床至中午饭后都没有事,到晚上快七点了,不知从何想起,说有人要毒害她。不一会儿,就说我毒害她。还说有“后台”支持,大发脾气。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汪东兴听完小赵的话,没有多问,回到会议室,向周总理等人把小赵的话如实汇报了。

江青立时跳了起来:“小赵不老实,想逃避罪责,不要再谈了,马上进行审问。”

周总理说:“还是用集体谈话的方式好。”

江青指着赵柳恩等尖叫起来:“他们三人(指秘书杨银禄、警卫周金铭)串通起来毒害我,对犯罪的人应当审问,不叫谈话。”

叶剑英说:“今晚在座的是七位政治局委员,还是谈话妥当,首先让他们讲清情况。”

汪东兴表示:“同意周总理、叶帅的意见,不能用审问的说法,还是集体谈话为宜。”

纪登奎也说:“用谈话的方式吧。”

张春桥、姚文元也附和着说,同意用谈话方式。

江青无奈,又出了个主意:你们都一致要谈

话,那就要赵柳恩、杨银禄、周金铭站在我们的对面答话。

该是周总理服药的时间了,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请服务员进会议室送开水的时候,顺便把药带进去。不料服务员异乎寻常地说:“我要去准备夜餐,你自己送进去吧!”

张佐良不得已,只好自己轻轻地开门进去,手里举着小药瓶。他想让江青看看我是来给总理送药的医生,免得她见了不太熟悉的

人又生出什么事端来。

当张佐良走近会议桌时,江青阴沉着脸装腔拿调地问:“你不是跟总理来的张大夫吗?”张佐良回答:“是的。”“正好,你是个医生,懂得安眠药,你就坐在这儿听听吧。”

江青既然这么说了,你就别想从她眼前溜掉。张医生只好赶紧把药递给总理服下,在后排找了个位子坐下。他心情惶恐地如坐针毡,不一会,冷汗就把内衣湿透了。

周总理吃完了药,谈话开始,总理用手指着对面的椅子说,你们坐下来,不要紧张,主要说说“出事”的经过。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警卫周金铭、护士赵柳恩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许久,会议室里一阵冷场。

江青按捺不住,又厉声喝叫起来:“你们要坦白交代罪行,交代你们怎么合伙毒害我!谁是你们的‘后台’?坦白从宽,不坦白从严处理!”

周总理对江青说,你冷静些,还是让他们三人先说。

赵柳恩说,刚才纪政委和汪主任同我个别谈过了,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根本没有想毒害谁。

“你说,谁叫你给我多服一次剂量大的毒药?你们三人事先商量过没有?”江青紧追不放。

赵柳恩这时抬起了头,以抗争的口吻激愤地说:“我没有毒害你,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我每次都多准备一次药,怕你万一睡不着,可以再服一次。而且每次的剂量都一样。我也没有同杨

银禄、周金铭商量过。”

江青见赵柳恩敢顶撞她，拍着茶几就跳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向门外使劲地吼叫：“来人哪！”

从门外进来一名军人，站在一旁。

江青命令军人：“你把她的领章、帽徽给我摘下来！”

“住手！”就在这一瞬间，早已不耐烦的周恩来大声喝住了军人的行动，挥手指使他退出去，并对张医生说：“这里没有你的事，快出去！”这时，总理也站起身来，板起面孔，朝坐在他右侧的江青厉声地说：“江青同志，你不要这样激动嘛！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这样！”平常，周总理总会给江青几分面子的，今天的情形不同，江青的言行太过分了，看样子，总理已忍无可忍了。

沉静了一会儿，周总理又说，杨银禄、周金铭，你们两个讲一讲。

杨银禄平心静气地说，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工作上有缺点我负责任，但绝没有商量毒害江青同志的事，请组织上调查清楚。

周金铭也争辩地说，我是组织上派来的警卫人员，负有保卫江青同志安全的责任，哪能商量毒害江青同志，这是绝对没有的事，请领导查明。

江青仍不甘罢休：你们不交代罪行，反而说是保卫我的，没有商量毒害我，那么，安眠药是谁放进来的？看来你们是不敢交代“后台”，送公安部审问。

周总理见事实已很明朗，随说，时间不早了，已经十二点多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让他们回去想一想。

江青说：“不行！要叫他们作检讨！”接着，江青又转换话题，更加无理地向总理提出要求。她说，为什么总理那里的大夫、护士都那么好，为什么不给我派好的？又说小许（指总理的护士许奉生）就很好。

江青点名要总理的护士许奉生到她身边工作。小许哭了：“不去！不干！”高振普打电话告诉她：“总理在等你。”许奉生进见

江青后出来边笑边说：“她不要我了，说我的手那么凉，一拉手吓了她一跳”

能迁就的问题，周总理总是让她几分。总理离开会议室，走进电话间。卫士高振普跟在身边。总理问：“小许在哪里？”高振普答：“她在西花厅。”总理指使高振普：“是江青同志要找小许，你马上把小许接来。”说完他又进了会议室。

许奉生接到高振普的电话，很紧张地问他：“总理怎么了？”高振普说：“总理没什么。”“那你半夜里来电话干什么？”“有人看上你了，要你到她那里工作。”这不指名的“她”，小许已知道是指江青，但她未在意，认为是高振普同她开玩笑。当高振普说：“我真的不是开玩笑，是总理要我打电话叫你的，车子快到了，你马上来吧。”她这才断定是真的，她马上哭了，从电话里传来了“不去、不干！”的声音。高振普说：“那怎么行呢，你先来吧！总理在这里等着呢。”

约十多分钟，小许来到钓鱼台17号楼，只见她手里提个小包，低着头，进了楼。高振普看到她的眼圈已哭红了，顿时紧张起来，这怎么行呢？他给小许出了个主意：先到洗手间用冷水洗把脸，然后再进去。

高振普拉开会议室的门送她进了会场，随手轻轻地关上门，仍退守在外面。约两三分钟后，



江青初次接见维特克(右)

会议室的门开了,是小许。她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高振普走过去问她:“怎么啦?”她边笑边说:“她不要我了,说我太紧张,手那么凉,一拉手吓了她一跳。”高振普说:“那你快走。”小许飞快地上了汽车回西花厅了。

真没想到,凉水洗脸,除掩饰了小许那不快的表情,还免除了以后的不幸。

江青:“叶剑英不能走! 还有颐和园军代表的问题。”叶帅:“又出新招”

周总理再一次说:“今天可以散了,叶剑英同志该休息了。”

江青又出题目:“叶剑英不能走! 还有颐和园军代表的问题。他们不可靠,要把他们抓起来。”又说,这个房间空气不好了,换到礼堂东会议室继续开。

七个人先后向东会议室走去。叶剑英、江东兴走在最后。叶帅说:“又出新招!”汪东兴说:“情况不明,不好说话。”叶帅说:“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无法表态。”

进入东会议室,六个人坐在一张长形会议桌旁,准备听江青讲什么颐和园问题。

江青坐在另一张小四方桌旁,桌上摆着为她准备的夜餐。

服务员进来报告总理,说夜餐准备好了。总理吩咐送进来。每人一碗挂面,一盘小菜。只有叶帅不吃。总理问叶帅:“已经凌晨一点多了,还不饿吗?”叶帅说:“不饿,就是想睡觉。”

江青边吃边对叶帅说:“你要休息,把问题解决,可以先走。”

接着她说了所谓“颐和园军代表问题”:前几天,我到颐和园走走,园内的军代表对我进行刁难,限制老娘的行动。我看他们不像军代表,像便衣侦探。要把这些所谓军代表请出去,有的要抓起来。

叶帅说:“我对情况还不了解,待我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说吧。”

总理一听又是这样无中生有、莫名其妙的事情,随口说:“这件事情让有关单位调查处理吧。今天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

叶帅:今晚我们顶过去了,但她还会无事生非。我们应该把今天发生的事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说:“你们要顶得住,不管她施加多大压力,权就是不能交”

散会以后,当走到17楼东门口时,叶帅叫住周总理和汪东兴,进入走廊南侧的一个房间。叶帅说,今天我们又中江青的计了,但我们没上她的圈套。她的矛头是对着汪主任和我的。她诬陷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又诬陷颐和园的军代表。今晚我们顶过去了,但她还会无事生非。我们应该把今天发生的事向毛主席汇报。

周总理说,事情来得突然,我们没有精神准备,但也没有匆忙表态。向主席讲讲是必要的。我看这件事就由汪主任去报告吧!

汪东兴说,找个机会,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好,我一个人怕说不完全。

几天后,周总理陪同主席接见外宾,汪东兴在外屋。周总理问谈了没有。汪东兴说没有谈。如果主席今天精神好,我们一起跟主席谈。结果,周总理陪外宾回钓鱼台继续谈判,又没谈成。

过了几天,汪东兴见毛主席饭后精神很好,就向主席报告了这件事。

毛主席听完后说:“江青通过整身边的人员,向中央施展她的威风。她其实是指桑骂槐,变着法向总理、剑英和你们要权。你们识破她的用心,顶得好。”

主席又说:“你们要顶得住,不管她施加多大压力,权就是不能交。”

毛主席的鲜明态度和重要指示,汪东兴报告了周总理和叶帅,他们认为这有利于以后与江青一伙的较量。

1973年6月11日深夜,江青一伙事先不打招呼,就直闯周总理的住地——中南海西花厅。江青诬称:她身边有坏人,要把秘书杨银禄、警卫周金铭抓起来。汪东兴说,人不能抓,你不想用他们,我可以把人带回去

1973年6月11日晚,江青在她住地钓鱼台11号楼,看外国电影《红与黑》。这天,经常陪她看电影的康生未来。江青让警卫周金铭给张春

桥、姚文元打电话,请他们来看电影。张、姚的秘书接过电后,很久也不见张、姚到来。江青发起火来,要小周再给张春桥打电话。张春桥的秘书回答“首长看过了,不来了”。

江青悻悻地只好独自一个人看。影片演到一半,她忽然很生气地站了起来,乘车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居住的钓鱼台9号楼。

江青在楼内与张春桥、姚文元一直谈到深夜一点多钟,才与张春桥、姚文元走出楼门。

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警卫员,在事先根本不招呼的情况下,就直闯周恩来总理的住地中南海西花厅。

这时,周总理还没有入睡。

江青一进门,就对总理说:“我身边有坏人。杨银禄、周金铭都是坏人!他们是汪东兴的人!”江青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周总理把他们让进客厅,没有说什么话,嘱咐他的身边警卫张树迎招待他们,并示意张树迎不要告诉江青说他出去了。

周总理乘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住处。

汪东兴刚结束手头的工作,服了安眠药,下楼准备睡觉。值班秘书孙守明来告诉他:“总理来了。”

汪东兴赶紧回到办公室见总理。

“他们现在到西花厅去了。”总理第一句话这么说。

汪东兴问总理:“出了什么事?”

总理说:“江青说她的秘书和警卫员都是坏人,要抓起来。”

汪东兴对总理说:“又是江青在捣乱。在总理的办公室能抓人吗?有什么罪状?怎么可以随便抓人?这些人归我管,她不用,我可以把人带回。”

总理说:“你去,我来说,你来处理好不好?”

汪东兴上了总理的车,和他一起回到了西花厅。

江青见总理和汪东兴一起走进客厅,大声说:“哦,原来总理去搬兵了啊!”

周总理对他们说:“这件事情我不能处理,安



1996年作者(左)拜访老领导汪东兴

全、人事都由中央办公厅主管,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汪主任反映。”

江青大声说:“我的秘书、警卫员都是坏人,要抓起来!他们要害我,用安眠药害我。杨银禄成心气我,我的事他压在那里不办!”

张春桥、姚文元表情严肃地坐在那里,听任江青吵闹。

江青站起来继续吼叫:“非把他们抓起来不可!”等到江青叫嚷得差不多了,汪东兴严肃地表示:“不能随便抓人!”

江青怒目相视地对汪东兴:“你要怎么处理?”汪东兴说:“根据事实处理。这些人当时推荐到你那里工作,都是从机关部队选调的优秀干部。现在你不想用他们,我马上可以把他们带回去。”

江青说:“请总理再选派一个人保卫我。”

周总理说:“还是由汪主任选派吧。”

汪东兴说:“我那里没有合适的人,派不出来。”说着,汪东兴转身走出客厅。出了西花厅,他就叫上周金铭上他的汽车,两人一起回中南海南楼。

凌晨三点多钟,江青一伙继续纠缠,不肯离开西花厅。

江青处的工作人员,都自动回拢到汪东兴身边,七嘴八舌地说:在江青这里,我们没法工作,大家都干不下去了

在回南楼的路上,汪东兴问小周:“人家要把

你抓起来，什么事呀？”

小周还没有说话，就哭泣起来。他流着眼泪叙述了江青要他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看电影的事。他无论如何想不通，他在江青身边担任警卫工作多年，一直是兢兢业业地执行着警卫任务，想不到为什么江青竟然要抓他。

到了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安慰周金铭：“你不要哭了，先在我的办公室休息，等我去钓鱼台安排一下，待接回杨银禄，一起再谈。”

小周一脸诧异：“还有杨银禄的事吗？”

汪东兴一面向外走一面说：“人家要抓你们两个人呀！”

汪东兴驱车来到钓鱼台11号楼。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因江青还未回来，都仍然在那里。

汪东兴先同杨银禄谈话，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告诉了他。他一听就火了，话没说出来，也委屈地哭起来了。汪安慰了他。

正当这时，江青处的工作人员都自动回拢到汪东兴身边。他们每个人都很紧张，也很气愤。

他们七嘴八舌对汪东兴说：在江青这里，我们没法工作。请你另外派人，我们不干了！

厨师程汝明很激动，他说：“江青这个人，不配作我们党的高级干部！”

护士赵柳恩说：她不是好人，她是个野心家。

这些和江青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此刻毫无顾忌，倾诉他们长期积压在内心的愤懑。

汪东兴着眼大局，再三劝慰这些工作人员，好不容易他们才平静下来。

清晨六点半，汪东兴和杨银禄同车离开钓鱼台11号楼，回到中南海。汪东兴立即给周总理打电话，向他报告这件事处理的情况。

上午九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告知汪东兴：“他们（指江青一伙）已经回去了。”

七个多小时过去了，周总理一直陪着坐在西花厅不肯走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他们折腾得整整一夜不得休息。

其实，江青他们明明知道，此时的周恩来，已是做完膀胱肿瘤手术（1973年3月10日）才三个月的危重病人。

毛主席说：“我要是总理，就应该拿扁担把江

青打出去！”“这是逼宫，跑到总理府逼宫！”“江青有多大能耐，随便就抓人，无法无天！”“她不需要警卫人员，不要再给她派人了”

汪东兴接完总理的电话，他怎么也睡不着。中午，他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还在休息，他一直坐在外面等到下午两点多。

汪东兴把夜里发生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我要是总理，就应该拿扁担把江青打出去！”

汪东兴说：“那还有两个呢？”

“还有哪两个？”主席问。

“张春桥、姚文元。”

“这还了得！这是逼宫，跑到总理府逼宫。”

主席看汪东兴一时没有答话，又解释说：“逼宫，就是要总理交权。”

汪东兴点了点头，表示听懂了。

“江青有多大能耐？随便就抓人，无法无天！”

主席沉着脸，接着说。

他又问：那两个工作人员你打算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现在正在睡觉，准备先让他们回团部。过几天，我再同他们谈谈。我打算先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去五七干校锻炼一阵再回来分配工作。看主席还有什么意见？

主席说：“我看这个办法好，江青那里不用再给她派人，她不需要警卫员。”

几天后，江青打电话给汪东兴说：“汪主任，不派警卫员不行啊！我出门没有警卫人员保卫怎么能行呢？”

“现在没有人啊，找不到人。我这里的人都不合适。”汪东兴拒绝了她。

“你不要这样，你的态度不好。”江青又有点儿火气。

汪东兴说：“我态度不错，就是眼睛不好，识别不了谁是坏人，谁是好人。”

江青无可奈何，转而又问：“我那两个人你怎样处理的？”

汪东兴回敬她：“照主席说的办。这个你就不用劳神了。”■

（作者为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现已离休）

（责任编辑 黄 钟）

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

○ 智效民

山西兴县蔡家崖的牛家大院，在1940到1949年之间，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如今这里是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承担着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功能。但是，当一个个参观者来到这里接受教育的时候，却很难想象这个大院在1947年土改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父亲被儿子牵着“牛鼻子”挨斗的惨案。这位儿子，就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牛荫冠；这位父亲，则是牛家大院的主人、曾对革命有过巨大贡献的开明绅士牛友兰。

一、名校出身的牛氏父子

牛友兰，1885年出生于山西兴县蔡家崖村。牛友兰的父辈开始发达，成为兴县首富。辛亥革命以后，兴县因远离政治中心，牛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到了抗日战争前夕，牛家仍然拥有五座宅院、一所花园和两千多垧土地。此外，他们还在县城里开了“复庆永”、“福兴永”等商号。

牛友兰在家排行第五，从小备受宠爱。190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京师大学堂。1909年，牛友兰因病辍学回家，随后便结婚生子。牛荫冠是其长子。

牛友兰从北京返回家乡的时候，正值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之际。为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他投身于教育事业，与老同学刘少白一道创办了兴县第二高级小学和兴县中学。为了破除迷信，他曾经捣毁庙里神像。不久他的父母因病去世，因此讲迷信的人说这是神灵的惩罚。后来，他又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是当地颇有影响的开明绅士。

牛荫冠长大后，先在父亲创办的学校读书，后来考入太原最好的学校——进山中学，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当时能够考入清华

大学、特别是考入清华工学院者，在全国的青年才俊中可谓凤毛麟角。1932年清华大学录取的山西籍学生只有4人，而牛荫冠就是其中的一位。如果牛荫冠能够安心读书的话，应该是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电机专家。

二、投身于革命的牛荫冠

入学以后，牛荫冠很快就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他感到难以应付繁重的学习任务，决定转到经济系就读。对于这件事，他后来是这样讲的：“我在生活道路的十字路口开始思考起来，差不多经过两个多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彻底认识到了改造社会乃是当时的第一重任。于是我抛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置个人成名于不顾，毅然弃工从文，转到了经济系学习。”（《牛荫冠纪念集》，第93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

1935年，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因“社联”不易开展工作，决定集体转入由宋庆龄发起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秋，牛荫冠又参加了北平学生赈济联合会组织的赴山东赈灾活动。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于是，北平学生赈济联合会又改组为北平学联，牛荫冠也投入“一二·九”运动。在这场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中，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随后，牛荫冠担任了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组织委员，不久，他接替蒋南翔担任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1936年暑假期间，山西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搞得轰轰烈烈。中共中央北方局利用阎锡山愿意用本地人的心理，派遣薄一波返回山西，与阎锡山“共商保晋大业”。年底，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安子文想派牛荫冠回山西协助薄一波工作。当时牛荫冠还没有毕业，安子文问

他：“你在清华学习差半年就要毕业，拿不到文凭怎么办？”牛荫冠说：“我拿不到文凭没关系，挽救民族危亡重要，为解放全人类，党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同上，第16页）

牛荫冠回到山西后，为了避嫌，他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先到太原绥靖公署找到清华同学牛佩琮，再通过对方介绍来到牺盟总会，负责太原市牺盟会的筹备工作。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少奇到太原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此期间，他起草了一份《山西农会章程》，让人交给牛荫冠，希望在牺盟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以便扩大影响。对于这件事情，牛荫冠在1985年回忆说，当时他在刘少奇的原稿上加了一句话：“防止流氓混入农会”。刘少奇看了后，对北方局的人说：“找牛荫冠来，我跟他谈谈！”牛见到刘少奇以后，刘责问他：“你知道什么叫流氓？”他一听口气不对，便低声说：“我也不清楚，反正不是好人吧。”刘少奇看他态度还不错，便对他说：“你这里说的流氓，是一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们拦在外头呀！”（同上，第296~297页）后来晋绥土改中出现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卢沟桥事变后，薄一波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掌握枪杆子方面。于是，他建议阎锡山组建决死队、工卫队、政卫队等武装（统称“新军”），以弥补正规军队（晋绥军）之不足。与此同时，在薄一波的推荐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意牛荫冠负责牺盟会日常工作。1937年9月底，在牛荫冠的主持下，牺盟会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牛代表牺盟总会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并当选为牺盟会七常委之一。这七人除了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以外，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从此，牛荫冠成为牺盟总会的实际负责人。

在牛荫冠的主持下，牺盟会发展很快。据统计，到1939年5月，其成员达到89万人。在太原失守之前，阎锡山还发给牺盟会5000支步枪，200支冲锋枪，牛荫冠把这些枪支分发给各县牺盟会，让他们马上成立地方武装。

1939年下半年，山西新军和晋绥军之间的摩擦日益严重。12月初，发生“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

三、牛友兰毁家纾难

1939年12月9日“晋西事变”前夕，牛荫冠把新婚妻子送回晋西北老家，准备随时离开阎锡山阵营。不久，阎锡山派牛荫冠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代表的名义去河南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牛荫冠认为这是阎锡山的借刀杀人计，于是他在离开驻地之后，便向延安方向奔去。到达陕北绥德之后，他又在王震、滕代远的安排下转赴晋西北，回到老家兴县。1940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他担任了行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兼党组书记。

就在牛荫冠返回家乡之前，牺盟会在兴县已经非常活跃。他的父亲牛友兰为了支持县牺盟会的工作，决定每月赠送100元大洋为其活动经费。贺龙率120师到达晋西北以后，牛友兰听说八路军没有棉衣，还急需一批资金和粮食，便带头捐献2.3万元大洋、150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这些大洋成为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的主要基金（银行基金为3万元），所捐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18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

牛荫冠回到家乡以后，由于军政人员骤然增多，地方财政不堪重负。于是，牛友兰又在1940年3月主动拿出3万元（法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牛友兰先生传略”中还有这样的记录：1941年，边区政府“采取过激措施征集粮、款。牛友兰先生虽然处境也很困难，但能为政府排忧解难，再大困难也在所不惜，他表示：‘不惜牺牲一切，追随全区同胞在政府领导下，共图复兴民族国家，各种抗日负担提前办理，绝不人后。’边区政府在全区开展扩兵、献粮、献金、做军鞋的‘四大动员’中，牛友兰先生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支援抗战。”（同上，第18~19页）如此数额的个人捐献，不仅在当地绝无仅有，在中共历史上似乎也不多见。

为了解决战争造成的物资紧缺状况，牛友兰早在1937年就受牺盟会县长张干丞的委托，筹

款1万元,办起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和兴县纺织厂(后改为晋西北纺织厂),解决了部队和机关的被服供应。当时工人干活属于抗日救亡活动,没有报酬,许多人不愿参加,于是牛友兰就动员自己的家属和亲戚到工厂劳动。1941年,行署以牛友兰先生年事已高为由,派人接替他所担任的纺织厂厂长职务,工厂产权、产品、利润也归政府所有,牛友兰离开工厂时没有索要筹建资金和任何财物。此外,他还鼓励牛家许多人参加革命,侄女牛荫英、牛荫蝉因此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同上,第19~20页)

1942年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等人的热情接待。回来后他在《抗战日报》上撰文介绍此行印象时,把延安比为“创建新中国的试验场”,把毛泽东誉为“场内的一位伟大的工程师”。他说:“延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从延安看到了中国的未来,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抗战胜利后,牛友兰除了写过《议会的新旧对比》《痛悼“四八”死难烈士》等诗文外,还不断发表斥责国民党政权的言论。(同上,第151~158页)

从许多材料可以看出,为了革命,为了抗战,牛友兰几乎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身无一文了。1941年4月2日《抗战日报》刊登一篇记者采访,说牛友兰从1942年开始,就离开蔡家崖“住在×村一个破落的院子里”(《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159页)。《兴县文史资料》第六辑有一篇文章说:“1940年2月,晋西北行署民政处公布《减租减息办法》后,牛友兰将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账等契约账簿一并销毁,减轻了兴县人民的负担”(同上,第84页)。但是,到了土改运动的时候,他仍然是在劫难逃,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

四、土改运动再掀高潮

晋绥地区的土改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时就开始了。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土地问题的解决不能拖延太久,否则就会对耕作和收获产生极为不利的影 响。晋西北地区本来就是高寒地区,无霜期很短,土地又非常贫瘠,再加上包括政府机关、军队及其家属在内的非生产人员基

数太大,对当地的粮食供应形成很大压力,这就更要求不能因为土改而影响正常的耕作。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当地的土改运动在持续了一年多以后,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更加激烈。在此期间,刘少奇率新成立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来到晋绥,在听了康生等人的汇报以后,对晋绥地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基本上否定了这里的土改工作。

刘少奇在写给贺龙、李井泉和张稼夫的信中说:“我们的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根据群众的自觉与主动去指导群众运动,是你们这里许多群众运动失败的原因。此外,在各种组织中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的有意的阻碍与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35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此外,他还与同行的朱德打电报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解决,只有少数地区农民已分得土地。农民生活很穷困,生产降低及破产现象,到处可见。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改善现状,确难继续支持长期战争。”为此,他提出“准备由晋绥分局召开一次干部会议,对晋绥地区所存在问题进行检查,并从党政军民各机构中抽调最可靠的干部组织工作团,到农村中去帮助农民建立贫农小组,建立村、区、县及边区的农会组织系统,依靠农会组织和工作团去彻底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刘少奇年谱》下卷,第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这样一来,晋绥地区前一阶段的土改工作就只好推倒重来。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指示,大家只能是等待观望。到了1947年9月24日,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以后,晋绥边区才积极行动起来。首先是农会临时委员会根据会议精神,在《晋绥日报》上发表了《告农民书》。该文件号召全体边区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团结起来,为实行下列主张而斗争:第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第二,要彻底平分土地,要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第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于是,当地的土改运动再一次掀起高潮。

为了展现当时的语境、气氛和相关情况,不妨将《告农民书》开始部分照录如下:

农民兄弟姐妹们!

咱们农民彻底翻身的日子来到了!

共产党在去年发了个“五四”指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批准咱们农民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要求。现在,共产党又发出号召,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政策,咱们全边区农民坚决拥护。本会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和边区农民的要求,提出以下的主张,希望我全边区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大家一致团结起来,为彻底实行下列主张而斗争。

第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

一、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二、富农,和对地主不同,但是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三、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四、中农是咱们的基本群众。中农当中,有的有长余的土地,不能算是封建部分,但是为了帮助其他农民翻身,长余的土地,应当抽出来分。但只能抽出长余的土地,不能动他别的财物。在政治上,允许他参加农会,同样享受农会会员的权利。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城市贫农,他们互相间的借、请短工等等,不能算是封建剥削。如果他们当中有借贷纠纷,可以在农民一家人会议上调解解决。

五、雇农、贫农,是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最坚决

的分子。应当以他们为骨干,团结全体中农、工人、小商小贩、城市贫农,和地主阶级作斗争。雇农贫农当中,有些人虽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的帽子。旧社会看不起穷人的观点应当取消。

六、为了便于大家诉苦清算统一分配,我们主张以行政村为单位,甚至好些村庄联合,全区全县联合,进行联合斗争。少数人为了私分斗争果实,包办斗争,不让大多数人参加,应当反对。为了本村、本族、本姓人多分斗争果实,不和外村、外族、外姓人联合斗争的氏族观念,也应当反对。

七、怎样斗争?我们主张:要查阶级,评成份,吐苦水,挖穷根,彻底宣布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以便提高全体农民的阶级觉悟,以便彻底把地主阶级打垮。

八、彻底打垮地主阶级以后,各地农民应当继续监视地主和其他坏分子的活动。严防地主和其他坏分子使用美人计和别的方法破坏、捣乱。我们主张,农民、退伍军人、公家人,暂时不要和地主女人结婚。已经受了地主利用,和地主女人结了婚的,也应当对群众表明态度。如果妨碍彻底平分土地,大家应当督促他宣布离婚。如果他不听,由群众处罚。

九、不管什么人,应当严格禁止包庇地主,替地主隐藏财产,或私得地主财产。农民如果被地主利用,隐藏地主财产,或私得地主财产,如果他觉得自己这是罪恶,自动向群众报告,拿了出来,应当受到鼓励,如果他不自觉,就由群众劝说,教育说服,启发他觉悟,退了出来,将功折罪,如果他顽固不听劝说,由群众处理。外村地主隐藏财物在本村查出后,一律交回外村处理。

十、在还没有斗争以前,地主、恶霸、反动分子、敌伪爪牙等,在准备逃跑或分散隐藏财产,当地农民群众可以把他先扣押起来,必要时并封存他的财产。(以下从略)

《告农民书》共分三部分。第二部分的标题是:“要彻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第三部分的标题是“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其中提到“党、政、军、民和其他一切机关都混进了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新恶霸、奸伪人员”,因此“共产党号召咱们,要彻底发扬民主,审查干部,无论党、

政、军、民，以及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的商店，和其他一切机关团体，咱们全体农民都有权监督和改造。”《告农民书》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各级干部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五、蔡家崖“斗牛大会”

就在《晋绥日报》发表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的第二天，即1947年9月25日，该报第一版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李井泉于9月18日在蔡家崖行政村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据报道，李是列席旁听这个大会的，当农民们鼓掌邀请他讲话时，他很兴奋地站在主席台前，向在场的群众大声说：“农民大会开得很好，你们这里开，别的村子也要开。全边区都要开，彻底平均分配土地，是大家的事情，大家的事情大家管，大家发表意见，大家讨论决定，大家来办。”

紧接着，他向大家明确指出：“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到（倒）地主阶级……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压迫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因为牛荫冠四二年问他拿出契约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

李井泉告诉大家：过去天天说老百姓翻身，但是因为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翻了身的只是少数人，“所以共产党毛主席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意见”。他还说，在干部队伍中，有许多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今后老百姓要管干部，群众要撤干部的职就撤，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

同一天，《晋绥日报》在第二版发表通讯，报道了蔡家崖农民大会的“盛况”。“会场上布置有地主阶级用农民的血汗所制成的绫罗绸缎衣物及生了锈的四五千白洋和金镯等展览品，正面高悬着毛主席、朱德司令、贺司令员的巨像，旁边一条标语上写着‘农民组织起来，彻底平分土地’，

极引人注目。”据说参加大会的有蔡家崖行政村所属的17个自然村的500多人，大家一致同意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

为了突出重点，该报还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题，报道了牛荫冠在现场的表现：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有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稳。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楞子贫农郭增玉、刘宝则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的控诉。

贫农刘宝则并质问牛荫冠说：“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但银钱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

随后，蔡家崖召开了“斗牛大会”。关于“斗牛大会”的具体情况，我没有找到详细报道和现场记录，但是官方、学界和民间，却一直有许多版本在流传。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馆长贺巨明说：“1947年秋，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晋绥土改工作出现了严重‘左’的倾向，导致了牛友兰等一批曾与我党真诚合作、作出不少贡献、并一直拥护党的事业的开明士绅无辜被斗。蔡家崖村当年参加过‘斗牛大会’的白栋则老人回忆说：‘会场上主要是要底财，没谁能说出牛友兰干过什么坏事，没人恨他，斗争会不好开。突然跳出一个临时来的叫王明友的保德县人，从妇女头上拔下一根发簪，穿插在牛友兰的鼻孔梁上，拴上绳子，逼着他儿子牛荫冠拉着斗，也没离开会场。很快会场发生混乱，斗争会也就散了。会后，牛友兰被关在禁闭窑里，没多天就听说死了。’”（《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48页）

历史学家赵俪生在回忆徐中舒先生时，也顺便提到这件事。他说：“我的老同学牛荫冠（此人解放后担任过几个省的财政厅长，还当过财政部副部长）家是山西兴县最大的富户，土改时，牛是

土改组的组长,坐在上边,他的父亲跪在下边。游街时用铁丝像穿牛鼻一样穿了他父亲的鼻子,由牛荫冠牵着。据说这件事后来被‘上边’知道了,可‘上边’并不欣赏,据说还下了一道什么‘文’。”(《篱槿堂自叙》第157~1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这大约代表了学界的意见。

看来,牛友兰的鼻子究竟是象征性地用妇女的发簪插了一下,还了真的用铁丝穿透了?是以上两种说法的分歧所在。为此,《山西文学》的鲁顺民先生在《这一腔心事说与谁》(刊于《山西文学》2004年第11期)中写道:“据说,在26日的‘斗牛’大会上,牛荫冠也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结果有人将他推到站着的地主那边。农会主席说: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起。”紧接着鲁顺民又引用了中共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为纪念牛荫冠写的《家乡人民深切怀牛荫冠》一文。该文说:“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上像哑了一样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有人打抱不平,当场把牛友兰的手铐和脚链捣掉,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不得不宣告结束。”他认为“这就是民间记忆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的前后背景”。

但是,鲁顺民并没有满足这种模糊不清的记忆。为了寻找事情的真相,他采访了著名的老作家胡正。胡正当时是《晋绥日报》的编辑兼记者,上世纪50年代,因创作长篇小说《汾水长流》在文坛引起轰动。对于这件事情,老人家记忆清晰,印象深刻。因此鲁顺民在文章中写道:

那一天,胡老作为《晋绥日报》的记者,被派到蔡家崖斗争牛友兰大会现场采访,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围在中间。胡老随李井泉进去之后,李井泉即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这种口气与9月16日(引者按:应为18日)的讲话一脉相承,并无相左的地方。李井泉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但是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主持大会的是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文,还有兴县专区行署书记马林,和胡老是老相识,胡老对马的为人有很深的了解,胡老说,马林是晋绥

本地人(保德人),对牛友兰先生的历史相当清楚,对“斗牛”行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分局书记的夫人和秘书都在会场,况且都是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按部就班把大会进行下去。因为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引者按:棱角尖锐的炉渣)。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当时有一个细节许多资料没有披露,就是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其后关于牛荫冠七七八八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在大会结束后当即就沸沸扬扬传开了。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胡老说,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下子就拉断了。

群众都知道牛友兰先生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斗争在这个时候再也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马林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结果,牛友兰回家之后就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弃世而去。

值得注意的是,胡正还披露了当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他说:

“斗牛大会”其实是一场联村斗争地主大会,也就是说,斗争的并不止牛友兰一个人,周围各自然村的地主、富农都在斗争之列。那一天,木栏岗村的斗争对象被押到会场斗争。其中一个人是村里的一个二流子,土改工作组进驻木兰岗之后,这个人很快被当作贫雇农的中坚力量和依靠对象加以重用。

土兰岗土改工作组组长是李佩芝,李是王若飞的夫人,从延安撤到晋绥边区。事实上,晋绥土改急遽“左”倾,除了康生曾经指导过晋绥土改

工作之外,留下来直接参与土改工作的延安老干部起了很大作用。

她所依靠的这个人毛病不少,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因为小偷小摸,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在土改斗争中,这个人公报私仇,一下子就把这个富裕中农给打死了,群众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认为他不能领导农民翻身,不配作村里的干部。

李佩芝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这个人不争气,后来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抓了起来,这一次也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牛友兰游街是将近中午发生的事情,正当牛友兰被拉断鼻翼的时候,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说再斗争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群众正对牛友兰被斗心中有气,这下子可找到了出气的由头,围住李佩芝就讲理,李佩芝还振振有词地说她那一套阶级界限的理论,群众说,他偷村里人不算错,偷军区的布还不算错吗?

木兰岗村的人都围住李佩芝讲道理,人越聚越多,人们对斗争大会的情绪越来越大,最后会场的秩序大乱,斗争大会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到下午时分,下起小雨,木兰岗和蔡家崖两个村的群众就是不离会场,围住工作团要个说法,要求工作团惩办二流子,这样一闹就闹到傍晚。其间,晋绥分局的宣传部部长来会场疏散群众,是一派和稀泥的态度,但最后还是赞同李佩芝的观点,什么事都可以说,但阶级界限不能模糊。群众的情绪更大了。李井泉听到这件事,下命令给工作团,一定要说服群众离开会场。马林同情群众,怎么对群众说都不起作用,到半夜,雨下得大了,群众才陆续离开会场。”

据有关文章说,当时牛友兰不仅戴着脚链、手铐,还有人“用成捆点着的香烧他的身体”(《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147页)。

“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和侮辱的牛友兰在监禁中绝食而死,尸体不知所终。他的侄子、在120师副官处担任会计的牛荫越,也因为被八路军清洗回家自杀身亡。牛友兰死后,牛荫冠也离开工作岗位,被派到党校“学习”。有人告诉他,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马林在场,老人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同上,第48页)

六、“斗牛大会”之后

“斗牛大会”前后,牛荫冠已经离开工作岗位,被送到党校学习。在龚子荣和郑天翔的回忆文章里,谈及了牛荫冠在土改中的思想状况和表现。

龚子荣在《回忆牛荫冠同志二三事》中说:“1947年冬,在晋绥土改整党中,我任党校教育长。牛荫冠同志调来党校学习。在‘斗牛’大会后,为了了解牛荫冠同志的思想状况和安定他的思想情绪,我曾和牛荫冠同志谈过一次话。他表现得豁达大度,能想得开。对党无怨言,对群众运动有着正确的认识。同时,他还向我提出,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中,领导上要注意掌握和防止发生过‘左’的和不正确的倾向。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待党和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他还说,有一次牛荫冠在支部大会上发言时,谈到在“斗牛”大会上,一开始有人把他推到地主一边,但贫协主席却说:“这是自家的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边。”这时,他“真是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的落泪不止。”(《牛荫冠纪念集》第172~174页)

曾在绥蒙工作的郑天翔说,当时他也来到晋绥分局党校,发现“牛荫冠‘拉死他老子’,似乎是党校里的一个热闹话题”。一开始他因为不熟悉不好意思打听,后来才知道,为了“消灭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制度……荫冠同志不仅无条件拥护并且长期为之奋斗。大义灭亲,荫冠同志已经做出榜样。”他还听说:晋西北根据地初创时,牛荫冠回来担任领导职务。刚刚“走马上任,就亲自批准处决了当地十几个地主恶霸,其中就有他的表弟。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晋西北人民是看得见的,感受到的。如果他的父亲牛友兰是一个恶霸,或汉奸,或进行反共、反八路军的活动,或反对土地改革运动,对他进行严厉处置,荫冠同志是毫不手软的。”(同上,第176~178页)

牛友兰死后长期未能平反,直到1989年7月,中共山西兴县县委才作出“为牛友兰平反昭雪”的决定。随后,牛氏后人才几经周折,于2000年找到牛友兰夫妇的遗体,并将其重新埋葬。这时,距蔡家崖“斗牛大会”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

(作者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钟)

批注毛泽东著作引发的血案

○ 阎 纲

一、作协头等奇案

中国作家协会在文革中屡犯奇案，例如从党组书记刘白羽的家里抄出朱德传记的原稿，出专刊“打倒朱德”、借机砸烂旧作协的“《朱德将军传》案”；抢夺作协外事权，在亚非作协理事们的面前批斗刘白羽的涉外事件；搞突然袭击揪斗“司徒雷登的干女儿”冰心（只不过冰心结婚去戒台寺司徒派专车送往）、并展览其鞋物以示羞辱的“遭遇战”；被红卫兵严刑拷打致侯金镜自杀未遂的“反林彪”重大罪案；行刑逼供、监督劳动的“深挖5·16反革命集团”大案要案等，然而，作家协会文革中的头等惨案，当数酿成命案的朱学逵“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奇案。

朱学逵“现反”一案，使王府大街64号整个文联大楼为之颤动。

朱学逵，北京大学中文系64级毕业生，江苏南通人，贫农出身，又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因此，被《文艺报》党支部内定为优先培养的发展对象。文革初期，他发起成立“千钧棒战斗组”，后选为作协造反团的小头目。朱学逵虽然革命却文弱，紧跟路线不残暴，文质彬彬，他要戴上瓜皮帽，多少有点像深沉的王国维，不料，一声炸雷，被卧榻之旁的战友以“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示众，刚过20岁的小伙子啊！

1966年11月24日一大早，文联大楼前贴出异常醒目的大字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朱学逵被揪出来，罪行是攻击毛主席诗词、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证是《毛主席诗词》和《毛泽东选集》两部书上的旁批和眉批。大字报揭露，“最最反动”的用语难以实举，不然就有继续散播反革命言论之嫌，但私下里还是被透露出来：

“这一首平平”

“雷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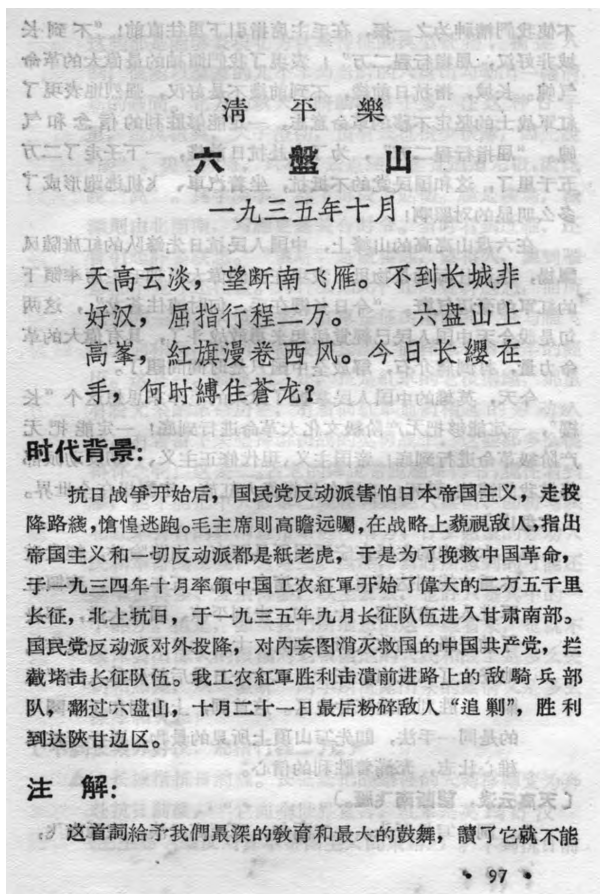
“‘红旗漫卷’，‘风展红旗’……足见词儿不多”

另在《毛泽东选集》某页上用连线将两处论点连接起来，然后点批：“矛盾”、“商榷”。

还在许多书页旁画上大“？”表示不解，被大字报作者认定是罪恶的“怀疑”。

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旁批了这样一句话：“毛泽东也设想和平民主新阶段。”（言下之意，是否讥讽毛泽东指斥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为投降主义岂不成了自我否定？这一条很要害，可以被无限地上纲）

朱学逵被揪出来了，被他同一营垒、同一战



壕、同一宿舍、同一房间、朝夕相处、睡在身边的那位亲密的战友发现不知出于何种动机无情地抛了出来，朱学逵成了隐藏在造反派内部的异己分子。

朱学逵的日记也被抄走，同室的那位红卫兵老大哥惊奇地发现，日记里竟然说小顾是“我的小太阳”！你朱学逵歌颂恋人是“太阳”，那么，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又置于何地！朱学逵没得跑了！

由“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发展到“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再发展到“谁怀疑毛主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就打倒谁！”整座文联大楼不寒而栗，各路人马无不噤声又无不佯装愤怒。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否定贫农就是否定革命，反对贫农就是反对革命。”贫农烈士的儿子竟然被毛主席的红卫兵深文周纳推入疏而不漏的“文字狱”，朱学逵百思不得其解。他矢志不渝地热爱毛主席，衷心感谢毛主席的培育之恩，现在却下了地狱。朱学逵仰天长叹：这到底是一场什么革命？究竟想革谁的命？

朱学逵特别怀念热恋中的小顾——他心中的“小太阳”。小顾，上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朱学逵事出之后，小顾面无惧色，也无一丝一毫和朱学逵划清界线的暗示，反而勇敢地站出来替朱学逵进行辩解，证明他有错误而非真反，坚信他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出身。小顾也是烈士子女，根红苗正腰杆硬，敢于对簿公堂。她把对诬陷者的恨埋在心里，楼道里碰见他，眼珠一转也不转。她时常进城看望朱学逵，体贴备至，大大方方地，不顾好心的劝阻，不怕背后指指戳戳。

突然消息传来：俩人正式结婚了，恍惚“刑场上的婚礼”！然而，没有看客，一个家属也没有，谈何朋友同学。婚后的小顾更坚强，誓与命运决一死战。她孤身一人到朱学逵家乡南通作调查，让乡亲们出面作证，证明朱学逵不但不反而且热爱伟大领袖。事后证明，这些材料像打水漂一样，冲刷不掉现行罪证上的白纸黑字。

朱学逵罹难，人人自危，没有谁回到家里不紧锁门户，翻箱倒柜，偷偷检查自己的马列经典红宝书的：每一页、每一个记号都不放过。我当时也非常紧张，惊出一身身的冷汗，因为我在三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两厚本的《马克思恩格斯

文选》《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人物》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文艺》的空白处写有大量的心得和批语，不得了啊！刘茵心惊胆战、坐立不安。烧了吧，怕邻居发现，火烧毛选还不找死？埋到荒郊野外吧，又怕路人检举。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撕！先撕掉扉页下方“阎纲某年某月某日几读几学”的签注，再撕掉不少页码里批注的字迹，然后，作为旧书卖掉。可是卖到哪去呢？到王府井很容易遇上作协的人，于是，她像做贼一样遛到西单，环顾四周无人，便把“旧书”一股脑儿出手，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二、奇案又生奇案

奇案又生奇案。几个月过去，原先和朱学逵同屋的张振亭，也被作协四楼电梯旁的巨型大字报“揪”了出来，其案情与朱学逵如出一辙：在《毛泽东选集》上做了（其实是表示疑虑和不解的）“反动批注”；罪名和与朱学逵也一样：“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揪出和打倒。朱学逵和张振亭都是红卫兵，但观点不同，张振亭的被揪出，到底是出于热爱还是挟嫌报复，不得而知，反正乱成一锅粥。对张的第二次发动没有对朱第一次发动那么轰轰烈烈，“广大革命群众”经历过传奇般的革命厮杀之后，已经见怪不怪了。

张振亭，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出身好，入党早，勤学多思，小文人的样儿，后来同作协办公室于淑芬结婚。于淑芬也是红卫兵，革命热情高涨，张振亭事发后，陷于痛苦的沉思。文革后，张振亭曾任《体育报》总编，再也不愿意同作协的人员有来往。

三、最后说“我不反毛主席！”

但是，对于朱学逵这样一个到手的猎物和定性的“恶攻”分子，立功者和造反派头头们奇货可居，不依不饶。为了让朱学逵的“现反”案件再升级，进一步扩大战果、产生轰动效应，他们想出新招，把朱学逵的档案材料迳送公安部门，公安部门竟然以《公安六条》为依据批准将朱学逵施行逮捕。他们精心策划了一次当场扭送的活动。

1968年2月17日上午，朱学逵被押解到文联

大楼4楼作协会议室接受“喷气式”的批斗，口号声震耳欲聋，仇恨化作拳脚，足以显示誓死保卫和“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反正，斗死坏人不偿命。

斗大的标语悬于朱学逵的头顶：“强烈要求公安部门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朱学逵！”

朱学逵惊恐万状。

大会通知朱学逵的妻子小顾作为家属到场，但是不准进入会场，小顾抽泣不已。

12点过了，大会没有开完。一片“扭送”的声浪中，朱学逵要求上厕所。大会主持人让《文艺报》的王玮紧跟其后，陪送到四楼的男厕，他进去了，她守在门外。

“轰！”的一声，楼下叫起来了。文联大楼各色人等正赶往食堂路过，见状，大喊大叫：“有人跳楼了！”

王玮惊呆，转眼的功夫一条人命！朱学逵把摘下的手表放在窗台上，趁王玮不备，纵身跃出窗外。

朱学逵瘫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面部失形，用紧锁的眉头承受剧烈的痛苦。许是天冷、衣厚、脚着地，身上没有一丝血迹。

朱学逵被送往一箭之遥的隆福医院，医院不收，借口严重摔伤并非它的专长，何况又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又赶往临近的协和医院，急诊室里惨不忍睹，清理阶级队伍深入了，抹脖子的，割手腕的，喝敌敌畏的，什么人都有，医生忙个不停。

朱学逵不停地呻吟着：“我腰疼，帮我挪挪！”哪能挪啊，他的全身上下已经不成形了。动他的脚吧，脚腕竟然错位180度，骨头全碎了。朱学逵疼痛难忍，表情百般沮丧，却挣扎着、翻来覆去一句话：“我不反毛主席！”

一个多小时后，他圆睁双眼，眼睛珠像鸡蛋一样直立着，特别吓人。朱学逵最后把这个世界看了一眼。

太平间里，存放尸体的抽屉全是满的。

四、手表、车钥匙，还有血书

小顾在一间屋子里接到来人的通知：朱学逵已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小顾双手接过朱学逵有意留下的手表，还有身上的一把车钥匙。

几位好心的大姐让小顾到自己家里轮流住

上几天，庶几能抚慰她破碎的心，她回绝了。了不起的女性，整日以泪洗面。

小顾清理朱学逵的遗物，把自行车等值钱的东西和一些粮票转送给朱学逵的家人，然后，去了雁北最穷苦的地方当教师，直到文革结束。

文革结束，朱学逵正式平反，小顾露面。提起朱学逵来，小顾忿忿难忍，一腔忧怨。小顾后来随便嫁了人，境况如何，杳无音信。

朱学逵给中央文革、戚本禹和江青写了许多信，陈述自己绝对忠于毛主席。一些信的关键段落是咬破手指用血写的。戚本禹见信，觉得棘手，但表示：朱的错误是严重的，攻击了毛主席，但是出身好，一贯表现也好，那些言论写在自己书上，又没有给人看，便让阎长贵去作协同造反派们说一说，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吧。无果。

国家档案库里，也许能找到朱学逵的那份血书。

“谁杀了朱学逵？”他，还是他们？而我们，只不过晃了晃拳头声嘶力竭地喊了几声口号吗？

五、由朱学逵之死想到毛泽东改诗

关于朱学逵事件，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有载：“二月十七日星期六中午，朱学逵自杀。上午开斗争大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会后即有大字标语要求逮捕他，朱恐甚。王玮奉命监视，经四楼时朱称如厕，趁王不备，朱即以身匿挡板后，由窗口跃下，手表则脱置窗台上。前两月，已说他无问题了，上月刚刚结婚，现又一斗而死，惨矣！”“大楼中人心惶惶，情绪混乱。为防洗宁出问题（洗宁，《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写过《小黑点的故事》，被指证影射唇下黑痣的领袖——阎注），又派人陪住，更制造了紧张的气氛。”

陈白尘当时未获解放，不在漩涡当中，不知其详，但他处于逆境中的这几句评语，倒也中肯：“惨矣！虽说是经不住考验，但以逮捕恐吓，亦是过火的。”

我想起毛泽东改诗。臧克家给毛泽东的诗词提意见最多，毛视臧为“诗友”。臧问《沁园春·雪》中“腊”字何解，毛反问他怎么解才好，他说：“如果作‘蜡’比较好解。”“好，你替我改过来吧！”《词六首》发表后毛泽东给臧克家写信，称：“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

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毛主席诗词》出版之前,臧克家用便条又写了23条意见,其中13条被采纳。

人无完人,诗无完诗,不能对人迷信,也不能对诗迷信。臧的“热风吹雨”就比毛的“热肤挥汗”高明得多!陈白尘说得不无道理:“朱不过是一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只不该对主席著作不敬(在毛选上加了‘批注’),并非有其它目的,罪不当死也。”“恐主席知道,也不以为然的。”

明明知道毛泽东承认他的诗词有“可改之处”,怎么就不准一个有见地的年轻人在自己的书页上记下一点点关于遣字造句方面的真实想法?连一声无限崇拜下好意的“平平”二字都不容,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的死与刘和珍君同,“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

到底是谁杀了朱学逵?

不把个人神化,群众发动得起来吗?

不煽动群众,文化大革命搞得起来吗?

鲁迅先生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

但是当你作为受害者起而拷问害人者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自己的身上居然也有跟迫害你的凶手们相通的地方,所以,索尔仁尼琴提醒人们:牢记住苏格拉底的那句话:“认识自己!”它使我不寒而栗!

我为朱学逵的死和小顾的爱流下擦不干的泪水,然而,揪出朱学逵,我跟着这一块喊“打倒”,一块喊“法办”,在朱学逵惨死的现场,鲜血溅在行刑者的手上,也溅在我们高举铁拳高呼打倒者的脸上。

每念及此,血脉贲张。

向朱学逵致哀! 向小顾致敬! ■

(作者为著名文艺评论家)

(责任编辑 黄钟)

炎黄春秋网上书城

网上购书 方便快捷

网址: <http://yh100.taobao.com>

本刊唯一授权网上书店

联系人: 关小姐 淘宝旺旺: zssy8888

欢迎订阅2013年 《同舟共进》月刊

邮发代号:

46-56

专题策划 · 凝聚改革共识, 再造改革动力 ·

- | | |
|-------------------------|-------------|
| 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 | 周瑞金 |
| 中国, 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 马国川 |
| 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 吴敬琏 |
| 当元老派成为改革家之后 | 萧功秦 |
| ——中国与苏俄改革战略的反思 | |
| 再次呼唤敢闯敢冒的小平精神 | 鄯烈山 |
| 陈开枝: 南巡是“老船长”的“最后一搏” | 郭英秀 |
| 独家访谈 叶选基讲述粉碎“四人帮”与邓小平复出 | 程冠军 |
| 亲历齐奥塞斯库时代 | 孔寒冰 |
| ——罗马尼亚前驻华大使罗明夫夫妇访谈录 | |
| 公众话题 从“哲学已死”看当下高教改革 | 刘玉玉 |
| 大学: 如何“宁静”, 怎样“致远” | 陈平原 |
| “美国高考”一文定终身? | 薛涌 |
| 议政论坛 广东“乌坎转机”的范本意义不可低估 | 马立诚 |
| 往事历历 “刑场上的婚礼”与刑场外的真相 | 刘统 |
| 陈昭礼: 不该被遗忘的百色起义领导人 | 钟兆云 |
| 以史为鉴 中国千年外交的空间问题 | 袁南生 |
| 乌龙会的乌龙事 | 聂作平 |
| 四海之内 1941年夏苏军惨败的不解之谜 | 述 强 |
| 肖洛霍夫: “左”“右”逢源的代价 | 陈为人 |
| 文化广角 冯友兰历史沉浮的标本意义 | 施京吾 |
| 舟边絮语 忽然想到——文化如何繁荣 | 陈四益/文 黄永厚/图 |
| “国军俘虏国军” | 许家祥 |

· 以上为《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主要目录

可直接汇款到本刊发行部或到当地邮局订阅
 订阅价(含邮费): 每期10元, 全年120元(港澳地区300元)
 地址: 广州市明月二路66号同舟共进杂志社 邮编: 510600
 电话: (020) 38308908 传真: (020) 38308918
 电子邮箱: tongzhougongjin@gmail.com

欢迎订阅2013年度 中国钓鱼

邮发代号82-688

《中国钓鱼》杂志(月刊)由国家体育总局主管, 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主办。创刊于1984年, 为全国性垂钓专业刊物, 内容以信息量大、实用性强、趣味浓厚而广受读者赞誉。

《中国钓鱼》作者队伍由业内资深专家和经验丰富的钓鱼爱好者组成, 各地读者均有很多机会刊登稿件和图片, 是广大钓鱼爱好者交流经验体会、分享钓鱼人生的理想平台。

常设栏目有: 大鱼榜、库塘钓、江河溪流钓、海钓、野钓百计、竞技有术、我的一招、饵料篇、答钓友、赛事报道、钓协之声、渔具城、名人在线、天下好钓场、钓四方、钓鱼人部落、钓鱼与健康、海外一览、鱼的知识、哈哈鱼、钓鱼漫画、诗歌、摄影、绘画欣赏、鱼拓教室等等。

订阅抽奖: 凡于2012年12月31日前将2013年全年《中国钓鱼》杂志订阅单复印件寄(或传真)至编辑部者(请寄: 100061 北京体育馆路8号《中国钓鱼》杂志读者意见调查组收。也可将订阅单照片或扫描件发至编辑部电子邮箱: zgdy@vip.sina.com), 均可参加1000名幸运奖(钓鱼用品)的抽奖活动。请务必留下电话号码, 以备联系。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每册定价10元 全年订价120元

编辑部地址: 100061 北京体育馆路8号 电话/传真: 010-67158584

也谈“义和团的真面目”

——回应周育民先生

○ 侯宜杰

拜读了周育民与我商榷的大作《我看“义和团的真面目”》(《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尚有一些浅见,谨按周先生大作的顺序,逐一请教。

我在拙文的第一部分,列举了几条史料,并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指出义和团运动的实质:“如果说烧杀抢掠无辜的教民还打着‘灭洋’的幌子,实际干的是盗匪勾当,那么,烧杀抢掠无辜的平民、回民和官署官员则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了。”

周先生对我讲的事实一概不顾,只指出我举出的县令张瑞芬禀报山东长清县团民勒索教民40余家、平民十余家的例子,说:“似乎坐实了山东义和团打砸抢的罪状。其实,要找到这类‘罪状’,岂止长清县,山东几乎到处都有。”言下之意,自是不能“坐实”,只要这个例子不能“坐实”,我举出的事实和论证就全部站不住脚了。

周先生论证说,长清团民勒索教民、平民之事,是袁世凯1900年1月19日上报诸清单的一份。“作为袁世凯研究的专家,侯先生应该知道袁世凯对这些案件的基本看法和结论:‘实由民、教积怨构成,而巨盗奸民,因而从中煽惑。’”如果袁世凯的判断基本正确,“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义和团运动是激于洋教压迫而起”。而后又说:“是教民‘鄙俗的贪欲’激起了平民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平民搞义和团以一逞对于教民‘鄙俗的贪欲’?读者是相信以前众多历史学家得出的‘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还是相信侯先生的新发现,尽可以自作判断,至少在我看来,历时百年之后的今人,见识仍不应不如百年之前的袁世凯。”

我确实知道袁世凯说过上面那几句话。但是,他说的是“实由民、教积怨构成”,这话不难理解。而“积怨”之构成,责任可能在甲方,也可能在乙方,他并未言明在哪一方,请问周先生:是从袁世凯所说的哪个词汇里断言“义和团运动是激

于洋教压迫而起”?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一直实行禁教政策。其后虽然解禁,但暗中仍对教民严密监控,予以打压。有些平民由于种种原因,也极其歧视欺压教民。如直隶曲周县牛家寨的平民耿作林、耿洛协等,在1872年就带人多次捆打辱骂教民,并用粪水强灌,还让教民设宴赔礼,讹索教民京钱十三千文,毁坏教民秋禾,不许教民吃村中的井水,不许使用碾磨,逼令他们反教。(转见黎仁凯等《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第9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涑水县南高洛村平民与教民结怨,“此事起衅,在同治末年,该村有习摩尼教者六家,其村首事阎老福,恶其淫邪,禀请县令于子坚笞辱之。六家挟仇,遂入天主教以图报复。”(艾声:《拳匪纪略》,《义和团》1,第448页)调查资料亦证明,“当南高洛村信教人去北高洛村传摩尼教时,却遭到北高洛村绅士阎洛福的严厉斥责。阎洛福原是北高洛村大户……为防止摩尼教的蔓延,有一天他准备了一些狗肉去南高洛村,强制所有迷信摩尼教的人吃狗肉,逼使他们反教(民间流传吃了狗肉能破邪教)。不久,意国传教士在南高洛村建立了天主教堂,那些被迫吃了狗肉反摩尼教的人们,怀着对阎洛福的仇恨加入了天主教。在洋教士支持下,不断扬言准备报复阎洛福,并伺机寻衅。”(黎仁凯主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15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信仰摩尼教的教民并没有欺压平民,而且还未投入天主教,阎洛福却禀请县令“笞辱”,强逼他们吃狗肉反教,公然侵犯剥夺他们的人身安全和信教自由。显然,最初结怨的责任不在教民,而在仗势欺人的阎洛福。有了这最初的结怨,方有以后的六家人改投天主教,挟仇伺机报复。山东巡抚毓贤在1899年也坦然承认:“在二十年前,平民贱视教民,往往有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页,中华书局1959



义和团照片

年)。他是极力庇护义和团的高官，不会诬蔑平民，所言应当可信。这些说明，民、教最初的积怨，至少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平民首先欺压教民所构成。

我的见识很可能不如袁世凯，那就看看他对义和团的基本看法和结论吧。据我所知，袁世凯上任山东巡抚路经德州接见吴桥县令劳乃宣时，即称赞劳乃宣清明降谕旨惩办“拳匪”，并电促直隶总督裕禄上奏。上任的第二天，就颁布了《禁止义和拳匪告示》。1900年1月13日上奏说：“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祇在于纠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赃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沈祖宪辑《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第1~5页，项城袁氏宗祠藏版1938年）5月1日，清政府征求把义和团改为官办团练的意见时，他又上奏说：“该拳会聚众游行，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杀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为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最后又不容置疑地说：“是宜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5页）这两次上奏，他不仅指出义和团“仇教”“灭洋”只不过是“托名”，实际上是“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同时极其明确地道出义和团“实祇在于纠众劫财”，“劫取财物”，“焚杀掳赎”，“掠害平民”。他到底是指教民

有“鄙俗的贪欲”，还是指团民有“鄙俗的贪欲”，表白得够清楚了，用不着再把他多次下达剿灭义和团的命令指示罗列出来吧？

周先生还举出署济宁知州汪望庚在禀报中所言：“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之后说：“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教民教士的控告大多失实，各县据以汇总的清单未必就是历史真相。”用以证明长清县义和团烧杀抢掠教民、平民，不是“历史真相”，不能“坐实”。

周先生既然认为“教民教士的控告大多失实，各县据以汇总的清单未必就是历史真相”，不足凭信，就不应再用这样的清单作为立论的根据。而周先生引用的这条在全文中唯一的史料，恰恰就是汪望庚在教民教士控告后汇总禀报给巡抚毓贤的清单，而且对其所说坚信不疑。这是否有点自相矛盾？张瑞芬是奉袁世凯之命禀报的。袁世凯是为防止“各教士藉端勒索”而下令各州县“确查详勘”（《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505页，中华书局1990年）的，有何理由认为张瑞芬禀报的不是“历史真相”？否定某条史料当然可以，但必须摆出事实，举出有力证据。周先生并未对张瑞芬的禀报进行考证，去伪存真，仅仅和一条连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的史料加以比较，即加否认，是否轻率武断了些？

我在拙作中说：“只因烧杀抢掠、绑票勒赎向为社会所不齿，并为历代官府所不容，义和团的头目们害怕清政府派兵剿灭，才利用当时部分平民仇恨洋教的情绪，特创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在此，我仅说明口号提出的原因，并未指明提出于何时。周先生却硬说我认为在1899年11月以前，义和团没有提出这个口号。并以山东冠县梨园屯玉皇庙基地的争执为例，证明义和团提出“灭洋”在前，“向教民索讨罚款”在后。是否如此，且看事实。

梨园屯的居民将近300户，其中入天主教者20余家。庄内旧有义学1所，玉皇阁数间，学地

38亩。后经兵火灾伤，义学已废，阁亦倾圮。1869年3月1日，庄中各首事议定四股均分。分单写道：“立清分单：冠邑北境梨园屯圣教会、汉教公，因村中旧有义学房宅一所，护济义学田地三十八亩，日久年深，风雨损坏，墙垣坍塌，无力修葺，今同三街会首、地保公同商议，情愿按四股清分。汉教三股，应分田地三十八亩，圣教会应分房宅一处，上带破厅房三间，破西屋三间，大门一座，计宅地三亩零九厘一毫，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邀同各街会首、地保觐面较明，并无争论，同心情愿，各无忌言，亦无反复。恐后无凭，立清分单存证。”（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第125页，齐鲁书社1980年）

但教民分到宅基地之后，也无力修盖教堂，当年将“地基献于传教士梁司铎（即梁宗明）名下修盖教堂。”（《山东教案史料》，第124页）1873年，梁宗明修盖教堂，三街会首阎立业等到县控告教民拆毁义学、庙宇，盖立天主堂。知县韩光鼎听取了双方供词，核对了当年分单，判曰：“此案既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控于后，殊属不合。”（《山东教案史料》，第125页）并将原来的分单移送主教。这次依分单判决完全正确，阎立业等败诉，受到责押，后经人保释。

1881年2月7日村民庆祝玉皇神会，经过天主堂时将教堂大门挤开，教民出来计较，然亦不过空言争论。韩光鼎再次审明案情，判决：“至该教堂地基，断令民、教仍旧和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设立教堂，再议归还。”（《山东教案史料》，第156页）这次判决改为地基由教民“暂行借用”，违背分单和法理，是错误的。

1887年，传教士费若瑟购买砖瓦木料，欲重建教堂。三街会首刘长安等又到县禀报：“前因教民将庄内旧庙改建教堂，庄民不愿，屡经涉讼。现在教民王三歪等复将教堂拆修，扩充地基，庄众忿怒，拟往拆毁教堂，索地修庙。”并发动村民“用教堂砖料在堂内盖瓦房三间，装塑神像。”堂内衣物亦有失少。知县何式箴等到该屯查验情况后判决：“因查刘长安等理曲肇衅，本应究惩，姑念衅非一日，议出多人，从宽详革监生，断令遵限拆还教堂”。教民仍然上控。新任知县魏起鹏又会同何式箴审理。正在提讯间，经绅耆调处，王三歪等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归与该村为

庙，刘长安等亦情愿另购地基，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言归于好。何式箴和魏起鹏考虑到“此案刘长安等肇衅理曲，本应仍照前断勒令拆还教堂”，但为了避免民、教“嫌衅滋深”，既然“两造悔悟请和，莫如就此完结，以期民、教得以互释前嫌。”（《山东教案史料》，第126~128页）维持了韩光鼎的第二次错误判决。

法国主教马天恩以韩光鼎初判后移文内“有‘既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控于后’”等语，并将分单申票移交教堂管业，未有“暂行借用”之说。可见教堂并未霸占地基，地方官屡以此地为教堂产业”（《山东教案史料》，第128~129页）为由，又提出重新审理。

其后的发展过程，戚其章先生记述较为详尽，兹节录于下：

马天恩提出异议后，巡抚福润令东昌府提集复审，1892年改判为：“将庙宇让与教民，改建教堂。并恐民心不服，由该县何令捐银200两，京钱1000串，听民另购地基，建盖新庙，设立义学。俟新庙工竣，再拆毁旧庙，移置神像。”

教民仍不满意，扬言要将控争之人拿究。村民也不服，当年4月底，请来道士魏合意赴庙主持，并将办团练的枪械移存庙内。教民畏惧，纷纷逃避。济东道张上达亲往查处，到后魏合意已被何式箴拿获。他们又传集附近乡耆开导，“该庄居民情愿遵照原断，仍将庙基交出，让改教堂。”并“将庙内正殿三间拆毁”。

1897年春间，教民王太和等备齐砖瓦木料，准备在庙基上建堂。该村“十八魁”阎书勤等见状不悦，约请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于3月24日到梨园屯“亮拳”。“亮拳”活动进行了3天，四周20里内拳众到者甚多。教民虑及村民意图阻拦修盖教堂，“遂以梅花队阻工、谋叛为词，向冠县投递信函”。村民不服，前往教堂理辩。教民见“人多势众，闭门不纳，并上房抛掷砖石，开放洋枪，致激众怒，群起相投，以致互有受伤”。4月27日，阎书勤等带领村民，各执刀械，攻打教堂。“在格斗中，教民王太清重伤致死。全村25户教民，除2户外，俱遭抢掠”。村民还拆毁教堂，重新将庙盖起。案发后，东昌府知府洪用舟前往查办，他认为“庙基为始祸之由，议为归官经理，作为义学。另为洋人置买地基，建立教堂”。费若瑟转



义和团直隶省长新镇北街坎字团防总局虎头牌

商主教马天恩，马天恩不同意，坚持惩凶，归还教堂地方，赔偿教堂损失。洪用舟与新任县令曹佃传到赵三多，晓以利害，令其解散梅花拳，并搜捕阎书勤。后便“督勇役将庙宇拆毁，以原基交还教堂。”阎书勤在被官府追捕之下，联络拳众3000余人，并改名为义和拳，在1898年10月祭旗起义，旗上书写“扶清灭洋”四字。（参见戚其章、王如绘编《晚清教案纪事》第301~304页，东方出版社1990年）

该案当初的分单是经全村平民同意的，也是为了防止以后有人不承认而“立清分单存证”的。区分是非曲直，只能依据分单。如果平民诚意遵守，争执不会出现。分单写得极其清楚，宅地和上面建筑物，均归教民所有，并“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教民如何处置，平民无权干涉。可是，平民却违背分单协议，控告教民在宅地上盖教堂，还撒谎说“教民将庄内旧庙改建教堂，庄民不愿”。此事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但平民官司败诉，带领打官司的阎立业受到责押，刘长

安被革去监生功名后，怀恨在心，又置械“亮拳”，威胁教民。教民恐惧，才诬告平民“阻工、谋叛”。当平民前往教堂理辩时，教民出于自卫，不敢放进，上房抛掷砖石，开放洋枪，诚然理曲，但仅“互有受伤”。而4月27日平民攻打教堂，却致教民王太清重伤而死，并“抢掠”全村25户教民中23家的财物。不难看出，当初的民、教积怨构成，“肇衅”完全在理曲的平民一方，是他们依仗人多势众，首先撕毁分单协议，欺压弱势群体的教民，企图霸占已属教民的宅基地。同时整个过程也证明，与周先生的结论相反，教民并没有勒罚过平民，平民“抢掠”教民财物绝非是“向教民索讨罚款”，亦非在提出“灭洋”口号之后。究竟是教民有“贪欲”，还是团民有“贪欲”，不是一清二楚吗？

周先生说：通过他对长清县令的禀报和玉皇庙基地争执的论述，“大概把学术界以往的义和团运动基本性质判断的基本理由讲清楚了。”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

在论述“反帝性质”时，周先生写道：即使我列举的京津直隶一带大量有关“抢劫”的材料“完全属实，也必须根据一些基本的‘常识’进行具体分析”。“红军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曾被国民党和地主们污为‘赤匪’，义和团打教堂、分教产、剥夺教民之类的行动，进而派捐商铺、设卡收捐、抢夺富户，从而出现大量的负面记载，情同此理，丝毫不值得奇怪。”

我没有周先生这样的“常识”，只知道红军当初执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时，确有严重错误，但他们为的是打倒剥削阶级地主，铲除封建土地制度，将田地和财物分给穷苦人民，使之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翻身，或将钱物作为经费，用于实行民主革命。义和团则是只知抢劫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教民，分赃肥己，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说到“常识”，一般群众均能理解“盗匪”二字的含义，也属于“常识”。现在看来，仍有加以诠释的必要，以免与“反帝”混淆。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盗匪：用暴力劫夺财物，扰乱社会治安的人（总称）。强盗：用暴力劫夺别人财物的人。由此可见，判断盗匪和强盗的要素，为其行事的目、手段和方式，非其行事的对象。因此，凡是

以暴力劫夺别人财物,扰乱社会治安的,不论劫夺的是什么人,均为强盗行为,与“反帝”毫不相涉。综观义和团打洋教的所作所为,盗匪、强盗的定义均适用于他们。连极力庇护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也不得不承认朱红灯、心诚和尚及于清水是“匪首”,将他们斩首示众。

我在拙作中写道:“肯定义和团打洋教就是‘反帝’,其前提只能是被义和团烧杀抢掠的教民和平民均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否则,‘反帝’便无从谈起。”对治史者来说,这也是基本“常识”。我还写道:“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肯定义和团烧杀抢掠教民正义,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经得起客观事实的检验。”可是,周先生肯定“反帝”,只有一句主观推导或演绎出来、含混不清的空话:“教民的背后是外国教会,外国教会的背后是帝国主义列强”。既无事实证明,亦无论证,决然证明不了烧杀抢掠教民和平民就是“反帝”。

教民入教只是皈依一种宗教信仰,立身行事各有准则,不能一概而论。孙中山、马相伯、夏瑞芳、沈缦云、英敛之几位名人都是基督教徒,能说烧杀抢掠他们就是“反帝”吗?周先生也承认教民中有“善良分子”,想来在周先生眼里,“善良分子”与帝国主义定有严格区别。如果这一推测不错,烧杀抢掠教民就是“反帝”的论断还能成立吗?至少也不适用于“善良分子”吧?大量平民、回民和官员的“背后”均无教会和帝国主义,也不能说烧杀抢掠他们就是“反帝”吧?

周先生又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冤死的无辜革命者和普通群众恐怕远不止两万之数”,说明不能因此而否定革命运动本身的性质。但是,义和团运动不同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对于“冤死”者,共产党也理应平反。对“冤死”的教民,历史学家同样应当如此。周先生明知教民有“冤死”的,为何还要把他们打入帝国主义之列?

对我以洪秀全和孙中山为例,提出“评价同一性质的信奉基督教,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周先生认为这是“上演一场‘关公战秦琼’的闹剧”,“架构不分历史阶段、历史条件的‘统一标准’”。我认为,教民中有极少数坏人,绝大部分为良民,并不主张以统一标准看待他们。统一标准的发明权不在我,而在“反帝”论者,基督教徒身份就是他们的统一标准。只要是教民,他们就不分好

坏,一律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代理人,并由此认定烧杀抢掠他们就是“反帝”。而对孙中山,则是另一个评价标准。我觉得太不公平,才提出用统一标准相辩驳。孙中山与义和团同时,该不算“架构不分历史阶段、历史条件”吧?为什么不能用统一标准去评价?难道孙中山不是基督教徒,其背后不是外国教会,外国教会的背后不是帝国主义列强?逻辑上失之简单的不是我,而是“反帝”论。评价双方,皆不能单纯以教徒身份作为标准,应看其实际表现,才称得上实事求是,公平合理。

学术观点,谁都可以坚持。但商榷历史问题,必须以事实为证。列宁说过一句名言:“用抽象的东西来偷换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危险的错误。……就是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愿与周先生共勉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钟)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邮箱: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8、57733087、57733086;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文馨、嘉悦、高晶(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父亲扬帆的晚年岁月

○ 小 朝

今年10月1日,是爸爸扬帆的百年诞辰。

1955年爸爸被以反革命罪逮捕时,我还很小,尚未记事。

听妈妈说,我出生时爸爸得知是个女儿,不愿去医院看我们母女,我抢在他期盼的儿子前投胎了。妈妈抗议他“重男轻女”生气了。爸爸为讨妈妈开心,让警卫处王吉普叔叔带着照相机来看我们,母爱的力量使我因祸得福,成为家中唯一拥有出生十天的婴儿照片的孩子,相片背面爸爸亲笔写了他起的名字——小朝。好心人送来“求子”的纯金木鱼,我又有幸攀附富贵佩上了金器。两岁时,爸爸因我用小脚敲钢琴,追着要打我,妈妈对他声嘶力竭。爸爸从来没舍得打过任何孩子。当然,那时他已被停职在家“养病”,不排除本身的心烦气躁。

对爸爸我没一点印象。两个姐姐只记得,爸爸喜欢抢大姐晓云,妈妈喜欢抢二姐晓舜。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从母亲焦虑的眼神,和大人们的窃窃私语中隐约得知父亲的神秘。上学后特别是面临加入少先队,共青团时,所有的打击从此决堤,幼小的心灵蒙上抹不去的阴影。怯懦、自卑、黑暗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好在母亲积极阳光的情绪不断激励着我们,使我们学知识学做人,不暴不弃地努力向上,家里再穷妈妈总要挤出点钱,订购《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十万个为什么》等书刊杂志给我们看。尽管她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过对我们的培养。

上中学时厄运降临。满以为入重点中学没问题,却遭受了重重打击。青春期的我压抑自卑,常躲着人偷偷流泪。班级中一半以上是干部子弟,可我不甘沉沦于混迹其中,于是不停打入团报告,不断向好心帮带的团员们翻着妈妈告知的版本:妈妈是革命干部,我们由妈妈教育抚养。申请入团时,被一位团委书记老师叫去单独谈话。从他的嘴里,说出了父亲更多的“罪行”。

他爱憎分明的立场和不想挽救的神情,把我“可以教育好”的愿望击得粉碎。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竟蒙着妈妈的光环,混进第一批上海市红卫兵。心虚的我不敢参加“抄家”、“斗牛”、“开大会”等任何活动,连“大串联”也不敢去。一天被“头头”叫去学校“看牛棚”。看的是教我们历史的“山顶洞人”(外号),据说她罪大恶极。她女儿趁我一人时哭求我:“让我进去看一眼妈妈……”骨子里遗传的善良,仗义的天分被激活,使我“变形”。我掩护着让她进门,警觉地环视起四周,体验着“红小鬼”站岗放哨的那份勇敢。从此托词再也没去过。

一天半夜,我被隐约可辨的爬铁门声惊醒,妈妈单位来抄家了,我们几个孩子捍卫着自己的抽屉,却终究未能幸免。不久,妈妈被关起来隔离审查。

即使是在这样灰暗的岁月里,依旧有真情在。曹叔叔是跟爸爸时间最久的警卫员。爸爸走后他没间断过打听,即使文革中也敢冒险。警卫员胡叔叔被发配到云南,1974年回家探亲,辗转打听到我家地址,激动地掏出一瓶茅台酒对妈妈说:“我偶然在火车上听说首长还活着呢,这瓶酒就等着首长回来喝。”

1968年,总算等到毕业分配了,按政策一家同时毕业的两个孩子,一个分配到工矿,一个分配到农村。我立刻第一个报名去内蒙古,并请班主任去和弟弟的班主任通报一下。不放心,又亲自到隔壁和我同届的弟弟班级,亲口告诉他的班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
特 约 刊 登
回忆久久为您撰写回忆录
咨询热线: 400-653-6199



扬帆的北大毕业照

主任：“我已报名到内蒙古插队落户。我弟弟是独子，必须留在上海。”当晚我去同学家了，回来姨妈告诉我，班主任来过，要家里劝我别去内蒙古，太远，还是去安徽离家近些。我们全家感激不尽，却不知这是不让弟弟分配工矿的计策。班主任们还算仁慈的，用阴谋摆布我们，胜过义正词严地发配我们。

来到农村，我释放的心情远盖过艰苦的环境。我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每天抢着干活。第一年，我以每个工分三分钱的积攒，硬是在分完口粮之外，分得了十九元七角钱。全公社表扬。我给在家待业的二姐二元。她珍藏了很久没舍得花。第一批招工也因为我表现好而被推荐，但因妈妈在隔离审查，政审没通过，成了全公社唯一被退下的知青。公社“五七”干部找我去谈话，让我做好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准备，犹如宣布了“无期徒刑”。我绝望地想象着自己在这里终老的样子，心如死灰。后来妈妈平反，卢湾区组织部发来公函，我才得以招工。我以初二也未读完的水平，被迫混入教师队伍“误人子弟”教起“祖国的花朵”来。

学校所在的大队书记和党员校长、教师们“慧眼”，决定要培养介绍我入党，我的心死灰复

燃，郑重地写了申请报告。据说公社党委已多次开会终于通过。我也从“白表”填到了“红表”，甚至有鼻子有眼地传说要张榜公布了，却总是只听雷声不见下雨。一天公社组织部孔部长亲自上门，对我重复过“雷声”后，突然严肃地说：“你妈在上海卫生部门工作，让她给我老婆买点最好的，治哮喘的进口药。”我说：“没有药名我妈没法买”。一种不祥之兆袭入心头。事后有人告诉我，有个资本家出生的上海知青，只是拎过几刀猪肉上门见部长，就换到了党票。我愕然。回上海后分配到衡山宾馆，党支书张善潮一心要培养我这个老革命后代，不惜派人截着我去听党课，殊不知，这时的我，看了小说《牛虻》，思想早已脱胎换骨。后来我一直没有入党。

1977年，我中学的同窗好友传来了爸爸的消息，妈妈听了觉得靠谱，决定通过正当途径找到爸爸。让我们每月从各自所在地，分别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公安部、专案办，询问爸爸的下落。我们要知道爸爸究竟犯的什么罪？他为什么北大毕业后，放弃在上海文化界衣食无忧的生活，去新四军出生入死，打下江山后又抛妻弃儿地反革命？

1978年，上海市公安局来了位处长，告知爸爸确实在湖北沙洋农场。并且说：你们爸爸不光是反革命，还多了个内奸帽子，你们考虑清楚，要不要去看他。母亲毫不犹豫一定要去。她得到了当时的区委领导向叔宝的支持、帮助（妈妈每每想起，由衷地感激他）。

弟弟忠平27岁那年，爸爸离家后的第25年，和妈妈一起去湖北沙洋农场，看望戴着反革命、内奸帽子的没有印象的父亲。那个在小说电影里才有的场景真实地展现在面前，爸爸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当母亲迎上去自我介绍后，他马上呵斥：“你们要自重，不要冒充别人的家属。我知道你们是江青派来的……”

服侍他的李老头告诉他们，爸爸来时改了名，并被宣布是个孤寡老人，就带着一个破皮箱，却谁也不让碰。那是妈妈在他离家后让公安局带去的，趁他不在时妈妈悄悄打开，里面只有一套妈妈亲手织的毛衣裤，珍藏了二十五年已被虫蛀得可怕。

农场的领导和职工，纷纷告知爸爸的情况，说他一直在骂江青哭总理，身体越来越虚弱，还

常因看不见掉在河里。“他常在树下做报告很精彩,讲得很在理,还喜欢哼唱京剧《四郎探母》,唱的总是那句: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他常请我们帮忙剪指甲,还连连称谢。我们看他一定是被冤枉的好人。刚来时上面说他是孤老,现在你们家属来了,赶快救救他吧。”

妈妈想尽办法接近他都没用,爸爸见了他们就跑,当时他的左眼已完全失明,怕他摔跤妈妈和弟弟只好无奈地远离他。得知他们要回去了,爸爸破例请他们吃顿饭,自己匆忙果腹后,郑重地说:“今天这顿饭是组织上让我陪你们的,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

妈妈急于要救他,决定立刻回去。先到武汉找陈丕显,让他每况愈下的病体尽早得到救治。陈丕显从北京开会回来见到妈妈留的信,很快把爸爸接到武汉最好的第一人民医院,并派秘书赶到上海找我们,告知爸爸的诊断情况:全身器官衰竭。要妈妈马上向中央要求:将爸爸接回上海治疗。

1978年底,爸爸得到中央批准,25年后第一次回上海。弟弟再次和上海组织部领导一起去武汉接回爸爸。爸爸坚持:除了北京我哪里也不去。组织部同志只好应付他。一路上怕他认出弟弟后有抵触,弟弟尽量躲避着他。总算安全抵达上海,由组织安排直接送往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按精神病治疗。

1979年我也由上海组织部发了公函到安徽,请公假一年,来上海照顾爸爸。随着涉世渐深,我心中的智慧在开启,急于要照顾这个毫无印象的爸爸,开始对爸爸有了新的认识,脑海里已全是忏悔和自责。家人对他的不理解才是真正的双刃刀。希望爸爸会向我们倾诉一切……

精神病院的任隍达主任,在仔细与父亲交谈后感慨地告诉我们,没想到扬帆的人格保持得这么好,令人吃惊。几轮会诊后父亲被诊断为:意识清楚思维紊乱的类精神分裂症。父亲被关在大病房中间一个有伤害性举动的病人才关的小病房里,(当时条件差,没有单人病房)周围成天是病人的大呼小叫声。不但得不到内科治疗,连安静的环境也没有。

妈妈让我和姐妹们冒充护士。我想象着第一眼见爸爸的种种可能,有点不知所措。姐妹们每天轮流去医院照顾爸爸,我很期待轮到我的那一天。

走进病房看到的爸爸竟是那么“不生分”,血缘的神秘使我忐忑的心一下子平静,几十年来划清界限的阶级立场和时空距离立刻化为乌有。爸爸彬彬有礼,除了经常和“被控制的电子”交谈(病态)外,待人接物一切正常。医生说他是长期关押得的类精神分裂症。意识清楚,思维紊乱。我精心地伺候着爸爸,不停换来他连连的道谢。妈妈让我们灌输些爸爸知道的家事,以帮助他回忆,尽快接受家人。终于有一天,爸爸动情地说:“我认你们做干女儿吧。”

爸爸因全身器官衰竭,经妈妈再三要求,组织部同意把他转到华山医院,进行内科检查治疗。当时的院长林平和党委书记高明,是父母新四军时的老战友。他们多次抢救了爸爸,使他起死回生,晚年得以过上20年家庭生活,享受天伦之乐。

后来总算可以住进他一直惦着的华东医院了。一天晚上轮到我陪爸爸。当时的华东医院还没改建,是两个病房中夹着一个卫生间。从凌



扬帆刚回家时和作者合影(1982年)



扬帆最后一次出院回家(1998年)

晨起通往卫生间的门就被锁上了,一定是隔壁用完忘了打开。我去隔壁病房开门,迎面看到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同志,我说:“你们忘开我们的锁,爸爸没法上厕所啦。”老同志连说对不起,赶过来和爸爸打招呼。他问我爸爸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扬帆。他听了一惊,紧走着来到爸爸面前:“扬帆同志,我是粟裕。”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粟裕伯伯说:“好好养病,什么都不要管。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

1980年,公安部阿尔斯朗和李炳钧同志来上海宣布爸爸的平反结论时告诉我们:“我们连续不断看了六叠,从地面到写字台那么高的卷宗,你们父亲的口径始终如一。我们复查的案子比较多,有好多人资格比你们爸爸老,地位比你们爸爸高,在文革期间说过不少违心的话。所以你们包括我们,都要很好地向你们爸爸学习。”妈妈知道爸爸不会接受带着“尾巴”的平反结论,公安部的两位同志当场打长途到公安部请示,以口头叙述的形式向爸爸宣读了去掉“尾巴”的结论。爸爸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他说:“中央给我平反理所当然!”

爸爸常向我们要信纸信封,他用几乎失明的微弱视力,歪斜重叠地给邓颖超写信:邓大姐,我没什么大病,务求早日为党工作……沙洋农场干部也说,他刚来时常给周总理写信,但一封也不准寄出的。

那年冬天,幻听幻觉还时常干扰着爸爸。一天夜里我陪着他,睡梦中被他叫醒:“快起来,我

看你们手老是冰凉,让直升机送来了棉大衣,快去拿……”我的心中五味瓶打翻,一夜无眠。

锦江饭店餐饮经理赵雅芳和丈夫唐洛古,都是当年公安局政保处的老同志,为满足老同志想见爸爸的心情,组织了一次聚会。那天出门时爸爸问我怎么不去?我开玩笑说:“你带点好吃的给我就行”。晚上我睡意朦胧中被爸爸叫醒,他从口袋里掏出用纸巾包裹的“酥炸凤尾虾”,连说“快吃!快吃!就一个”。妈妈说:“这是同桌的一位老同志省给你爸爸吃的。”

当年的警卫员张叔叔,几十年后看到爸爸变成这样,忍不住掉泪。他说当年陪爸爸去苏联开刀,组织上给自己做了套西装,买了皮鞋,打扮得很精神,可没想到回国后爸爸就让他上交了。

妈妈常说,爸爸当局长时把家乡的父母都接来同住。当时家里有两辆汽车,可他一次也没有载家人去看场电影,或上次公园。

一些受他牵连的老同志家属,几经打听找到他,要他写证明。凡是知道的他一个也不拒绝。老部下李涤非相隔26年,第一次见到爸爸,爸爸凭声音就认出来了。听说李叔叔也坐了25年牢,爸爸激动了:“这是为什么?我在里面把所有的责任都担了,为什么还要抓你们……”多年后一次公安局老同志的聚会上,爸爸发言:“我要是承认莫须有的罪名,那将牵连多多少少个家庭啊……”爸爸哪里知道,他不承认罪名照样牵连了多多少少个家庭啊!

我30岁生日那天,我和爸爸打趣说:“你送我什么礼物啊?”爸爸说:给你送首诗吧,你写下来:

如梦勋名如梦年,这般冤案史无前。
暴君一怒妻儿禁,狱卒千巡苦痛添。
战友病重相继逝,老夫劫后不成眠。
暮叟生涯难自理,忠心幸有小朝贤。
我的心无比沉重。

1983年,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省长李丰平邀请爸爸妈妈到杭州空军疗养院疗养。几个月后见到的爸爸大变样。人胖了,走路快了。后来的几年是他最好的日子。我还搀着他从康平路的

家,走到湖南路汤铺伯伯家,和武康路他早年的秘书陈晓奋叔叔家,令他们刮目相看。

为了照顾爸爸,妈妈让我结婚在家。弟弟生了个女儿,我问爸爸有想法吗?爸爸说不,你生儿子好,外孙是皇帝,还给“皇帝”起了名“大斧”,我学浅识薄问:“这算什么名字啊?”爸爸说:“盘古开天的大斧呢。”之前妹妹小苏生了个儿子,爸爸给起的名:姓张名腾。四个月後我生了女儿,没给爸爸带来大斧,我为此难过了很久。

一天爸爸唱起新四军军歌,我说你能记得所有歌词吗?爸爸一边唱,一边在我手心里一字一句地写着,我百感交集,无声地留下了伤感的泪。

1996年以后,爸爸的体质每况愈下,开始长期住院。妈妈不顾自己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每天起早摸黑地到医院陪爸爸。双休日我去医院时,对护工小伍说:“万一哪天爸爸晚上有情况,你可千万别打电话给我妈。”我留下了自己的电话。一天夜里两点多,一声电话铃响我就接住了,小伍带着哭腔说:“三姐快来啊,白天你妈在时扬老还好好好的,傍晚突然发起烧,医生打了针也没用。”我独自起床直奔华东医院。一进门看见爸爸在发抖,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不出话来。我强忍悲伤对爸爸说:“爸爸我来了,放心哦。”立刻又找到值班医生,请求他救救爸爸。医生很不屑地说:“我们当然采取了措施,药效哪有那么快啊。”我说:“爸爸的病妈妈最了解,一定要用‘打点滴’才能压下去。他这么难受你不能再去问一下吗?”刚躺下的值班医生拖着鞋,无可奈何地跟着我进病房,履行起常规检查,当听诊心脏时突然脸色大变,紧接着奔跑出去,很快组织了一支抢救队,把我和小伍赶出了病房。清晨,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严肃地宣布:“你代表家属签字吧,扬老病危,差一点就走了,我们已把他抢救过来,还没脱离危险。”我的气不打一处出,爸爸遗传的因子忍不住尽情爆发。这次以后,爸爸又挺过了半年。

我于1997年9月16日那天拜师皈依了佛门,午饭后我带着师傅给的香蕉到医院去看爸爸,小伍说扬老刚睡下,爸爸听到说话声转身叫了我,我把喜讯告诉他。他听说师傅送了香蕉,一下坐起身说:“来,让我吃掉。”我别提有多高兴啦。

爸爸走后,我想到他从小在家乡的兴福寺做过和尚,按佛教的礼仪,想在那里给他立个长生

牌位,妈妈和姐妹兄弟一致赞成。

晚年的爸爸突然一口常熟家乡话,常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说自己乳臭未干时就自编顺口溜奚落老师:“先生先,屁股尖,要吃豆腐自己拣。”引得全家开怀大笑。他本是个幽默睿智的乐天派,硬是给折磨得面目全非。曾经的魔影时常吞噬着他老迈的心灵,他常吟唐诗,杜甫的《登高》和柳宗元的《江雪》,难掩悲凉的情怀。

爸爸已谢世14年了。有时想着爸爸墓碑上刻着的他的诗句——“高堂此日悬明镜,功过何妨絮絮论”,想着墓碑后刻着的他的诗——“我在人前感到渺小,因为我心中的伟大没人知道。我在人前感到伟大,因为我心中的渺小我不知道。我在人前感到平凡,确实是平凡的,对自己我是深深知道。”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爸爸的身影。活到九十九岁,帮助我们一起度过艰难岁月的姨妈常说:第一次见到你们爸爸时,看到他不爱钱财,就认定他绝对是个好人,这样的人世上少有。■

(作者单位为上海老文化艺术工作者协会)

(责任编辑 黄钟)

郑重声明

近日,本刊接到一些读者和发行商的反映,某些地区的有关部门在文化市场执法检查时,说《炎黄春秋》杂志是“禁书”、“非法出版物”。对此,本刊郑重声明:《炎黄春秋》杂志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的合法期刊,期刊出版许可证号:京期出版字第2817号;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ISSN 1003-1170,在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

广大读者和发行商若发现有关部门称本刊是禁书、非法出版物并予以查抄或禁止售卖等行为,请及时向本刊反映并提供证据,本刊将依法维护自身、发行商及读者的合法权益。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12年10月17日

更正

本刊今年第9期刊发的《关于〈淮海日记摘抄〉一文的说明》(第83页)中提到的“1946年12月17日”应为“1948年12月17日”。

联共(布)党史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 马龙閃

苏联上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对于联共(布)党史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选取这一阶段的批判和斗争来加以论述,大体就可以把联共(布)党史文化的面貌及其主要特质呈现出来。由于联共(布)是由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奠基并为其早期阶段,论述这个问题时就不能不概略地涉及该党初建及其早期阶段的有关情况和问题。

一、联共(布)党史文化的奠基及俄共阶段的思想文化斗争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在沙俄这个专制农奴制国家,主要是在地下秘密斗争的环境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榜样,在深入研究、认真吸取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奉俄国“土地与自由社”和“人民解放协会”等革命民粹主义组织“为楷模”,以全新面貌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在其主要的建党理论著作《怎么办?——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1902年2月)》一书中,提出的目标就是要建成一个“绝对需要有集中化”的、具有“高度秘密性”和“严肃组织原则”的、“统一的全俄革命家组织”。列宁曾用“战斗的革命家组织”、“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等等短语来界定、称谓这个组织。列宁要求这个组织的成员不必多,但务必精干、坚强,是经过考验和严格训练的“职业革命家”,他们要“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并“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人,比如“‘十个来’职业革命家”手里,但围绕着这个组织的,“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这样的外围组织应该尽量多,“必须遍布各地”。列宁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列宁就是通过他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完全新型的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经过1905年革命风暴的洗礼,由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个只有2.3万人的党,在“土地、自由、面包”这一口号的召唤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迅速发展到了十月革命时的近10万人,通过发动工兵武装起义,一举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后,剥夺资本家的资本,没收地主和寺院土地,实行以粮食征集制为主要措施的军事共产主义,企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粮食征集制严重伤害农民利益,引起以坦波夫为规模最大的各地农民起义和民众骚乱,特别是引发反映农民不满情绪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感到政治事态的极端严重性,因此迅速改变方略,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向了以粮食税为中心、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导向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从原先的由落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改变为通过商品关系和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的“迂回过渡”,它是把工作重心由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向和平组织“文化工作”的战略大转移和重大改革。

1917年以后,列宁在党内主要进行了对“军事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的斗争。这些派别大多从“左”的方面对党的路线提出挑战,在反对任用旧专家、拒绝签署布勒斯特和约,反对个人负责的一长制、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等问题上表现出来。这个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除1922年曾进行反击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斗争,往国外放逐约170位文化知识界著名教授、专家和学者外,主要进行了反对极“左”文化思潮的斗争。从1920~1922年,列宁亲自领导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1923~1925年,俄共继续列宁的路线,进行了同以“拉普”(“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的斗争。

以亚·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给“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的中心口号是创造“无产阶级文化”。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只有无产阶级自己,即产业工人才能创造出来;为了在创造这种文化时保持其“纯洁性”,必须通过“净化的”、“特殊的人工实验室”,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各种机构来从事创造。他们宣扬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血统论”,认为只有在工厂机器旁工作的产业工人,才能有最纯粹的“文化血统”,只有他们才能创造最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这实际上是一种粗俗的、一眼就能看穿的庸俗社会学理论,但在当时却吸引着、并迷惑了成千上万的左翼知识分子。列宁在1920年和1922年曾两度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最后改组了他们的组织,取消了他们对文化的领导权,并限定了他们活动范围。但紧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之后,另一种极“左”文化思潮的变种——“拉普”产生了。它是在文化艺术领域更带迷惑性的、以同样极端革命面貌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学组织。“拉普”鼓吹把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形式搬到和平时期,在文化艺术战线进行“阶级战争”,主张以直攻近取、军事命令的方式夺取文坛领导权;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庸俗化,宣扬文学即政治,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甚至要求文学作品去图解政治原则。它宣扬的实质上是比“无产阶级文化派”经过更多加工的、更为精致的庸俗社会学理论。通过1923~1925年的文学大辩论,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亲自制定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5年6月18日通过。这个《决议》重点批评了“拉普”加剧阶级斗争的极“左”文艺路线,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虽没有停止”,但“其形式则已改变”、逐渐趋向缓和,因此,应把“‘和平组织工作’提到第一位”。《决议》纠正了“拉普”打击“同路人”作家和文化人的“左”的政策,指出应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和利用的政策。《决议》反对“拉普”以行政强制手段,一派独占文坛的做法,提出党主张在这方面实行“各种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赛”,反对在文学事业上企图采取“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

最重要的是,《决议》在理论上指出了艺术阶级性的“无限多种多样”和极端复杂性,反对在文



艺上把阶级性简单化、绝对化和庸俗化,反对把文学等同于政治、让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这实质上是对苏俄和俄共队伍中长期存在极“左”文化思潮的批判,是对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的庸俗社会学理论,进行深刻而系统的清算。

这个文艺政策决议,是由苏联“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亲手制定的,它对苏联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年代苏联整个学术文化的良好状况,同这一文献所阐发的文化艺术政策和以批判庸俗社会学为内容的理论方针,是密不可分的。

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个《决议》产生未久,很快就发生了联共(布)路线和思想文化方针的“大转变”,使上述几乎所有思想文化成果都付之东流。这一转变的起点,是斯大林1928年发动的所谓反“右倾”运动,其后果是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发生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全面“大转变”的背景下,斯大林于1929年2月28日发出《致拉普共产党员作家》的信,肯定“拉普”“总路线基本正确”,指出“只有你们,唯独你们”,即“拉普”,“才配领导文艺战线”。这就等于在事实上把文化艺术的领导权正式委任给了“拉普”。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斯大林、加米涅夫、萨普龙诺夫、鲁祖塔克、莫洛托夫、加里宁和布哈林(从左到右)抬送列宁灵柩。摄于1924年1月27日

联共(布)思想文化路线从此逆转,开始了联共(布)党史文化的新时期。

二、30年代思想文化批判与联共(布)党史文化的演化

在斯大林同其反对派进行的所有斗争中,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堪称是最困难的一场斗争。莫洛托夫作为紧跟斯大林30年、与之长久共事的同僚,最了解斯大林的心迹;他用“十分困难”一语来形容这场斗争,道出了斯大林的一个心结和秘辛。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布哈林是斯大林最强大、最难对付的理论对手;布哈林作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领悟最深,阐发最力,是列宁逝世后捍卫新经济政策最得力、最顽强的一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而斯大林要打倒布哈林,欲在理论上取而代之,扭转新经济政策的方向,对他来说,是最为棘手的。正是这个缘故,在1929年10月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之后,斯大林一经从政治和组织斗争中腾出手来,就立即实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着手发动一连串的大批判,从思想理论上彻底清算布哈林。

1. 意识形态“大转变”和经济理论领域的大批判

1929年11月7日,值十月革命12周年之际,

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亮出了取消新经济政策的底牌,宣布实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优先的超高速工业化、以集体农庄为导向的全盘集体化,在向“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条战线上”的“大转变”。

12月27日,斯大林50寿辰举行持续整整一周的全苏规模盛大庆典刚刚落幕,在一片歌颂“英明天才领袖”的声浪中,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大会上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演,发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转变”的动员令。这是他拿布哈林经济理论开刀祭旗,首先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展的一场大批判。

这个讲演的重要之处在于,宣布“集体农庄”是“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党“已经从限制富农”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在农村开始了向资本主义的“全线进攻”。这实际上是对集体化的全面动员。

这个讲演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当时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的需要,要求“理论工作必须赶上去”;必须对流行着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的理论,给以“应有的反击”。他说,“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对“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提法”。这实际上是号召思想理论界在意识形态领域来一个“大转变”,以适应反“右倾”斗争和取消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全面转变。

2. 哲学批判

正当经济学理论批判方兴未艾之际,在斯大林讲话的号令下,哲学界又拉开了“哲学辩论”的序幕。

1930年初,两个“小人物”,一个是刚刚在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留校的马·米丁,另一个是还在那里当学员的弗·尤金,很快响应斯大林的号召,首先向《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编、著名哲学家德波林及其学派发起攻击,指责“哲学界领

导”理论脱离实际,背离哲学的党性原则,应当对哲学战线理论“落后实际的状况”承担责任。

米丁和尤金等人最初也承认德波林“路线基本正确”,但仍对他们有诸多责难。德波林学派对论敌的批判进行了有组织的反击。双方论争一浪高过一浪。米丁、尤金等人当时仅是“哲学新兵”,论战中表现出的学术造诣和理论水平难于同德波林学派相比拟,但他们以斯大林的讲话为论据,直指哲学战线理论状况“落后”,没有同党的步调保持一致,脱离现实政治,即没有联系反对布哈林的斗争,等等。他们特别指责德波林学派强调哲学的“特殊性”而忽略现实政治,指责该学派不了解当前哲学战线“转变”的“全部实质”在于,应“把哲学问题‘政治化’和‘现实化’”。由此出发,米丁等人对德波林学派罗列了许多政治罪名。

“小人物”的“基本观点”得到了《真理报》编辑部的支持。——这无疑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发出的信号,“小人物”一下子受到莫大鼓舞。到1930年夏,他们开始把哲学争论变成政治批判,不仅揪住德波林学派对托洛茨基和“右倾”的态度问题不放,还指责德波林及其学派贬低列宁,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主义阶段。这就开始将学术问题转变为重大政治问题。

如果说在“哲学辩论”前期还带有20年代某些“遗风”,允许答辩,属于一来一往的学术辩论的话,那么到这年夏秋之交,形势便急转直下,开始变为有组织的政治打压和斗争。10月14日,具体领导这场批判的联共(布)红色教授学院支委会经过改组后,虽在通过的决议中承认,以德波林为首的哲学界领导路线“基本正确”,但仍对它罗织了一系列矛盾百出、令人费解的政治罪名,诸如其错误具有“反党性质”,“政治上”有“机会主义表现”等等。

10月17日~20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就“哲学辩论”举行的会议上,论辩双方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当该院副院长B.米柳京发表讲话时,德波林对其蛮横做法强烈不满,插话打断报告,两人一来一往,展开唇枪舌剑,出现戏剧性场面。正当冲突处于难解难分之际,由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党史学家、官方理论权威雅罗斯拉夫斯基出面,当场公布了德波林早在

1908年写的一篇文章,紧接着,又由“流放难友”H·斯克普尼克出头揭发德波林在20多年前流放时的政治“老底”。这种显而易见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一举挫败了德波林的理论锐气,立时逼他放下武器,承认了“政治错误”。

很显然,“小人物”响应斯大林号召而开启的这场哲学批判,代表了当时联共(布)中央的立场和观点。在这场批判中形成的米丁学派实际上是一个官方哲学派别。在该派取得对德波林学派的决定性胜利以后,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了以该派为核心的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就“哲学战线的状况”发表了重要谈话。这个谈话的详细内容半个多世纪来始终秘而不宣,只是通过米丁的讲话和此后联共(布)中央有关决议透露出了主要精神。60年以后,苏联学术界才从米丁死后送藏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务档案馆的笔记中得知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和具体言论,得以公之于世。

斯大林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是他继1929年12月27日讲话,发出意识形态“大转变”动员令,发动哲学批判之后,亲临前线的一次再发动、再动员。所以在本次谈话中,斯大林对意识形态各领域的问题讲得更具体、更透底、更尖锐、更集中,打击和进攻的目标也更明确,其主要意图也表述得更清楚。

概括起来,斯大林这次谈话的主要之点集中如下:

第一、进一步指示要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和各个思想理论阵地展开“全线进攻”,并且强调,为此可使用“各种武器”。斯大林告诉米丁等人:“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展开攻击是主要问题。向各个方面展开攻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斯大林对他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理论方面的劣势地位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说:对方“在哲学、自然科学和一切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应当善于理解这一点”。他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状况也表示极大怀疑,号召“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的粪便(!)全部翻摊和倒腾一遍。应当把德波林派所写的东西全部翻摊出来,摧毁全部错误的东西。可以把史登、卡列夫打掉……为了进行战斗,必须使用各种武器。”

第二,号召不仅要清除德波林学派,还要在思想和政治上批判迄今有碍于斯大林理论地位的一切最有威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包括梁赞诺夫、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甚至恩格斯本人。斯大林指出:“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揭露他的哲学观点。……还有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巴札罗夫等等。现在应当把他们的全部著作都翻腾出来。……”接着又说:“就是恩格斯也不是全都正确……如果这项工作在某地方涉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

布哈林作为他的政治对手和理论劲敌,他更不肯放过,因此要求“把布哈林的著作彻底翻腾一遍”,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最后,斯大林还特别提醒“别忘记梁赞诺夫。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这里同我们离得相当远”。

斯大林这些指示实际上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理论界进行大清查,扫除不利于树立斯大林理论权威的一切障碍。苏联学者认为,这是要“为他斯大林攀登哲学奥林匹斯山扫清道路”,把斯大林奉为“随后各个时期的哲学泰斗”和最高理论权威。德波林后来在“解冻”年代给赫鲁晓夫的信,证实了这种说法。

第三,明确提出要把学术问题看成政治问题。“谈话”说,在任何抽象理论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政治意义”。所以,由此推定德波林学派是“孟什维克主义的唯心主义者”,他们的错误具有“反党性质”。

以斯大林这次谈话为转折点,开始对德波林学派进行毁灭性打击,即“审查他们的全部著作,批判他们所写、所做、所说的一切”,并进行组织处理。

斯大林谈话第三天,红色教授学院支委会再次通过决议,完全抹去了过去对德波林的肯定性评价,转入对其学派的政治大批判。1931年1月25日,联共(布)中央正式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斯大林的谈话,做出《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解散杂志原编辑部,撤去德波林主编职务,批准成立以米丁、尤金为主要成员的新编委会。后来又给德波林学派一些成员扣上“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帽子,在“大清洗”中甚至将卡列夫(在哲学界的地位仅次于德波林)指控为“死硬的反革命恐怖分子”、“谋杀基洛夫的

直接组织者之一”,把他同德波林学派的其他成员史登、卢波尔等一块判处监禁,尔后予以枪决。

这场哲学批判,在哲学上对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由于哲学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占据的特殊地位,由于这场哲学批判是在斯大林亲自发动、具体指导下进行的一场斗争,这样,通过这场斗争,就为以后的大批判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理论范式和批判模式,因而发挥了样板示范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否定对立面的统一,把矛盾斗争绝对化;将一切抽象的理论问题都视为政治问题,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界限;形成了以米丁、尤金为首的苏联官方哲学社会科学学派,由它干预一切学术理论争论。

正是根据斯大林《谈话》中要对过去党内理论家“全部著作”“彻底翻腾一遍”的指示,1930~1931年,联共(布)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党内、加强书报检查的制度,对上述理论家和反对派的著作一一进行清查,把它们统统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与此相关联,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和文献,凡要公开发表的,必须报总书记批准。这样,也就屏蔽了列宁晚年的有关文章和书信,把有关马、恩、列著作和文献的发表权、解释权,全部操控于斯大林一人之手。笔者1987年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亲眼看到一件档案,是当时任该院院长的弗·维·阿多拉茨基给斯大林的一个专门报告,申请公开发表恩格斯给他母亲的一封信。在该报告上有斯大林批示同意的亲笔签字。这使我们联想到为什么列宁晚年的有关文章和书信,在斯大林时期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才在《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中全文发表。

3.文艺批判

“拉普”以阿维尔巴赫为首的多数派领导,原本接受中央政治局1925年文艺政策决议的批评,开始认识原先的某些“左”的错误,少许有些进步,但斯大林写给“拉普”的《信》肯定其路线之后,一下子让“拉普”翘起了尾巴,并且借布哈林倒台之机,去翻1925年《决议》的案,他们甚至掀起一片鼓噪,要求撤销这个重要文献。在这种由反“右倾”引起极“左”思潮反弹的形势下,“拉普”原来“左”的病症进一步复发:对作家重施“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的故伎；继续搞宗派主义，打击一大片；在文坛发号施令，对创作大搞行政干预；宣扬庸俗社会学，以政治代替文艺，等等。

斯大林计划以“拉普”为基础，组建全苏作家协会和有关文艺团体，让“拉普”全权领导文艺界，但消息一传出，苏联文艺界立时炸了锅，作家和文化人纷纷投书党中央，投书斯大林，表示激烈反对。面对这种局面，斯大林正进退维谷之时，发现原先曾任莫斯科共青团书记的“拉普”头头阿维尔巴赫，同苏联共青团中央原书记沙茨基有牵连，后者被揭发倾向布哈林，有“右倾投降主义”。这样，斯大林就失去了对阿维尔巴赫的信任，指示《真理报》发起对以阿维尔巴赫为首的“拉普”进行批判。于是，一股风起，猛批“拉普”的所谓“右倾”。“拉普”原本“左”病复发，现又批其“右”，这更把“拉普”推向极“左”的方向。1931年就是在对“拉普”的这种批判中度过。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宣布取消“拉普”，解散所有文学团体和派别，成立全苏“大一统”的苏联作家协会和各个艺术团体。

至此，苏联结束了20年代各文艺团体和流派自由竞争的局面，在组织上都统一到全苏范围的各中央协会中来；原先各种各样的文艺主张和纲领都遭到批判，唯独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各派原来出版的文艺刊物，也按中央决议精神相继停刊，改由国家官办刊物一统天下。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的文学艺术结束了20年代活跃发展的局面，走上了30年代单一的规范化道路。

其实，重要的不在解散“拉普”，而在于解散所有文艺团体和派别，将其置于“大一统”组织的统一监管之下。至于对“拉普”，也只是着重于组织上的解散，着重于掐掉阿维尔巴赫这个“不可靠”的头目，对其文艺路线（即所谓“总路线”），对“拉普”多数领导及其骨干力量，都一一保留了下来，并加以提拔重用。此后，斯大林和联共（布）在文化艺术领域实质上推行的仍是“拉普”路线，更确切地说，是没有“拉普”的拉普路线。只不过修正了它某些表面上的错误，而1925年中央政治局《决议》所指出的主要错误，则基本上保留了下来。

4.从史学批判，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

历史对全党和广大群众的教化作用，对确立当政者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斯大林是深悟真谛的，因此，他对史学尤其是现代史和党史及其研究动向，一向十分关注。清除党内反对派以后，斯大林要确立自己在党内和国家的绝对权威，是不能允许20年代那种对领袖人物可以议论评说的宽松状态的。为此，他首先要制止学界对列宁的学术讨论。

1930年12月，《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刊登了共产主义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帝国主义研究室副教授斯卢茨基的《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作者对列宁对待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中派的态度问题有所评论。按照20年代以来学术讨论的常态，这是极为正常的。但正是这篇文章，为斯大林直接发难，干预党史研究和学术争论提供了借口。

1931年，斯大林以《论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为题，写信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声色俱厉，对该刊发表这篇文章提出了“坚决抗议”，指责作者是在“反党”，是“诽谤列宁，诽谤布尔什维克”，还给一系列史学家扣上“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和“伪造者”之类的政治帽子，并指斥该杂志刊登此文，是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立场问题”、“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公理问题”拿来讨论，是“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

问题一经这样严厉地提出，史学界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最后，开除了斯卢茨基的党籍和公职，处分了与他有关的所有人员和机构，甚至连他兼课单位的教研室主任也被列入解职之列；对于发文的刊物，除改组编辑部外，还停刊整顿一年；所有出版和准备出版的历史著作都遭到审查，一切史学机构都按《信》的精神进行清查，实际上扩大成了对史学机构和所有史学家的一次全面大审查。其间，被点名批判的人不计其数。外省的批判运动更是变本加厉。1932年初有一份报告说，在那里几乎“每一个写过历史著作的人都被指责为托洛茨基的私贩或纯粹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斯大林之所以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史学批判，显然是有多层深远用意的。首先，是禁止

对领袖人物的一切议论,违者严惩不贷。其次,是把矛头指向一系列“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特别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史学家。革命后苏俄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党史学家,他们多是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参加革命,作为亲历者,对党的历史了如指掌,这些人有安·谢·布勃诺夫、Д.Б.梁赞诺夫、B·涅夫斯基、A.Г.施略普尼柯夫等。他们作为老资格的党内干部,对斯大林的革命根底和经历十分了解,他们也都有党史或革命史著作问世,不可能参与改写历史,无原则地歌颂斯大林。斯大林对他们是不能容忍的;即使被斯大林视为“自己人”的,如雅罗斯拉夫斯基这样紧跟斯大林的史学家,因其著作没有歌颂到位,也是不肯放过的,必须悔悟,必须认识著作中的“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其三,这样整肃史学和史学家,是为了下一步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为改写历史、改写党史做准备。

但重编历史教科书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从1934年5月16日发布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编订历史教科书的决定之后,几经延宕,进度缓慢。为把重编历史教科书纳入确立斯大林历史地位和个人崇拜的政治轨道,还遇到了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及其史学体系这一障碍,这样,由审订历史教科书,很快又发展成了对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一场批判运动。

决策者表面上的要求是,“教科书和教学本身”应克服过去的“抽象化和公式化”,而底里却是要求写英雄和领袖人物,写斯大林,并要求大大加强苏联史的现代部分,不是“把历史中断在1923年”,即列宁时期,而是“将历史写到1934年末”,即大写特写斯大林执政时期,为歌颂斯大林服务。

许多史学家没能领悟决策者的这一意图,编写的教科书难以到位,经多次审查均不合格而被退回。他们一遍一遍地改写,也总是一遍一遍地遭到申斥。最后,大批史学家被扣上“史学界的暗害集团”,“托洛茨基的思想掩护”等政治帽子和刑事罪名,把其中不少人作为“人民敌人”,给予逮捕、监禁、流放,甚至判处死刑。经过这一系列残酷的思想批判、政治斗争,甚至刑事处分,方才有少数人领悟到个人崇拜真谛,把史学纳入到斯大林所要求的思想政治轨道。而这时,斯大林

体制模式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也已基本形成;这样,才从3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编订联共(布)党史教程。

实际上,编订党史教程的过程,也是一个整肃、批判的过程。经过了一番曲折而复杂的斗争,连编撰者自身都经受了一场场清洗淘汰,有的被批判,有的遭逮捕,又有的被镇压,最后由领悟个人崇拜真谛的少数几个人执笔撰稿,他们在斯大林提出分期纲要和哲学部分章节的基础上撰写成篇,最后又由斯大林捉笔定稿而成。

这样,于1938年上半年成书问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对列宁创建党的历史做了大量的篡改和歪曲,这主要表现在:1)按斯大林分期法,认为1912年第六次党的布拉格代表大会为布尔什维克党建党之始,这样就贬低了列宁1903年建党的功绩。仅仅因为斯大林在此次党代大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就制造了斯大林在建党之始就领导党的神话。2)按照斯大林的分期法,新经济政策阶段及其概念被完全排除在党史之外,这就基本否定了列宁的这一创造性政策。3)按斯大林的分期,制造了俄国革命的“两个中心”、“两个领袖”的理论,用伪造的史实把斯大林提到了同列宁并列的地位。4)把一部丰富生动的党史变成了一部干瘪枯燥的党内斗争史。在其编撰者看来,斯大林是除列宁之外提供正确路线、方针和正确理论的唯一“源泉”。5)编撰者以种种手法歪曲历史,或借助斯大林的言论为历史事件定性,或者通过突出斯大林著作的方法夸大其历史功绩,甚而通过伪造史实,制造斯大林同列宁的“伟大友谊”,以抬高其历史地位。这样,通过这部党史,就开启了以官方建制的形式,经党的最高机构审查核准,在充满教诲箴言的郑重党史中伪造史实,公然编造假话的风气。

三、大批判形成的联共(布)党史文化

斯大林以反“右倾”斗争为起点,在经济学、哲学、史学和文艺等领域进行的几乎所有批判,都导致了“左”的错误,造成了极大的、长远的消极后果。这样,经由这些批判积淀而最后形成的联共(布)党史文化,就由这些大批判的后果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集中体现出来。对此,

可以大体集中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在经济上，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回归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超阶段”的“直接过渡”；确立了以超高速工业化、强制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在政治上，实行形式上的人民民主、实质上是个人崇拜、领袖个人权力至上的专制统治；把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泛化并扩大为阶级矛盾和斗争，实行无休止的残酷斗争和镇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变成了主要是针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镇压。

在文化上，提出“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消灭这种意识形态及其残余，就必须彻底抛弃资产阶级文化。同时，以大批判、大斗争和大整肃的手段，肃清包括中间思想形态在内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社会主义”的封闭环境中培育无产阶级意识；以垄断的方法，通过哲学粗暴干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方式，控制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就在学术文化上导向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造成思想理论上的僵化、凝固和教条主义，带来了学术文化和艺术的萎靡不振。

以肯定“拉普”“总路线基本正确”为标志，斯大林实际上抛弃了1925年通过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文学政策决议，修改了20年代列宁—布哈林的文艺路线，由重视清算极“左”文化思潮的方针，转变为不断对所谓“右”的倾向的批判。“拉普”路线原本为“左”，斯大林不仅对其加以肯定，后来又批判其“右倾”，这样就把它推到了更“左”的道路；而且，他把“拉普”的“总路线”加以吸纳，变成自己的文艺路线；这一文艺路线又进而推展到整个学术文化领域，甚至推向整个政治意识形态，这就造成了十分广泛而又严重的后果。

通过袒护“拉普”的政策和在文艺界的批判，改变和添加了联共（布）党史文化的如下内涵：

1)不是实行对文化艺术“有分寸感”的“总的领导”，而是进行事无巨细的“管束”和“行政干涉”；

2)放弃了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文艺阶级性复杂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转向“拉普”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把文艺的阶级性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教条化，主张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

3)不是按照过渡时期阶级斗争逐渐缓和的规律，采取正确的阶级路线，对同路人作家实行争取团结的政策，而是“推行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对作家和文化人施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4)放弃提倡各文艺团体和流派“自由竞赛”的政策，解散所有文艺团体和流派，建立“大一统”文艺组织，将创作方法统一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来。

5)不是遵照列宁主张的对文化艺术事业不做“过多的管束”，实行民主地、内行地、协商地、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感召力，有说服力地领导文化艺术，而是对文化艺术事业进行“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

通过一系列批判，特别是哲学批判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写出版，在理论思想上形成的突出特征是：

第一，确立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其理论是非为是非，以其理论公式为衡量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以他所解释的马列言论为唯一标准的马列主义。这样一来，他不予公开发表的列宁晚年著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列宁全集》第43卷），从337～392页的所有重要文章，都未收入斯大林时期出版的《列宁文集》，这些文章只是在1956年根据苏共中央决定才公开发表，后收入《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36卷），他所屏蔽或提出异议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就被完全排除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外。

第二，否定商品经济，否定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从落后的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奉行社会主义的“超阶段”论，这是联共（布）最基本的理论特点之一。

第三，奉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持续不断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这是联共（布）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四，在哲学上，违背唯物辩证法，走向形而上学：一方面，否定矛盾的普遍性，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宣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另一方面，却把对立面的统一“斥之为形而上学”，只承认矛盾的斗争性，否定矛盾的统一性，这便导致将斗争绝对化，在实践上引发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和平建设时期人为地煽起阶级斗争，搞“大清洗”，引爆社会、分裂社

会、发生大斗争、大破坏，以致自毁江山。

第五，把一切抽象的理论争论都视为政治斗争，严重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艺术观点与政治问题的界限。

第六，形成了一套大批判的模式：从发起学术论争着手，直接上升为政治批判、政治斗争，接着进行行政处理，改组刊物和机构，最后逮捕、判刑。

第七，在批判中形成了以米丁、尤金为首的苏联官方哲学社会科学学派，即斯大林学派。其特点是：1.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把一切问题政治化。简单化和政治化是其思想理论的最大特色。2.借哲学的特殊地位，用哲学干预一切，代替对各学科的具体研究，为伪科学学派在苏联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3.挥舞棍棒，乱贴阶级和政治标签，在思想理论界全面复活了20年代“拉普”的幽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联共(布)中央通过专门决议，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学习

运动，召开各级宣传干部和宣传员大会，开办各类学习班，向广大党员和群众灌输教程的思想。这就使教程凝固的教条主义、左倾急进主义和空想主义深深地刻入全党和广大群众的思想，从而使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以体系化、模式化的形态，得到了十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官方评定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实际上成了推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成了斯大林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和斯大林体制模式的集大成者，这样，它就使联共(布)的党史文化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程度，最终不仅在苏联国内各条战线、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文化艺术各部门，甚至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以完备的形态呈现出来，而且很快远播国外，深深影响到各国工人党和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后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钟)

(上接第93页)旬，有一天办公室只有敬季超和我两人，老敬走到我身边问我“你知道‘章罗同盟’是怎么来的吗?!”我说：“不知道。”老敬说：“与你有关，我听说是史良拿着你的记录向毛主席告状说章伯钧和罗隆基在(1957年)5月13日晚瞒着她召开会，借口帮助党整风发动全民盟组织给党提意见！毛主席听后说：‘章罗同盟’了吧！就这样讲开的！”

敬季超同志讲的“章罗同盟”的由来，我未听别人讲过，但有点像，因为他们三人之间谁也不服谁，矛盾已久，我们干部都知道。

大会期间，敬季超是组织部负责人，大会后听说他是组织部副部长。我们在组织部相处十几年，“文革”前他是组织部第一组组长，我是副组长。敬季超同志是党员。

敬季超同志讲的史良拿的我记的记录，就是1957年5月13日晚7时章伯钧主持召开的会议记录。我当时住在机关隔壁干部宿舍，晚饭后到办公室取东西时，正遇上十多位领导往主席会客室走，章伯钧看见了我，他喊住我说有个临时召开的重要的会，正需要记录，让我做记录，我答应了，又怕记不好，回宿舍找到黄玉琴帮助，黄只答应帮助记，不整理，我整理的。记得章伯钧一开

场就说：“党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我下午才知道朱学范已领导民革开了会并给地方组织发通知，已开展活动，人家已先走了一步，我们所以在今晚召开临时会讨论如何开展活动。”记得经过讨论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和四个工作组的负责人，并决定给地方省市盟组织发通知推动开展工作。还要我连夜整理记录，分送未参加会的史良副主席等领导同志。

我当时并未听出有反党图谋，也未看出有瞒史良现象，章伯钧讲过史良未来与会原因，我当时未听清楚。■

(责任编辑 黄钟)

本刊声明

最近，有人冒用《炎黄春秋》杂志编辑人员名义进行采访并搜集资料。为此，本刊郑重声明：《炎黄春秋》杂志编辑部成员均刊登在杂志的版权页上，本刊目前没有外聘和实习采编人员。

炎黄春秋杂志社

“六教授座谈会”与“章罗同盟”拾遗

○ 阎秉华

我是《炎黄春秋》的老读者,在今年第8期看到《我所知道的“章罗同盟”》长文,认真读后,深深感慨!首先这篇长文显现出作者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是位有心人,所以才保存下许多难得的宝贵资料。作者还是位有胆有识的君子。勇于自我反省,坦言自己过去的错误。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则改,君子也。”对作者认真做人的态度,我由衷敬佩!

我也曾在民盟中央工作多年,反右派斗争运动前后的事也知道一点,不多。因为我当时只是个一般干部。但有两件我听到的事,想用“读者来信”方式讲出来。

一、关于所谓的民盟召开的反党的“六教授座谈会”,《我所知道的“章罗同盟”》长文中讲,是章伯钧召集的。据我所知不是章伯钧召集的,章伯钧是座谈会上被大家推举做主持人的。该座谈会是由当时民盟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兼组织部副部长金若年同志发起并找章伯钧商谈,办成民盟中央与民盟北京市委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一切事务性工作(发通知、定会场、派记录等)都由民盟北京市委承担。这是金若年同志亲自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他也是“奉命”而为,并告诉我参加座谈会的人名,连他13个人:章伯钧、罗隆基、史良、胡愈之、闵刚侯、叶笃义、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和金若年。民盟北京市委只金一个人参加,却是主办者。民盟中央档案室找不到这次座谈会档案。

我由于过去在民盟中央档案室查不到有关“六教授会议”的文件,2001年12月10日在与金若年同志通电话时,曾问老金知不知道“六教授会议”这件事?老金说:“我知道。这次会是我主办的,我参加了这次会……”我又问“谈了些什么?你记得吗?”老金说:“我记得。因为原来是想由民盟北京市委召开,但召集不起来,才与民盟中央联合召开的。我当时是民盟北京市委副

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是我找章伯钧联系的,谈联合召开这次座谈会,具体事务性工作由我们市委做。我当然参加座谈会。记得在那次座谈会上,主要是钱伟长讲北大、清华两个大学的大字报很多,很乱,共产党的威信受影响,希望民盟出来做做工作,帮助党收拾局面。”“章伯钧怎么讲的?”我又问老金,金若年讲“章伯钧主持座谈会,他主要是听大家讲。”我说:“那为什么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章伯钧错误估计形势,煽动工、农、学生反党闹事,从而阴谋夺权呢?”我听到老金的笑声,他笑着说:“这就是政治!当时,我还以为我立了功呢!哈哈!”奇怪的是:金若年也被划为“右派”。

金若年同志已去世。我写此文时(2012年8月23日上午)曾给当年民盟北京市委另一领导人王麦初同志打电话,问她知不知道金若年曾主办“六教授座谈会”,她说:“我是事后知道的,我未介入,老金也不是他自己要召开的呵!”王麦初同志的这句话,证明金若年同志2001年12月10日在与我通电话,答复我问他知不知道1957年民盟召开六教授会时,告诉我的是真事真话。结合我写的《缅怀费孝通同志》一文中提到的费老对被划成右派的感受(我在看1988年7月《中央盟讯》增刊——《费孝通教授答客问》时,看到费老在与客人谈他被划成“右派”时说:“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我想要明白我错在哪里?”费孝通本来在江苏调研,1957年5月中旬急召他返京,返京后又不向他说明急召回京的原因,却安排他参加“六教授会议”,其用心昭然若揭,费孝通自我感觉“落入陷阱”是真的。),可看出一些问题,可能就是所谓的反右是“阳谋”活动的一方面。

二、关于“章罗同盟”说法的由来。1979年10月,民盟中央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已退休干部中找我和吴又熊两人帮忙工作,我被安排到组织部办公室。约在10月下(下转第92页)

陈修良的几件往事

○ 黄 铭

拜读贵刊2012年第8期唐宝林先生的《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一文,感触颇多,刚好我也关注过陈修良的历史,补充一些。

一、南京解放时首先攻入城的是35军,这支部队并非主力,由于南京城已空虚,主力部队都派到重要战场。35军原是吴化文济南起义的部队,由于时间仓促,并没有经过很好的整训,所以攻入城后军纪很成问题。陈修良为首的地下党与这支部队在接收时发生了顶撞,陈修良很着急,立即向市委做了汇报。但是当时的野战军负责人不去批评35军的干部战士,反而去指责地下党的干部。当时的二野领导人的对敌斗争观念十分强,认为地下党南京市委在解放前夕一下子发展2000余名党员,造成队伍严重不纯,因此以南京军管会和南京市委的名义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毛泽东见到这一报告后遂做了那个“十六字”批示,这一批示直接造成了全国所有的地下党人在建国后遭遇到了唐文中所讲的那个命运。南京市委在接到“十六字”批示后,遂对原南京地下党人进行整顿,还是那位领导人在会上说:“革命胜利一靠党中央毛主席,二靠解放军,

地下党有功劳也是第三位的。”对于整顿,陈修良是有看法的,态度是消极的。这又导致这位领导同志在大会上的多次不指名批评。这样陈修良已不能再担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职务,遂被调离。这一对地下党人建国后影响甚大的“十六字”批示一直被封尘许久,甚至

至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很长时间也无人提起,除了其出自伟大领袖,消极作用甚大外,还因为该事直接与一位功勋卓著,威望甚高的领袖人物有关,怕诋毁其光辉形象。直到21世纪初,新华社记者穆广仁先生将其披露,才还原了历史真相。

二、陈修良的工作在从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任上调离后,先回上海任市委街道工作委员会书记,后华东情报部撤销后,随丈夫到浙江省工作,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当时省委书记与任省长的沙文汉在工作和思想上尖锐对立。在1956年的一次省党代会上,陈修良批评省委书记不够做省委领导的资格,成为第二年陈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状。

三、1957年初,陈修良赴京参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康生指示她回去后要引蛇出洞,她拒绝了。回去后,部里写文件,有人根据当时的形势,写了“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了”,她看后,把这句话给划掉了。

陈修良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也是一位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真正共产党人,她的曲折的历史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王力没任过《红旗》杂志的总编和全面主持过《红旗》杂志的工作

○ 阎长贵

2012年第5期米鹤都先生的《“破四旧”的表与里》写得很好,比较全面和客观地介绍和叙述了“破四旧”的缘起、过程和破坏情况。但他在文章中说:“当时全面主持《红旗》杂志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还说:“王力主持下的《红旗》杂志”,并说王力是“总编”。这都不准确,不

对。我从1961年起,就是《红旗》杂志的工作人员。据我所知,王力1963年曾被任命《红旗》杂志的副总编(是多位副总编之一),但他一直到1967年8月30日被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位置上打倒以前没有升任“红旗”杂志的总编,因而也没全面主持过《红旗》杂志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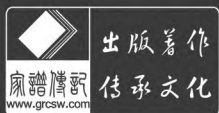
个人出书 历史见证

——三千元五十本起出版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2008年10月，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创“三千元五十本起订制型个人出书、家族出书”模式，四年来编辑出版个人文集自传、家史家谱两千余种，受到离退休老同志的热烈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我们呼吁中老年同志重视个人文化、家族文化的整理挖掘与出版传播，“我写我人生、我编我家史、我修我家谱”；积极行动起来，老有所为、完成使命，人生留书、精神长存！



服务热线：**010-6892 0114** **6252 5116**

编辑出版：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80

展示接待：北京海淀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网 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代理出版：

-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千元，300页印刷100本6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籍，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9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51isb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eijing Memo99 Culture & Media Co., Ltd.

听您讲述人生经历 为您撰写回忆录

我们已为千余位主人公撰写了个人回忆录

您的回忆录是这样诞生的

- ◎历史顾问与您共同制定采访提纲
- ◎访谈人员和您一起回忆人生故事
- ◎专业撰稿人将您的经历凝练成文
- ◎资深编辑三审三校
- ◎设计师为您量身制作精美图书版面

回忆录咨询热线 400-653-6199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歌华大厦B座11层

传真：010-84186201 邮编：100007

公司官网：<http://www.huiyi99.com>



毛泽东怎样指挥三反运动

从内部讲话看大跃进时期的高层情绪

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

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江青夜闯西花厅

中国的“东方红”现象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8.00 元